

第五章 國家定位的形構與衝突

民族認同的論述關涉的乃是一政治共同體邊界與人民的界定，台灣從八〇年代之後，由於台獨運動的出現，民族認同的論述開始出現分歧。不過，隨著民主化，台獨運動者轉變為政黨，相關的論述進入政治公共領域之中。從主流媒體的公共論述來分析，民族認同的論述究竟如何產生變化，它所涉及的國家、人民、與政治共同體(或社會)這些不同的概念，在解嚴後如何被敘述和詮釋，或許是理解過去十多年認同爭議的重要途徑。

這個研究以「1989年亞銀年會」事件和1999年的「兩國論」事件，作為分析的客體，探討這兩個事件中報紙新聞媒體中的報導與評論，從公共論述中了解民族認同相關論述的變化。這兩個事件相隔十年，但都引發公共領域高度的爭議，其爭議的焦點都涉及國家的定位和兩岸關係，這些討論涉及對國家、民族、及政治共同體的不同敘述，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論述中自我-他者的定位和觀點。

第一節：八九年「亞銀年會」事件

國家定位與認同的問題一向被視為一九九〇年代最主要的爭議性問題，不過，在了解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從1989年「亞銀年會事件」的新聞報導，來探討在兩岸開始民間交流初期，也就是李登輝繼任元首的第二年，公共領域是否出現這些問題？這事件是台灣首次派官方人員赴大陸參加該年度亞銀年會，而這事件是台灣從「漢賊不兩立」的兩岸關係界定，開始出現轉變。

一、「亞銀年會」事件背景

由於亞洲開發銀行是我國在中共加入之後仍保留完整會員資格的唯一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參與亞銀年會對我國外交的重要性不可言喻。我國1966年加入亞銀，但是就如其他國際組織的情形，八〇年代初我即面臨中共入會的問題。1986年中共入會，亞銀將我國名稱改為「中國台北」(Taipei China)，但我國堅持中華民國的名稱，我方抗議未有結果，1987年以名稱未解決拒絕與會。1988年我改採彈性外交派代表出席在馬尼拉召開的年會，但以「抗議中」的方式與會。這次1989年的亞銀年會，由於是在北京舉行年會，因此特別受到矚目，因為過去四十年海峽兩岸處於軍事敵對狀態。這一年政府決定派遣官方代表團出席會議，此決定不僅涉及外交，同時也涉及到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岸關係上敏感的問題。

從1979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後，宣稱對台灣將採「和平統一」的方式。1981年中共人大常委會主席葉劍英發表「對台統一的九點建議」(俗稱「葉九條」)，

而 1984 年鄧小平宣稱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也適用於台灣。這兩個政策成爲中共對台的主要政策。這些主張都爲我政府拒絕，1984 年行政院長俞國華曾經表示中共不值得信賴，他說道：「爲達到他們吞掉香港的目的，中共---想盡辦法去造成一個『一國兩制』的幻覺。他們『承諾現行香港制度 50 年不變』，來愚弄世界和欺騙港九民眾」⁴⁹。爲了對抗中共的「統戰」，政府以「不談判、不妥協、不接觸」的「三不政策」作爲回應，在外交上，我則持續採取敵來我走的「漢賊不兩立」的做法。這也導致我國在國際間日益孤立。在另一方面，根據「葉九條」的建議，中共主張兩岸藉由「三通」（通信、通航、通商）與「四流」（探親旅遊、學術交流、文化和體育互訪），作爲達成統一的第一步。而我政府則於解嚴該年做成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政策，次年開始了兩岸的民間交流。

1989 年的亞銀事件受矚目的另一個原因在於，開放探親之後，兩岸的經貿、文化、宗教等其他民間交往開放的呼聲高漲，但是在政治上兩岸的敵對並未解除，台灣仍處於動員戡亂體制。因此，國家安全、法律、以及開放政策之間存在著許多矛盾和緊張。此外，由於孤立的國際關係，以及中共在外交上對台灣持續的排擠和矮化其爲地方政府，政府一直想藉由台灣的經貿實力打開其外交的空間，「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也受到學者專家的批評，主張台灣應當要走「彈性外交」的呼聲不斷。1988 年外交部逐漸採取彈性外交的措施，同年的 11 月，我政府宣布若有國家願意與我復交，我將不再要求對方與中共斷交。然而，12 月中共外交部指責我國「彈性外交」是在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⁵⁰。

對於國家定位，政府一向宣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一個中國」爲基本國策，但在一九八〇年代，台灣內部統、獨的爭論持續不斷。解嚴後，統、獨的爭議在立法院等政治的公共領域，日趨顯著。在另一方面，1989 年三月執政黨立法委員提出「一個國家 兩個政府」這個構想，作爲兩岸關係定位的建議。當政府宣布參加亞銀年會之後，「一國兩府」的提法和參加亞銀年會的決定也被關聯起來。而四月當外交部長連戰表示政府正在研議「一國兩府」這個構想之後，更是在不斷被提出討論。

「亞銀年會事件」的新聞也就是在這些背景中發展，而對亞銀年會的期望、事件的過程、以及其結果的敘述與詮釋，涉及了對兩岸關係、國家定位、政府決策這些方面各不相同的觀點。

關於這個事件，我分析了《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自立晚報》這三家報紙的相關新聞與評論。這個事件從四月六日政府決定派遣代表團參加該年於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一直到五月八日財政部長郭婉容所率領的亞銀代表團回國，以及李總統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媒體都有相當多的報導與評論。雖然大量的新聞集中於五月一日至八日亞銀代表團於北京這段期間，但是此一事件的核心議題－國家定位－早在宣佈參加年會之時就已經開始。因此這裡亞銀年會事件的分析，包含了從四月六日到五月十二日之間相關的報導與評論。以下我先

⁴⁹ 轉引自丘宏達，〈中共對台政策與統一前景〉，《分裂與統一》，台北：桂冠，1994，p. 12。

⁵⁰ 《聯合報》，1988，12/20，1 版。

就三個報紙各自處理這個事件新聞的方式及相關的論述，作一說明，然後再比較其中的異同，以及它們形構此一事件時的論述與觀點。

二、報紙對此事件的新聞處理

三報對此一事件的報導，包含新聞報導、分析、及各式的評論(記者撰稿、非新聞工作者的評論、社論)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三個波段：亞銀代表團赴北京之前的相關報導，代表團的北京之行(大約在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四日這之間)，和「起立」風波(開幕式中向中共國旗、國歌起立)之後的報導。前一波段報導除了關於代表團成員、入境與簽證問題這些新聞之外，報導的核心的主題在於派代表赴北京參加亞銀年會這個決策具有什麼政治的、象徵的意義。北京之行的報導對代表團和團長郭婉容的一舉一動都有詳細的報導，開幕式如何面對中共國旗與國歌的問題，中共的對應方式、以及前一波段的主題也都有持續的討論。五月四日開幕式的代表團對中共國旗與國歌的起立致意，引發高度的爭議，同時也帶來對參加亞銀年會和決策的重新評估。

《中國時報》

對於政府決定派政府官員參加亞銀年會，《中時》一開始就以「外交上又一重大突破」(4/7, 3 版, 社論)贊同此一決定，並且指出雖然外交部重申「三不」政策未變，但「我們相信，亞銀出席模式不止是彈性外交的進一步行動，也將是為兩岸關係定位的一種探索式的先聲」。在新聞報導上，從學者專家的訪問，美、日、韓的反應，不同政黨之政治人物的反應，也都傾向於肯定出席亞銀的做法。「高招還是險招、北平如何接招？」(4/7, 2, 7 版)一文訪國內外學者，都肯定此一決定，中共在「統戰」上會表歡迎但未必會接受台北的「彈性外交」，而政府的彈性外交是否關涉大陸政策調整的看法較分歧。四月九日頭版報導外交部長連戰在立法院表示政府正在研議「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府」的構想，這兩天分別出現關於「一國兩府」構想的分析。十二日出現中共批評「一國兩府」說法的報導，《中時》的社論也以「『一國兩府』的展望」作回應。同時也分別刊出留美學者的兩篇專文，一篇是楊力宇教授的「從『一國兩對』到『一國兩席』—『奧運』及『亞銀』模式的實與虛」(4/12, 2 版)，以及丘宏達教授的「『一國兩府』的概念與突破外交孤立」(4/19, 2 版)。此後隨著亞銀年會接近，相關新聞增多，但在社論(4/21, 3 版)及記者的分析(4/ 26, 2 版)中，強調的是大陸政策調整的需要。

在亞銀代表團北京之行的報導，《中時》以相當大的篇幅報導相關的細節。它在大標題中以「踏上大陸國土 四十年來第一步」(5/2, 2 版)來描述此一時刻，郭婉容於記者會強調亞銀是「政府與政府間的官方金融組織」，中共方面低調的接待，以及代表團的活動都有顯著的報導。在兩岸學者的訪談報導中，它也突顯參加亞銀再對兩岸關係上的意義，在標題中以「在對等原則下互動，在務實取向中溝通—兩岸學者看我出席亞銀年會使雙方關係向前邁進」(5/2, 7 版)強調之，

旁邊配以記者的特稿「郭婉容的一小步、大陸政策一大步」。然而兩岸學者對此其實看法不大相同，大陸學者嚴家其認為這是「開放的一個標誌，海峽兩岸在一個中國的概念下，逐步往統一的方向---」，而台灣的學者張麟徵則認為「我們的訴求是官方代表，希望中共能接受---可以想見希望不大」，兩岸交往不會有「太急遽的轉變」；林碧沼也指出「兩岸目前各種對等條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建立互動關係。記者在特稿中指出，現在台灣的外交無法和內政(中國)分開，現在「台灣已在台海對峙關係上向前走了一步，並等待著中共相對應的一步」(5/2, 7版)。

五月四日亞銀開幕式當天，《中時》就以頭版頭條報導代表團將不迴避中共的國旗與國歌，反應的報導顯示學者中支持者較多，立委則意見分歧。五日的新聞則出現郭婉容與團員及政府官員對此決策的說明，中、日等代表肯定「起立」一事，朝野立委與國大也多「予以肯定」。報導中也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大都分散在內文中，學者黃越欽指不迴避可能造成國內「敵愾性」的消退、瓦解，另一學者王志文則憂慮決策與法律上的落差，而政務委員沈君山認為不能為注重國際禮儀而「致大陸政策的不一貫」(5/5, 3版)。同日刊出兩位學者的專文，指出起立和大陸政策的關係，田弘茂指現在「我們什麼都做了，他們連一點代價都不必付」，如果中共沒有善意的回應，「整個大陸政策都應該要檢討」；趙春山則認為這是一個我外交上「主動出擊」，也是「審視中共種種參與的反應」的絕佳機會。此外，「亞銀年會兩岸觀點座談會」中報導了大陸新聞工作者與中共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李家泉，以及美國紐約大學教授熊玠，對台灣參加亞銀年會的看法。李家泉直指郭婉容赴大陸是「一國兩府政策指導下，一個重大步驟---但不是向統一方向邁進」，但「在客觀上一定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和諧與改善」(5/5, 4版)。

六日以後的報導，偏重於郭婉容於會議中提出對更改我名稱的抗議，亞銀年會議題與活動的報導，以及國內李總統及立委等對起立動作的支持和批評。評論主要都針對此行的成果和意義所做的評估，例如「主動出擊、使我與國際間關係活潑化」(5/6, 3版)，和「亞銀模式將成兩岸發展關係的試金石」(5/7, 2版)這兩篇報導；以及對此後的展望：「亞銀年會後兩岸關係的新情勢及因應之道」(5/7, 3版，社論)，「我們應該怎麼做？」的分析(5/7, 3版)，「亞銀震盪的後續問題應未雨綢繆」(5/8, 3版，社論)。文中強調亞銀之行我已做了一種突破，中共也應有所回應，而國內的戡亂體制的相關法令及大陸政策也應有相應的調整。在李總統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的報導之後，「亞銀接觸後 下一步要怎麼走？」報導了學者對此行的評估和未來的展望，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指此行還不是「一國兩府」的實踐，因為「它太接近『兩個中國』的實際，今後要在外交上打開出路，「要儘可能在『一個中國』的解釋上找尋更具體的說法」；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廖光生則認為只有「一國兩府」這做法，「台灣才有前途」，但應儘量爭取「平等」而非「對等」。十一日刊出法學者王志文呼籲政府檢討修正動員戡亂體制的文章，以及李念祖促政府釐清大陸政策一文。

《自立晚報》

從四月六日登出政府即將派代表參加亞銀年會，《自晚》的新聞與評論大致環繞著亞銀年會的相關事宜、大陸政策、及兩岸官方關係的定位等問題。在「社評」(5/7, 5/8, 2 版)中分別就參加亞銀年會，肯定此為主動出擊和告別「三不政策」的決定，也刊出該報民意調查八成民眾支持該項決策的結果。學者反應意見的報導指出了此行「攸關兩岸政府如何彼此認定」(5/7, 2 版)的看法。十五日刊出立委林錡祥表示「一國兩府」構想的提出，「事先並未與政府官員『套招』」(2 版)；十七日頭版刊出法務部長蕭天讚在立法院關於「一國兩府」的失言風波，指出「執政黨決定請俞揆在立院收回」。關於「一國兩府」的討論，分別有社評「談『一國兩府』李鵬的表態」(4/16, 2 版)，學者李鴻禧的「談『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府』的齟齬訟爭」(4/17, 5 版)，以及記者的「『一國兩府』為何採煞車？」、「『一國兩府』明年再出牌？」、及「『一國兩府』何時『出牌』，要看對岸如何『叫牌』」(17, 18, 19, 2 版)三篇分析稿。在記者的「現代雙承記—台北與北京的新關係」一文中，對政府大陸政策出現「一頭熱，兩頭空」和多處矛盾提出了批評。

亞銀代表團在北京這段期間的新聞報導，大都佔據顯著的版面和篇幅。代表團抵達北京之日，《自晚》在頭版頭條以「跨國兩岸分裂四十年歷史大步」的小標作為此行的註解，當日社評重述了此行「邁出『歷史性的一大步』」。記者的分析稿則對兩岸各自低調的對應方式，顯示台海雙方「都已準備體諒，做下減緩衝力的必要措施」(5/2, 5 版)；同時在「參加亞銀年會兩岸接觸，實現既定政策展開拔河」(5/3, 2 版)報導中分析代表團積極的公開活動，指出這些都是「一國兩府」既定政策的「必要產物」。在「登陸北京效應」的報導中，報導了大陸學者預期亞銀模式帶來「台灣內部將群起效尤」的影響，另一則「中共仍是叛亂團體嗎？」(5/3, 2 版)報導了立委的質疑。四日頭版頭條報導「奏中共國歌郭婉容起立」，2 版的新聞則有立委正反不同意見的報導，「民進黨文宣部表讚揚」的報導，以及呂亞力等學者對此做法傾向於肯定的報導。記者的分析稿「聽中共國歌起立致意是一著棋…」(5/4, 2 版)，指出此舉「暗含承認對方主權地位的意義」，對我宣稱代表全中國的立場是一大變更，對中共一國兩制政策則是一大刺激。

五日的報導對「起立」一事的反應持續報導，除了「郭部長『起立』決策官員憂慮」的報導，資深民代的不同反應，還有學者王志文對政策與法律的衝突提出的批評。「亞銀模式『發酵』出重重疑雲」的分析指出，許多的疑慮除了對策略上「一廂情願」和「自失立場」的批評之外，也是對「更基本的動機的質疑」，「目前可見的卻是『兩府』的推動，『一國』的作法在哪而呢？」(5/5, 2 版)。對亞銀模式引起的政策和法律上的問題，五日的社評及其後的分析稿多次要求政府釐清「國策」的矛盾，檢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等法律以及大陸政策。九日報導了李總統接受日本讀賣新聞的專訪，同時也有記者的分析稿「李總統---談話，兼具『對內安撫』『對外放話』深意」。十二、十三日的「打開『黑箱』中的關鍵決策—亞銀代表團北京行的真相與背景」，以揭祕的方式報導了亞銀年會之行決策

過程的幕前幕後。

比較特別的是，《自晚》於五月六、七兩日以相當顯著的版面報導了新聞媒體於北京所造成的風波，「亞銀年會新聞界介入攪和！記者瞎掰新聞逾越應有尺度引人詬病」(5/6, 5 版)這個新聞之外，也報導同在北京的不同媒體記者的看法，以及特定媒體(聯合報)記者的一些表現。七日則報導了傳播學者對亞銀年會期間新聞媒體表現的看法。

《聯合報》

四月七日頭版頭條報導了政府宣佈將派官方代表參加亞銀年會的決策，同版也報導了外交部發表此決定與「三不政策」並不抵觸的聲明。二版中，「敏感而實際的決定」報導了學者對此決策的看法；「大陸政策重新定位?!」分析此為李總統彈性外交的政策的一步；「大陸政策不能斷層」一文要求政府調整兩岸交流的相關法令；同時分別報導了台港商界和大陸人士對此決定的看法。而社論也表達了對大陸政策的關切。此外，三版整版都是關於亞銀代表團成員、亞銀、及代表團入境等的相關報導。八日除了亞銀相關的新聞，頭版和二版都以顯著的版面和標題報導政府將開放公教人員探親的新聞；社論「兩岸關係應重視現實」強調政府不宜以「個案」處理外交和大陸政策，亞銀年會模式「這樣的現實原則實宜更廣泛的成為指導處理與大陸關係的通則」(5/8, 2 版)；九日的社論「『三不』政策的彈性運用」認為兩岸應多接觸而後才有談判和妥協，政府的彈性外交也應運用於大陸政策。學者周煦的「『對等政府』重返聯合國？」(4/9, 2 版)，以及社論「『對等政府』與『一國兩政』」(4/10, 2 版)，則是針對「對等政府」及「一國兩府」這些構想的討論。十二、十三日兩天於二版及一版刊出了中共方面對「一國兩府」說法的批評，以及十四日中共的中新社對「推廣台灣經驗」之說的批評(4/14, 9 版)。十九日頭版報導了行政院長俞國華對「一個中國」的闡釋；二十一日頭版刊出中共外交部記者會，其發言人對「一中兩府」等問題的回答；二十六日社論「『一國兩制』乎？『一國兩府』乎？」則可視為對中共說法的回應。

對郭婉容等抵達北京的報導，《聯合》五月二日的頭版頭條標題為「兩岸關係 歷史新頁」，在二版頭則以「開幕式 不規避？向中共旗歌主席致意 有團員認是全面撤退」一文，對代表團可能的做法提出質疑，並且指出團員中有不同的意見。除了亞銀的新聞之外，二版也刊登了旅美學者丘宏達「試探『對等政府』」一文，以及高資敏的「再論『兩個中國』」。三日的新聞持續報導開幕式如何面對中共旗歌的問題，包括學者專家看法的報導，以及對四百多位大學教師民調結果的報導(四成九贊同對中共旗歌致意，三成七反對)。四日署名李圓發表的「是旋風？還是弄堂風！」(5/4, 3 版)，對代表團不迴避中共旗歌的決定嚴詞批評；同版對郭婉容記者會的新聞則出現負面的描述，標題「隨著問題的尖銳化，她的雙手開始緊揉桌布」郭婉容大聲喊『什麼』！」。五日頭版報導了代表團起立的新聞，以及郭婉容對此決定的說明(& 3 版)，二版則報導了民意調查有「過半數受訪民眾贊成」的結果，以及政府官員、立委、民進黨、及軍方人士對此的意見，

標題和受訪意見以負面的評價較多。此外，「新聞切片」小欄的評論「中共是什麼？」，社論「不要讓大陸政策滋生觀念混淆」；以及，三版刊出的學者看法的「起立 起爭議」，和丘宏達的「亞銀問題與『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些文章或從法律，或從決策過程或從「國策」提出批評。六日更以相當大的篇幅(三版全版)報導李總統與俞院長的看法(頭版報導「李總統傾向『局部出席』」)，郭婉容的說法；分析和詳細報導會場可迴避的可能，決策過程，以及不迴避的利弊得失；以及團員不同意見的「內部分歧」。

代表團結束北京行之後的報導，以各方對此行的評估和它所帶來的影響為主。八日頭版「總統說：『圓滿達成任務就好』」並沒有太多的說法；「亞銀年會是『單獨事件』？」則指出行政院將對現階段戡亂體制、大陸政策有所釐清。二版刊登了兩篇學者的專文，「我國『動員戡亂時期』應如何終止？」和「分裂國家－我們國際法的適當定位」，討論了當前所關切的兩個問題。社論「歡迎亞銀代表團歸來」中，也指出出席亞銀的效果不只是外交層面，也涉及憲政體制的全盤性探討，同時也指出「外交決策黑盒子」的問題。三版報導對郭婉容的訪問，在記者特稿「郭部長 全從哪裡來？」中質疑誰是真正的決策者。九日頭版刊登了李總統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的全文(部分登於二版)，其標題為「總統說：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一國兩府」不代表政府政策」。社論則是要求政府「檢討大陸政策」。二版還有「旗歌效應」的三則報導，分別是「民進黨聲明指國民黨行動是揚棄一個中國主張」，「增額國代邀郭部長報告」，以及「大陸政策應更開放？」中工商界大老強調經貿政策應兼顧個人與國家安全。三版刊登了郭婉容的記者會全文。十日頭版報導行政院發表聲明指代表團與「我國反共基本國策並未違背」，以及立法院決邀郭婉容報告亞銀年會及其衍生的問題。社論「以李總統『務實外交』的內涵確立政策再出發的」一文中，對近期相關的討論做一總結式的評論。此外，它也接連兩天持續報導決策者和決策過程的問題，包括「決策邏輯真有『兩套』？」(5/10, 3版)，及附帶圖表的「『起立』事件如何發生，『決策』參與理路不明」(5/11, 3版)這兩篇「採訪中心」的特稿。

三、三報對「亞銀年會事件」報導的比較

由這三家報紙對亞銀年會事件的報導可以看出，新聞報導涵蓋議題的範圍不僅僅是出席亞銀年會此單一事件，而是由幾個連鎖的事件組合而成，從彈性外交、一國兩府的論述事件及輿論的形成過程，中共對彈性外交和一國兩府的批評，出席亞銀年會此一過程，以及出席年會和起立致意這些行動所引發的效應。基本上，三家報紙報導涵蓋的事件與議題都有相當高的重疊性，《中時》與《聯合》的版面較多，新聞和評論的數量雖然比較多，但是針對亞銀年會事件主要的議題與事件上差異並不明顯。

另一個相同點是，學者的意見和文章在這段期間出現的比率相當高，許多訪問和專文都位於重要版面(一、二、三版)，顯著性頗高。學者、政府官員和立委、

記者(和社論)可以說是這些報紙輿論的主要發言者，學者和記者通常扮演對事件的分析者和詮釋者角色，立委則多半是反應者，政府官員較複雜，有時是反應者，但有些人(例如郭婉容、李總統等)則是主角。

就差異上來說，三家報紙處理這些事件與議題的方式各不相同，主要的差異可以分為三點：

1. 比較明顯的差異在於《聯合》對亞銀代表團決定全程參與開幕式，並未選擇迴避主辦國中共的國旗與國歌這件事，明顯的持批評的觀點，而這點從新聞和評論多天持續關注這個問題可以看出。這差異不只顯現於評論，也出現於不同新聞真實的建構，例如《聯合》報導「李總統傾向『局部出席』」(5/6, 1版)，而《中時》的是「總統府否認所謂傾向局部出席之說」(5/7, 1版)，《自晚》則是「李總統曾指示代表團盡量參加亞銀安排活動」(5/6, 1版)。其他新聞，例如對郭婉容說詞的報導和對郭個人的情感性的描述，也都有相當不同的取向。
2. 三家報紙都給予學者的意見相當顯著的位置，而三報的學者意見呈現觀點上的差異，尤其是在學者署名的專文上，《自晚》有李鴻禧和陳必照等；《聯合》有周煦、丘宏達等；《中時》有楊立宇、田弘茂、丘宏達等。而訪問學者意見的報導，通常一篇報導中有三位以上的學者意見，學者的意見比較多元，除本土和旅美學者的意見之外，有些報導也加入大陸學者的意見。
3. 對此事件和相關論述的詮釋上，報紙記者的特稿佔有相當大的份量，但是《聯合》在 4/7 ~ 5/12 之間總共有十三篇社論，遠高過《中時》的七篇；《自晚》有十二篇社評，但皆屬三百字左右的短評。

從不同波段的報導來看，初期針對政府決定出席亞銀年會這個決策，三報都有相當多的討論，這些公共意見的形成過程，和政府對出席決策的官方說法、「一國兩府」論述的拋出、朝野政黨、以及中共的反應，相互之間形成微妙的互動關係。這些不同的意見與觀點，隨著代表團赴北京及其後事件的發展，產生不同的變化。雖然前面提到三報在「起立」事件之後出現相當不同的報導取向，但是，三報是否真的有觀點和價值判斷上的差異？還是只是不同的「聲調」？

四、媒體公共論述中的「亞銀事件」

(一) 突破：出席亞銀年會的決策

三報一開始對赴北京亞銀年會這個決策的反應並沒有明顯的不同，都將此舉視為一「大突破」，將此視為「彈性外交」強有力的作法。三報都將這決定關連到大陸政策和兩岸關係的討論，但在這裡，三報則顯露出不同的傾向。雖然外交部發表的聲明指這決定和「三不」政策並不牴觸，《自晚》的社評認為：「政府實際作為上已突破『三不』，我們期待政府對大陸政策更明朗開闊」。《中時》的社論指出「---未來的兩岸關係，可能是我國重現國際社會的重要關鍵---雖然外交部

再三重申「三不」政策的基本精神不變，我們相信，亞銀出席模式不止是彈性外交的進一步行動，也將是為兩岸關係定位的一種探索的先聲」。《聯合》的社論則表示「這樣的突破也可能發生若干連鎖反應---大陸政策應是整體性的政策，因而，這一作法，不能視為個別的、孤立的所謂『專案』，我們希望由此而使朝野對於彈性外交與大陸政策，有更積極與現實的考量」。三報的差異顯示關切的重點各有不同，《聯合》的社論對此決定比較持保留的態度，這和《自晚》的樂觀和敦促大陸政策開放的態度明顯有別，《中時》則是較審慎樂觀，在贊同彈性外交的同時，將「中國只有一個」的原則和未來發展關連起來。而這些差異和它們對此一決策的評估及對未來期望的不同似有內在的關連。

三報社論所表達的觀點，和其他新聞報導之間未必是全然相互應和的情形，這和新聞報導通常包含不同機構、單位、和個人的相關訊息和意見，但是在社論、記者的分析稿(特稿之類)之間，則有較多觀點上的一致性。《聯合》一連三天的社論討論大陸政策，4/8的社論延續前一天「整體性」的觀點委婉地批評政府「個案」的說法，認為今天海峽兩岸「與前已大有不同---但兩岸政府---在觀念上仍未作根本的調整---赴北平出席亞銀年會---這樣的現實原則宜更廣泛的成為指導處理與大陸關係的通則」。九日社論「『三不』政策的彈性運用」，進一步主張政府的「三不」政策「不是扣扣相結的三連環的政策，而應該是三階段---先有接觸，而後才有談判；有了談判，然後才看能否妥協」。社論中對政府大陸政策可能跳躍式作為產生疑慮，這種質疑也出現於「大陸政策不能『斷層』，相關規定如不調整 難杜民眾悠悠之口」(4/7, 2版)，以及「大陸政策 連番突破 執政黨中常委無異議？」(4/9, 2版)這篇報導中。《中時》則在「出席北平亞銀的意義與可能衍生的問題」(4/7, 7版)的記者分析稿中肯定政府的「主動出擊」和「三不」政策的靈活，同時也指出它顯示出「『外交政策』和『大陸政策』的不可分割性」。《自晚》在前幾天並無記者的分析，但有「開放大陸政策重要事件演進表」和「政府目前禁止兩岸交流項目」表。

三報對出席亞銀此一決策的詮釋，從上述分析可知，顯現一些差異。不過，從新聞報導來看，三報報導中所呈現的意見大都持肯定的立場，包括學者、在野黨、美方、及民調(自晚，4/8, 2版)。從這些意見中對此事的敘述，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詮釋方式：外交上的彈性做法，政治實體的彰顯，兩岸關係定位的測試，有助於未來大陸政策。這些不同的詮釋方式形成三種不同的類型：彈性外交／政治實體；彈性外交／大陸政策；彈性外交／兩岸關係。

第一種詮釋類型：並不傾向於或不主張把彈性外交同大陸政策連結起來。例如學者高英茂認為此次出席亞銀的決定顯示出政府「要在外交上突破的決心與意志」，而我方「若能站穩『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的既定立場，並以台澎金馬地區的合法政府自居，則中共既無法否定此歷史事實，自然也需尊重我之地位」；而「此次參加亞銀年會，只應視為突破外交空間的彈性做法，而不該與政府既定大陸政策的推展混為一談」(中時, 4/7, 2, 7版)(高英茂類似的說法也見於聯合, 4/7,

2 版)。類似的觀點也見於學者李鴻禧、林嘉誠(自晚, 4/7, 2 版)。

第二種詮釋類型：將此次決定視為彈性外交的突破，同時也認為此舉對大陸政策也具有意義，特別是民間交流的部分。除了上述《聯合》社論持此一觀點，其專欄「黑白集」(4/7, 3 版)指「突破之後」也應開放公教人員探親；企業家王永在認為年會後政府「應重新檢討目前對大陸經貿政策，並開放國內廠商與大陸間的直接貿易、投資」(中時, 4/7, 理財、投資版)。學者蘇起認為派遣官方代表團對國內的衝擊可能會比對大陸來得大，因為「今後政府解釋『三不』政策時將更為遷強」(中時, 4/7, 7 版)。

第三種詮釋類型：認為參加亞銀年會的外交突破，也會影響兩岸關係。學者楊力宇認為「--這項決定--顯示中華民國積極推動彈性外交，重返國際社會的決心--再者，當局已明顯的突破了『漢賊不兩立』的逃兵心態--相信今後兩岸的互動將受到更大的鼓舞」(中時, 4/7, 2 版)。學者丘宏達認為此項政策「不僅反映了民意，也是彈性外交的突破--更把『三不政策』的適用範圍縮小」(聯合, 4/7, 2 版)。

這三種詮釋類型可以說是「亞銀年會事件」一開始，在報紙論述空間中，對政府宣布參加亞銀年會此一決定，所呈現的幾種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都肯定出席亞銀年會的決定是「彈性外交」的一大突破，但是對此突破的期待則不盡相同。第一種類型不希望彈性外交和大陸政策有所牽連；第二種主要關切的是兩岸民間交流和國內政策的影響；第三種類型較從外交突破上肯定此彈性作法，也認為對兩岸關係具有意義。

然而，隨著政府於立法院再提「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府」的說法之後，相關的討論很快針對這個「官方說法」提出討論，爾後也進一步將它和出席亞銀年會這件事關連起來。「一個國家 兩個政府」的說法最早出現於三月二十八日立委林鈺祥質詢行政院長俞國華時，提出這個說法，四月八日外交部長連戰於立法院接受質詢時，表示行政院長已經指示外交部研議此一構想。連戰同時也指出，我國將致力於重返所有的國際組織，而重返聯合國亦將是我國的終極目標⁵¹。「一國兩府」的提法使得出席亞銀年會這件事變得更複雜，下面我先分戲這三家媒體對此一提法的討論，以及公共論述在此後隨著不同事件的發展而出現的變化。

(二)、「一國兩府」的評述

三報對於「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府」(以下簡稱「一國兩府」，《聯合報》有時用「一國兩政」)這個說法的討論，大都以特稿、學者的專文、及社論對此進行闡述與評析。在連戰的發言之後，剛開始只有《中時》和《聯合》有相關的分析 and 評論。至十二、三日報紙(即前述兩家報紙)報導中共官方喉舌對「一國兩府」這個提法的批評，《自晚》才在社評中論及此一政策，但也只是宣示地指出「中華民國的具體地存在，是誰也不能否定的事實。--任何建議，假使不能面對台灣

⁵¹ 關於此新聞的敘述出自「『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府』構想實際 外交部決就其內含研意充實」(中時, 4/9, 1 版)；「重返聯合國是我終極目標」(自晚, 4/8, 2 版)。

的具體存在現實，到最後都只是沒有意義的政治口號」(4/13, 5 版)。

《中時》九日的分析「『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理念逐漸形成」中，指出將出席亞銀年會「視為一項嘗試形成『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架構，應也符合客觀認識法則」，「『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即存在的客觀現實，如今，台灣方面已進一步將這種客觀的事實提升為主觀的認知與期待，反觀中共如何面對現實，將『一國兩制』之自視為中央，視台灣為地方政府的主觀期待，調整為---顯然還在互動醞釀之中」(4/9, 2 版)。次日，另一位記者的特稿「一國兩府能否開出新彈性空間」(4/10, 2 版)，卻認為一國兩府這項新政策「表面看起來是對中共的一次讓步---以今天中共與我國在國際間地位之高下，我們實在說不上讓步，不如說是改採較符合現實及我國利益的政策---中共不見得樂意做相對的讓步，因為用不著，---解決外交問題，必須從海峽兩岸關係的調整下手---這次亞銀之行，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而言將是歷史性的一步」。這兩篇報導對「一國兩府」政策與亞銀行之間關連的看法雖同，對此政策的評估的角度卻不相同。

社論「『一國兩府』的展望」(4/12, 3 版)對此政策的評論則有較具體的主張，該文的主要觀點可以分為三點。第一，一國兩府是「針對中共『一國兩制』的訴求，提出回應」，最大的不同在於「對等政府」與「各擁主權」；此構想「基於雙方立足點對等的地位，不但顧到現實，而且也不損害未來中國走向和平統一的前景」。第二，此構想的實行會有阻礙與困難，但「通權達變一向是中國人慣用的處世守則」，今天我們「有明顯的疆界(台灣海峽)，有不同的制度，但是卻也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共同的血統，共同的文化，為何不---先求突破四十年對峙的局面，讓雙方現作經貿文化的交流---必然有水到渠成之一日」。第三，在「一國兩府」構想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決策過程要慎思熟慮之外，心理上也要做好準備，如獲對方善意回應，「三不」政策應調整、經濟與資訊要逐步全面開放，同時維持強大武力以維護主權和精進民主化以爭取全中國人的向心力。

在這些對討論中，「一國兩府」的評估大抵上是現實主義的觀點，此一說法符合既有認知的「現實」，同時他者— 中共 —的反應，也包含在此一評估之中。社論對「一國兩府」的析論中，以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不同的敘述，為「一國兩府」做定位。在論述此一構想的「前瞻性」時，它說道：「統一仍是雙方的長期目標，而在未達成—之前，暫時仍維持現狀，但可消除敵意，促進交流---為統一做準備，為子孫謀幸福」。它進一步引用歷史事例作為「一國兩府」之證成，也就是民國十年，北洋政府與南方的革命政府「實質上就是一種『一國兩府』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簽訂凡爾賽合約時，中國代表團就是北四南一。而今天，「我們有明顯的疆界---，但也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共同的血統---」，讓兩岸先做經貿文化的交流，未來「必然有水到渠成之一日」。這裡，言說所訴求的對象乃是對岸。在另一個訴求上，其對象為政府，如果對方有善意回應，政府應當做好應有的準備，而「一國兩府」觀念的提出，顯示「過去恐共心理及僵化的態度已不復存在」，雖距離全面重返國際社會的理想尚遠，「但只要理念有創意，使之成為國際間一個可行模式，則我們的生存空間就可拓寬，全中國的前途就夠光

明」。

社論中對國家定位的論述，和官方的「漢賊不兩立」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自我中心的觀點，已經完全脫鉤。以兩岸的對位觀點作為自我界定的方式，而這方式內含於它對中國大陸的訴求之中，亦即希望對方能夠承認它所論述的自我存在的此一「現實」。它對南北政府的歷史敘述和共同血統、文化的民族敘述，把這自我-他者之間的差異，重新(再次)定位到一個共同的歷史與文化架構之中，在這之中，兩者間的差異因而達到某個程度的模糊化。

《聯合》對「一國兩府」的初步討論，可見於學者周煦所發表的「『對等政府』重返聯合國？」(4/9, 2版)一文，以及社論「『對等政府』與「一國兩政」(4/10, 2版)。周煦一文對重返聯合國一事直言「只要中共不放棄反對就不可能--- 由於海峽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而任何措施凡是不符合此一概念者均難行得通，這是一個認清現實的作法」。至於「對等政府」，該文指出這「是一個相當具突破性的作法--- 可行性方面，現在是不可能的，只要中共不放棄其一國兩制---但這並不表示不能做--- 如果中共確實希望能保持一個中國，則應該接受『對等政府』的概念與現實，因為這有利於長期後的雙方關係」。而社論中對「一國兩府」的評論先批評了「『一國兩制』無異是使台灣向大陸投降」，而「對等政府」和「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此一提法「不管是對台灣、大陸、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甚至是全球的華人而言，都是饒富深意的」。文中舉出這個承認「一國兩政」與「對等政府」可以有「消弭台海衝突、堅持統一、否定台獨、重回國際社會與減輕軍事負擔」這五項好處。而且「只要從下列三方面著手，中共當局應該會仔細反省此一政策的正面價值--- 第一，由政府發表一項正式聲明--- 此一政策一方面堅持了中國統一，否定台灣獨立--- 第二，如果中共當局願意接受此一政策與觀念，中華民國當局願意--- 經援對象，擴及中國大陸--- 第三，政府--- 鼓舞海內外的中國人，呼籲中共當局接受此一善意與和平的政策提議。---」。

在這些評論中，現實主義的觀點再次出現，而且也可以看到，此一觀點(在上述兩報的論述中)包含兩種判斷，一個是肯定現狀如此或是某某提議是合理的，但在另一方面則認為對方不太可能接受，而又希望對方能接受。《聯合》的社論把「一國兩府」的構想和「堅持統一，否定台獨」連結起來，暗示這為此一政策成敗的關鍵。而此一連結中隱含的關聯性的假設，以及它敘述中諷刺的語調，可以說是對「一國兩府」言說者的懷疑，這種懷疑也就是實情可能它所建議的「堅持統一，否定台獨」的相反。

上述兩報社論雖然立論不盡相同，同樣的是，它們都將「一國兩府」視為對「一國兩制」的相對提法，也就是認為這是政府用來抗衡中共「一國兩制」的策略。同樣地，兩者都在文中述及民國初年南北政府的歷史，以此例作為目前兩岸現狀的類比。另一點相同的地方，就是這兩篇社論訴諸同一民族的理路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是以「中國人」的稱名，或者以「共同的語言文字，共同的血統，共同的文化」來召喚此一民族，其訴求同理心的方式是相同的。

關於「一國兩府」的討論，在十二日出現中共批評此一說法的報導，以及十八日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於立法院重申「一個中國」和「大陸政策是內政問題不是外交問題」，這些接連出現的事件，是否對「一國兩府」相關討論有所影響？三報在這段期間的評論，比起之前，略為增加，以下是對三報相關討論的分析。

在報導中共的「中國新聞社」批評「一國中國，兩個政府」為「實現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夢想」(4/12, 2版)之後，《聯合》於社論「『一國兩制』乎『一國兩府』乎？」(4/26, 2版)中，以「若無『一國兩府』，又怎能實行『一國兩制』？」反駁「兩個中國」之說。在五月二日學者丘宏達的專文「試探『對等政府』？」(2版)，把出席亞銀年會開幕式、中共旗歌的問題，和彈性外交及「對等政府」這些一起來看，則「似乎更耐人尋味」。文中指出台北目前採的是「彈性外交」或是「一中一台」屬主觀認定的問題，但也有跡可循，「一是台海雙方是否改動憲法---二是國內史地教學的問題」。

《中時》十二日於頭版頭條報導了中共對「一國兩府」說法的批評，同日除了上述的社論之外，還有學者楊力宇的「從『一國兩隊』到『一國兩席』」(4/12, 2版)專文。此後，則有記者的分析稿「臺海兩岸關係各吹各的調？」(4/16, 2版)、以及學者丘宏達「『一國兩府』的概念與突破外交孤立」(4/19, 2版)的專文。楊文指出奧運的兩隊模式和亞銀的兩席模式，「使兩岸關係有了突破性的發展」，由於中共至今仍堅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政治上仍堅持一黨專政、不放棄武力統一的可能性、以及堅持其對「一個中國」的解釋，兩岸之間政治性的接觸仍不可能，但「非官方的接觸從『一國兩隊』到『一國兩席』模式，取得了重大的進展」。記者的分析文則指出「一國兩府」是「解決兩岸發展的可行方式」，但也指出台灣內部就此一宣示，產生了對大陸政策和決策民意基礎的問題，「在統獨爭論不休之下，任何未經充分討論及民意監督的決策，都可能導致動亂」。丘文則是從歷史指出「一國兩府」概念來自於美國，台灣關係法承認我政府，美國實行的是「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政策，而「『對等政府』」---是觀念上的一大突破----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突破國際孤立的可能(這並不表示一定能突破)。

《自晚》對「一國兩府」相關的報導與評論出現較晚。學者李鴻禧的「談『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府』的齟齬訟爭」(4/17, 5版)專文，指出從「事實論」來看，兩岸都是兩個「實體的」完全國際法人，「這兩個『國家』各依其主權，來統治其『國家』。『法律論』上之『只有一個中國』---毋寧是臺海兩岸這兩個政府的意願和期望」。近來，中共以「一國兩制」來替代往昔「回歸、統一」的抽象口號，而台灣則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改提類似聯邦制度的「一國兩府」，中共的「一國兩制」與聯邦對邦的尊重相去太遠，台灣這「實體國家」怎會接受？除了李鴻禧這篇文章之外，記者的「『一國兩府』為何踩煞車？」(4/18, 2版)的分析稿，則指出政府對「一國兩府」構想的踩煞車，是因為「一國兩府」的實踐將使現行憲政體制與統治基礎面臨根本性的變動。因此「一當民進黨籍立委黃煌雄由一國兩府問題，引申出制定新憲法，結束動員戡亂時期的要求時，執政當局以往致力

維護的政策與體制間的平衡遂告斷裂，而決策階層也不得不就此一問題重作定位」。

三報對「一國兩府」的討論，從政治實務或從法理分析此一概念的涵義及其可行性，然而，從新聞的發展也可以看到，相關論述的過程存在著不同力量之間的相互影響。中共的批評引發媒體對此的回應。而「一國兩府」概念為在野黨進一步地引申和詮釋，據以要求政府立即終止動員戡亂體制，重建正常台灣新憲政體制。在野黨立委在立法院質詢的這類發言，促使行政院長重申「一個中國」和強調臨時條款在維持國家安全上的重要(自晚，「俞院長談外交靈活務實做法 仍堅持一個中國信念」，4/18, 2版)。有趣的是，三報對俞院長發言的報導，各自做了相當不同的選擇：

《聯合》的「俞院長闡釋『一個中國』—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4/19, 1版)中，敘述了「俞院長---以堅定的語氣說明民主、自由、均富的統一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答復明確、簡單、扼要，贏得在座立委兩度熱烈的掌聲肯定」。文中還報導了：「立委私下討論為何俞院長未說『統一的中華民國』而說『統一的中國』，其結論大致認為，俞院長宣示的應是『制度的統一』而非『政權的統一』。在同一標題下的另一則新聞，報導了俞國華的另一個發言：「彈性外交並不表示政府已在事實承認中共政權代表大陸主權與大陸人民」。

《中時》則報導了俞院長回答民進黨立委質詢時表示，「大陸政策是國內問題，政府的大陸政策有五個具體目標：(一)維護中華民國憲法、(二)反對馬列共產主義、(三)保護復興基地安全、(四)支持大陸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之人權運動、(五)強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行動」(4/19, 2版)。同版的另一則報導則是「何謂彈性外交 俞揆說---」；以及一篇記者的特稿「法律邏輯與現實政治應力求平衡」。這篇報導分析俞國華的言說，這些宣示顯示了「法律邏輯與現實政治的矛盾」，而問題的關鍵在於「過去我們對中共政權和所謂的統一中國的法律認知，已經根植了四十年，驟然改變---我們的社會要如何來調適這種迫於現實的『彈性』認知？法律邏輯與政治現實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如何求得，才能確切維護國家的利益，這些都是亟待釐清的。」

政府從「一國兩府」說法的退卻，或許因為可能動搖其統治基礎，或者因為因為來自中共的反應，《自晚》一連三天的分析報導(4/18, 4/19, 4/20, 2版)都指向這些因素。記者在「現代雙城記—台北與北京的新關係」(4/24, 2版)中更批評政府此一決策「對台海兩岸既存的諸多差異與對立關係，未予以審慎的評估與精確地掌握，因而---稍遇批判或內部保守勢力的抵制、杯葛之後，都將化為幻影」。而在大陸政策上，「從台海兩岸政治上的『漢賊並立』、軍事上的『敵我對立』--以至經貿上的『互補互利』，顯見台灣的大陸政策已陷入多重分歧、價值混淆的荒謬境地」。這篇分析報導可以說是間接地對大陸政策裹足不前的批評，類似的批評同樣見於該報社評「可變·可不變與不可變」(4/19, 5版)中，該文要求政府

應當「對現階段兩岸關係之和平發展有利而可變者，應以最大決心、最快速度加以變革」。

同樣地，《中時》的社論「鄭重進行大陸政策的檢討與評估」(4/21, 3 版)，也對政府政策上的退卻感到憂慮，「有些人擔心大陸熱過分升高--- 敵情觀念與憂患意識將日漸消散---也有些人則害怕政府對大陸政策會失去主導權，而受制於民間壓力---- 我們大陸政策的總體目標是影響中共---- 為中國的良性統一鋪路--- 我們不應期望兩三項『開放』措施就能奏效，而應採多方面的主動措施」，該文最後建議政府設立大陸事務專責機構，以處理錯綜複雜的大陸事務。

這種對大陸政策在民間交流上更加開放的要求與期待，同時見於三報的評論與所報導的意見中(見前述關於《聯合》相關的評論與 4/9 的社論)，這種期待，從早先政府宣布參加亞銀年會時的樂觀期待，隨著政府的表態，反而出現擔心政府在大陸開放政策上也退縮的憂慮，因而形成敦促性的言論。但是在另一方面，對於政治層面的兩岸關係上，報紙則顯得較有保留。經過一連串的事件和論述上的變動，三報在亞銀代表團出發前往北京時，對此行意義的詮釋也產生若干的變化。《自晚》社評認為此行「要緊的是雙方應儘量消除敵意」。而《中時》與《聯合》的社論，不約而同地主張「不宜賦予過大的意義」和「不必過份的政治化」：

《聯合》社論中指出「此行具有多層面的意義：一是突破亞銀會籍問題的困擾，一是為政府彈性外交拓展空間，一是積極參與亞銀---，一是增進大陸同胞對我---的認識」(5/1, 2 版)。丘宏達一文(5/2, 2 版)中此行與「試探對等政府」之間的關連，社論並未提及。

而《中時》的社論則指出「中共的態度---不準備以郭部長此行作為兩岸關係中的一個新變數---- 我們這一邊，也有實質上難於利用國際集會機會來凸顯我們為獨立政治實體的困擾--- 我們處境確實困難。對大陸政策關係二千萬人---也影響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不可輕率」，而「過去幾個月我國的開放措施，已經引發了若干不且實際的危險言論---認定獨立為可行---(和)對大陸懷有無現憧憬--- 此二者俱將為台灣帶來禍患或動盪。郭部長此行，---都必須避免助長此二種想法之滋長」。社論中對此行若「有助於兩岸貿易之開放---希望此一期望能成為事實」，但是「國人不宜對郭部長之去大陸，賦予太多的兩岸政治關係的聯想，免得給大陸政策注入一個躁進的因素！」(4/30, 3 版)。在分析的新聞報導中，亞銀代表團此行被視為政府「『一國兩府』的『試探氣球』--- 一是中共的反應，另是內部的問題」(4/30, 2 版)。社論對於此一「試探」可能的「躁進的因素」，發出一種預警。

在這一連串事件的發展中，「一國兩府」政治性意義的重要性快速遞減，在這過程中，原本只有在《聯合》社論中隱含的主題— 台獨的疑慮 — 逐漸浮現，成為相關討論的主題。俞國華重申「一個中國」的時機，也是在回應民進黨立委質詢之時，新聞報導的兩方並陳，凸顯了此一問題。爾後，三報對相關問題的論述，明顯的轉向開放民間交流的大陸政策這方面，也就是偏向初期三種詮釋類型

中的第二種，將亞銀年會界定於彈性外交／大陸政策。至於兩岸關係和國家定位的問題，《中時》社論中指出的，此行為未來兩岸關係的「試探氣球」，以及避免「躁進」的說法，顯示不只政府在論述上的退回原來固守的原則，新聞媒體的論述，也從「一國兩府」剛出現時的正面的評估，轉向較保守的自我節制的觀點，甚至呼籲國人不宜對出席亞銀年會「賦予太多的兩岸政治關係的聯想」。

這個論述上的轉折或許可以說對自我定位的自我-他者之間出現微妙變化的結果，中共批評「一國兩府」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企圖，以及民進黨對「一國兩府」的詮釋，引發國家定位上出現三角關係的微妙轉變。在對出席亞銀年會此一決策的解讀，「彈性外交」觀點的解讀最沒有分歧，一開始三報對出席決定從這觀點而來的詮釋，都肯定此決定為一「突破」。三報同時也將此一決定關連到大陸政策的改變，反駁官方說亞銀年會與大陸政策無關的說詞，在關於大陸政策中更開放的兩岸經貿與文化交流這方面，三報也沒有明顯的差異。在涉及國家定位的兩岸關係上，報紙中的論述出現較分歧的觀點，從強調兩岸均為「實體國家」，「一國兩府」乃是現實，到「一個中國」原則都有。在報紙的社論方面，從外交部長重提「一國兩府」此一說法之後，一開始這個提法被視為符合「現實」，可以和「一國兩制」抗衡的構想，雖然《聯合》的社論(4/10)加了「否定台獨」的前提。行政院長俞國華在面對民進黨立委質詢時，重申「一個中國」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4/19)，此後，媒體對「一國兩府」和亞銀年會之行的評估也趨於保守。除了「法律邏輯與現實政治之間的矛盾」之外，台獨疑慮此一因素的浮現，也影響了這些論述對政策的評估。而這些不同的觀點和考量是否影響其後對亞銀年會的報導？

(三)、「起立」事件的爭議

對於亞銀代表團赴大陸及停留期間的新聞報導，三報都以重要事件的形式(2~5 個版的篇幅)予以報導，代表團的行程細節、郭婉容的記者會、中共接待方式、亞銀年會、及國內與大陸人士各方的反應，各式各樣的報導相當多。在議題方面，從代表團出發之日起，我方是否會如去年一樣抗議，以什麼方式抗議，以及開幕式對中共的國旗、國歌如何應對，這些都是媒體持續關注的問題。開幕式當天及之後的報導，大多聚焦於代表團向中共國旗、國歌起立此一舉動。三報對此事件的處理方式出現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有著什麼涵義？

《自晚》在「將在外·一切自己作主?!」(5/2, 2 版)中，首先報導了郭婉容行前已獲李總統充分授權。而「我代表團將面臨中共旗歌問題」(5/2, 2 版)這篇報導中，郭婉容對此問題的回答：「所有亞銀安排的行程與活動，我們會看情形辦理」，對此，該報導訪問學者的意見。這些意見可以區分為：依「國際禮儀」行事，「不需要太過突出這次行動的政治意義」；「彼此為實體政權」，不必視對方為「叛亂團體」；造成「大陸政策和法律之間發生落差」。這些合理化及批評的觀點，和事後相關報導中的反應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五月四日當天，《自晚》對起立一事的報導較為平鋪直敘，其標題「奏中共

國歌郭部長起立 我代表團無公開抗議行動 楊尚昆設宴我團員全缺席」，文中敘述代表團與會的過程，並且描述代表團「只有一些幾乎曉得看不到的『小動作』，絲毫沒有影響到大會的進行」(5/4, 1 版)。頭版的另一則是「我代表團萬方矚目 面對訪問三緘其口」。此外，當天還有立委和學者對此事反應的報導，除了和上述三種觀點類似的意見之外，還有一種認為這是「分裂國家」難以避免的情況(「學者認為法理解釋有最大的彈性」, 5/4, 2 版)。但在記者的分析稿「聽中共國歌起立致意是一著棋…」中，指出了：「尊重國際禮儀」只是表面的「官方說法」，「起立致意--- 是一項具有重大象徵的決定---(它)更進一步突顯台灣與大陸互不統攝的相對地位，而且暗含承認對方主權地位的意義」。

第二天的報導則大量增加，報導對「起立」一事明顯的問題化。在「郭部長『起立』決策官員憂慮」這篇報導中，決策官員擔心起立此一動作可能帶來「諸如反共宣傳和政治教育等問題」，造成「認知差距、政策失調」，以及「有造成『兩個中國』的疑惑」(5/5, 2 版)。在資深民代的訪問中，有些看法則直接論斷「起立」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中華民國」，或者此做法是希望「把不正常的兩府狀態，合法化為兩個中國兩個政府而已，但--- 中共會承認嗎？」(5/5, 5 版)。對於此事的反應報導，還有兩篇學者對「起立」決策的分析(5/5, 2 版)，恰好一個是認為「得大於失」，而另一個觀點則是得不償失。以及兩篇分別訪問所謂的統派和獨派人士的反應，前者指出「『一國兩府』就像其過去所喊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樣，只是表面說詞--- 骨子裡應是想朝『兩國兩府』發展」；而後者則主張「立即廢除法統體制，召開制憲會議，重新全盤調整台灣的憲政秩序」(5/5, 5 版)。

記者的分析稿「亞銀模式『發酵』出重重疑雲」(5/5, 2 版)，對於起立所引起的相關疑慮，歸納為對決策的「策略層面」和「更基本的動機層面」的兩類質疑，文中還說：「或許是歷史的弔詭，對於『大陸熱』---恐共心態者與民進黨台獨主張者曾經站在同一陣線--- 如今--- 中共當局和國民黨內的中國情懷者變成『並肩戰友』，亞銀模式顯然已經在發酵中」。其他的評論則是以大陸政策的一致性為主，社評「快把國策矛盾說清楚」(5/5, 5 版)，以及新聞分析「亞銀示範效果猶如骨牌反應」(5/7, 2 版)，都要求政府擬定更合理的大陸政策。

《聯合》對代表團如何因應開幕式中中共旗歌的問題相當關注，二、三日的頭版持續新聞報導代表團將「不規避中共旗歌」，四日(開幕式尚未登場)即出現對此批評的評論「是旋風？還是弄堂風？」。「起立」事件之後，對此事的批評持續多天，包括連續五天的社論(除了 5/6 是評論亞銀任務)和眾多的分析報導與評論。就如前面曾提及的，該報對此事的批判態度，同樣顯現於新聞報導的內容、標題、和描述的用語。

「是旋風---」一文提出對全程參與開幕式決定的兩點質疑：一是中共同意安排「局部參與」之下，何以要堅持聽中共國歌的「全程參與」？二是「全程參與」對我方有什麼收穫？該文進而指出：「代表團『堅持』全程參與---並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符號起立行禮，總得有個合理的解釋，不能說『只是開會而已，

開幕典禮很重要！」。文中對此決策的分析與詮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起立致意這個決定「最大的可能是，欲以『行爲語言』來換取『兩國兩府』、『一國兩府』或『對等政府』的象徵意義--- 比較關鍵關鍵的問題是：不論是『兩國兩府』--- 這都不是『一廂情願』的事，要看中共對應的態度」。而「中共也不會天真地認爲台北--- 是承認其爲『中央政府』--- 這種動作，對中共而言，或許比其他的『抗議』更具『敵意』」。如此，這次赴大陸的「主調」— 爲兩岸敵對『降溫』，必然會有反效果。文中的第二個觀點則是，「兩岸『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我們目前尚未退讓的的籌碼--- 至少『官方』口頭上還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中共想要『釣』我們的，也就是這一張牌而已--- 所以郭部長聽國歌，可是說真是打出『最後一局』的『最後一張牌』了。--- 爲什麼非打不可？」

文中的所分析的這兩個面項，看起來都屬於對此決策之策略及效果的質疑，但是中共認爲這是具有「敵意」和中共想「釣」這張牌之間，以及我們是「一廂情願」和「打」這張牌之間，似乎是兩種不同的考量。這些論點的模糊在「郭部長聽『國歌』 獲得什麼？損失什麼？」(5/6, 3 版)這篇分析(一長串的分析表)中，有較清楚的敘述，它分別以官方說詞、意於言外的訴求、決策過程、執行技術、和效果等不同面向進行分析。從對會場情境的模擬和代表團執行技術的分析，該文斷定起立聽國歌爲一有意的作爲，其訴求爲「兩國兩府」等訴求。該文對訴求、決策過程、效果等逐項的批評，但是，它的基本觀點可以從這段敘述得知：

兩岸關係，「國」的爭執，高於「府」的爭執。所以對國家符誌的堅持--- 是處理「府」的地位的先決條件。領先向對方的國家符誌行禮，在觀念上及實務上發生的風險，亦即在此。何況「國」與「府」均涉及國際法上的承認問題，不是「起立聽國歌」及能達成--- 預借起立聽歌表達「一國兩府」、「兩國兩府」等訴求，恐只有更加提高中共的戒備，於我未來拓展外交空間更爲不利。何況，這些訴求對國內政治--- 此次反對黨陣營幾乎一面倒的贊成此舉，這就是一個訊號。

該文也指出官方對決策過程的說法都是「煙幕」，有「一人外交」的危險。此外，「一廂情願」和類似得不償失的說法，也重覆出現。這種說法，在對「起立」一事不同反應的報導中，也是評估此事的一種觀點；另一種觀點是從政策與法律的後果來看，此一政策走向，應對戡亂體制予以檢討（「起立 起爭議，學者---」, 5/5, 3 版）。

關於此一事件的重要討論還有社論及學者發表的文章。學者丘宏達的文章指出，從國際法來看「代表團的行動，並不會構成對中共的承認」，因爲中共的國際實踐必須由其接受才有效；該文進一步指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中共堅決反對，美國也不支持--- 所以突破國際孤立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進行--- 國內必須避免任何可能在國內外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舉動，以免造成誤會」，文中也舉出例如國內有人提議大學生不必修中國歷史，如果採納，在大陸恐會引起「台灣是否想脫離中國」的懷疑。丘文重覆了 5/2 文中

會引起「誤會」的說法。

在社論方面，雖然從四日到九日總共有四篇評論「起立」一是相關的問題，其論述中反覆出現的大抵是相同的主题，包括：(1) 決策過程不透明，官方的說法「太不誠信」，決策過程未有充分的與民溝通；(2) 內政與外交不可分，因此基本國策不可違背，要改變「必須與社會充分溝通」，還有亞銀年會之後的大陸政策(指民間交流)應調整。在第一點上，社論對決策「黑盒子」的批評，除了官方不同說法令人困惑，民主決策不能再以「宣導」來做，要從「使由之」轉變為「使知之」(5/7, 2版)，對決策過程的質疑和第二點是相連的。五日的社論中指出：「任何這一類的策略與作法，都應有一定的現實限度，這限度就是反中共政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策。--如要突破---須對上述國策重新評價與定位；絕不可說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

《中時》在對代表團面對中共旗歌此一議題上的報導，在態度上明顯異於《聯合》，在頭版標題：「演奏中共『國歌』，我代表團不迴避，將依國際慣例起立，郭部長強調無違三不原則，為免困擾，官方拜會及邀宴活動絕不參加」(5/4, 1版)，大多以接受官方說法的方式來敘述。同日對於各方對此事反應的報導，以「迴避出席皆兩難」做詮釋；在訪問學者的報導中意見也多持肯定(5/4, 2版)。在其他的報導中，「我代表團獲各國代表肯定」、「郭婉容成了本屆亞銀年會最受矚目的明星」、「郭婉容胸有成竹的態度十分吸引人」等，這些標題都持正面的描述用語。在「起立」事件發生後，《中時》在頭版的標題也是傾向於以官方說法來陳述：「『起立』只是符合亞銀儀規形式，郭婉容強調按國際慣例起立並無任何政治意義」(5/5, 1版)。而且在報導郭婉容接受訪問的報導中，標題出現「郭婉容：『我只差沒有哭出來』」這樣的大標題，相較於《聯合》的報導—「聽『國歌』，有團員強忍淚水，她說：『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我能幹』」(5/8, 3版)—兩者顯現出全然不同的真實。對於起立一事反應的報導，基本上和其他兩報一樣包含各方的正反意見，但標題上比較多是正面的敘述，例如「對外禮儀上是得體合宜、對內觀念上應明確廓清」(5/5, 2版)、「多數肯定，少數心有餘慮」(5/6, 2版；5/8, 2版)。

在論述上，《中時》包含較多樣而且分歧觀點的評論。「兩岸互動迴盪在歷史性時刻」這篇座談會的報導中，有大陸新聞工作人員對亞銀代表團赴大陸的看法，其中論及台灣政策對大陸人士來台的限制仍多，亞銀之行將引起台灣「大陸熱」的第二波等。中共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李家泉對亞銀代表團的作為，也做了相當多的評述，他將亞銀之行視為事「『一國兩府』政策之下所做的部署」，這是「一大突破，但不是向統一方向邁進」，不管企圖如何，「在客觀上一定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和緩及改善」。此外，台灣提一國兩府是因為經濟實力發展，一般民眾要求與經濟實力相適應的國際地位，而且「島內各勢力都喜歡台灣與大陸關係正常化」，主張統或獨的都樂見兩岸關係正常化；所謂的「一國兩府就是由兩個中國過渡到一個中國的策略，也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搞兩個中國，因為所謂將來成爲一個中國，可以十年八年，也可以是百年以上」。最後，他也指出「兩岸關係在政治上很難解決，所以最好從經濟方面來著手」。

除了大陸人士的評論，學者評論的專文，觀點也各有不同。田弘茂文中對於代表團以「Taipei China」名稱與會，感到憂慮，指出如果中共沒有善意的回應，大陸政策要檢討，否則「被以『香港模式』定了型就完蛋了」(5/5, 2版)。而高英茂的「新局勢就應以新觀念新作風因應」(5/6, 3版)一文，以將經國名言：「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指因應新局勢政策「當然也應有所改變」，心態上不能「停留在一九五〇年代冷戰、反共抗俄時代」。在社論方面，七、八日兩日的社論針對亞銀年會的意義和後續的問題進行析論，九日的社論「郭部長不辱使命」則是肯定亞銀代表團此行的評論。綜合來看，社論中的主要的論點有三個：一是此行代表著我國在外交上「觀念的一大突破」，擺脫過去「漢賊不兩立」的兩岸關係定位，朝向「一國兩府」的方向推動；二、新政策方向如何與反共復國國策之間的調適，涉及的動員戡亂體制和憲政正常化等問題，須以「沉穩的措施與解釋」進行，而兩岸民間交流應更加開放；三、兩岸之間，「除非在一個國家的大原則下，有分治之實，絕不可能有其他解決方案」，我們已經走出打破四十年僵局的的第一步，此後宜「靜觀對岸回應以決定我們的第二步」，而且也應防範國內統、獨從言辭走向行動層面。

三報在亞銀年會期間的報導數量相當可觀，而且種類繁多，這裡的分析主要是對出席亞銀年會此事相關的詮釋與評估，以及爭議性議題的相關討論。三報在這方面的報導大致上都將不同觀點的說法兼容並蓄，但是在呈現不同觀點的比例和偏向上也顯示出不同程度的差異。《聯合》的社論和新聞報導處理相當一致，其聚焦於「起立」此一作為的政治意義、其負面效應、及決策問題，此一偏向比較明顯。《中時》強調亞銀之行具有「突破」性的積極面，報導和評論上都肯定多於批評，而這些肯定中也帶有對未來改變的期待，包括對岸的回應、更開放的大陸政策、及動員戡亂體制的修定。《自晚》的走向比較起來和《中時》較為接近，只是它在社評和記者的評論中，沒有特別凸顯國家定位的論述。

三報對於開幕式中「起立」這個動作的析論，大致上包含這三種論述：一是法律，此一行動所涉及的法律和體制的問題，即涉及動員戡亂體制；二是國家論述，由於此一行動被視為具有國家定位的象徵意義，以國家論述而來的意見也不少；三是民主決策過程，對「起立」的決策者與過程的質疑。當然，這三種論述之間並非沒有相互的關連性，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在同一種論述中所形構出來的問題與意義也就大不相同。以法律論述對此事件的詮釋，主要是因為官方的行動明顯違背戡亂體制的法令，但對此的批評，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其中一種是策略行動所導致的失序應當回歸既有的體制架構；另一個則是著眼於動員戡亂體制的變革。公共意見大都傾向於第二種傾向，但這些傾向於變革的觀點也有不同：一種觀點的出發點是動員戡亂體制的廢止，和憲政的正常化；另一種觀點強調的是大陸政策進一步開放的問題，修改戡亂體制的法令，兩岸民間交流才能合法化。這些不同的觀點都可以藉由法律論述此一具有高度正當性的論述，予以闡發。不同觀點在對決策的批評則較微妙，對決策過程的批評基本上都是從民主決

策的論述出發，除了要求民主的決策過程此一觀點之外，另一種觀點則隱含著對決策者另有目的的懷疑，例如「是旋風---」（聯合，5/4，3版）。

國家論述方面，在相關評論中出現的國家論述，大多是「一個中國」或是「一個國家---有分治之實」這類的提法，雖然都是「一國」的提法，但觀點不盡相同。在批評「起立」動作的政治意義這些評論中，「中共是什麼？」這類質疑所透露的觀點，比較是站在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及「漢賊不兩立」這些論述的觀點，因此對「起立」的舉動會出現「爭一時，忘了爭春秋？」（聯合，5/11，3版）這樣說法的批評。另一種「一個國家」的觀點，試圖以「現實」出發，把國家定位在一個分裂的國家，或是一個國家，但有分治的兩個政府，例如《中時》5/7社論、學者楊力宇和丘宏達等。此觀點多傾向於肯定或接受亞銀年會中的動作，視為對等政府的一種表態，也是試探中共的主動作爲。持此觀點之中也有批評「起立」動作者，但這批評並非國家論述上的不同觀點，而是認為這個作法「讓步太多」或是「兩府突顯出來了---但一國呢」。

在國家論述上還有另一種觀點，這觀點就是「一個中國」論述的倒置，例如民進黨發表聲明，指亞銀代表團向中共旗歌致敬，「充分顯示國民黨政府---揚棄國民黨過去『一個中國』的僵硬主張」（聯合，5/9，2版）。這個聲明同樣提起「一個中國」的國家論述，作為對「起立」動作的詮釋，但這論述則有全然不同的作用。

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起立」事件所引發的爭議涉及的問題相當複雜，法律、國家定位、及民主這些問題都因不同觀點與立場，產生高度分歧的意見。這些分歧在國家定位問題上所顯現的，並非僅是統、獨立場的對立，而是包含著更多細微差異的觀點。而在國家定位上這些觀點的差異，在看待這個事件的其他爭議上，法律或／及決策過程，也不是呈現全然一致的差異性。以《聯合》與《中時》的差異來看，前者對「起立」動作的批評和對決策過程的質疑，和後者的觀點出現較明顯的差異。但是它們在「一個中國」和大陸政策與法令修訂上的立場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個相同立場在對「一國兩府」構想和「三不政策」上，卻又顯現與官方論述不同程度的贊同與疏離。《聯合》對國家定位上的觀點在不同事件的評論中，比起《中時》有較明顯的變化，這點在後面的分析可以較清楚地看到。《自晚》除了學者的專文以外，較少出現國家定位有關的論述，之前只有在社評中出現很簡短的「中華民國的存在，是誰也不能否定的事實」（4/13），以及「長久以來，兩岸---確有兩個政府存在的事實」（4/16）這類的陳述。對於「起立」事件所引發的政策與法律的衝突，社評(5/5)傾向於要求政府揚棄「三不政策」和戡亂體制的修訂，這部分則和《中時》的觀點較為相近。

(四) 李總統的讀賣新聞專訪

由上述三報對「起立」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可以看到，從一開始三報對出席亞銀年會決定的評價，及其後對「一國兩府」說法的闡釋，這中間隨著不同事件的出現，三報對亞銀年會的詮釋與評估也出現一些轉折與變化。最後一次相關

事件，就是五月八日李總統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在這次訪談中，李總統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指政府外交上的彈性作法是「任一個主權國家--- 負責任政府所應採取的態度，不宜以『彈性外交稱之』」；「『一國兩府』的構想，只是立法委員再立法院所提出來的意見，---- 並不代表政府的政策」；希望中共把眼光放遠--- 不要堅持不符現實的『一國兩制』主張」，「今天，中共唯有面對現實、放棄孤立中華民國的行動，才可能使雙方關係置於一個穩定的、和平的基礎上」。

對於李總統的訪談，三報皆以全文刊載。評論方面，《自晚》的報導分析李總統的談話「對內可以削弱舊國策與傳統意識形態維護者的質疑；對外則可以緩和中共抨擊彈性外交的口實」(5/9, 2版)。《中時》的分析也指出李總統的談話意在「安內」，但也批評亞銀行動的「實驗價值寶貴至極--- 如今，未及沉澱，當局澄清急忙若此，未能稍作堅忍，--- 寧非可惜？」(5/11, 2版)。《聯合》則有兩篇社論的回應。十二日的社論旨在呼籲政府有「務實」外交，也應有「務實的大陸政策」，它以日前漁民護媽祖回娘家(大陸湄洲)為例，指出「兩岸間進一步的交流已經成為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政府應「以務實的態度全盤研擬具有前瞻性的大陸政策」。

另一篇社論(5/11)則是對李總統談話的詮釋，包括四點：一是「一個中國」政策的理念為當前兩岸關係互動的準則，據此，「我們應理直氣壯的要求中共在追求達成此一目標中雙方互相體認彼此在國際社會中存在的事實。--- 政府有關當局應秉持更積極的進取精神，以務實的態度來策劃各種主動出擊的方案，以行動來表彰『一個中國』的理念」。李總統不以「彈性外交」稱呼政府的政策，「除有駁斥中共--- 的效果之外，對導正國內一些分離主義份子望文附會，解釋『一中一台』也有正面的遏止作用」。二、「一國兩府」不代表政府的政策，「對國內若干人士擔心--- 衍生法律系統的穩定與一貫性的爭議，有消弭和澄清的作用」。為了有效打擊「一國兩制」策略，政府應在「『雙方關係』和平與穩定發展的基礎上有突破性的規劃--- 不可視為一紙政策文宣」。三、對不合理賦予我國名稱的國際現實，將「以積極參與抗議的方式來拓展外交活動的空間」。四、大陸政策規劃以推展「台灣經驗」為主軸，可以說是「在無形中促進中國統一最具體的作法」。

以三報對李總統言說的解讀來看，《聯合》的社論中的詮釋比較是一種包含具體訴求的闡述，有些觀點，從它之前的論述來看，則是做了相當程度的修正，特別是在關於「一國兩府」構想和「彈性外交」這兩方面。在四月十日社論對「一國兩府」的評論中，它認為「值得鼓勵和支持」；在二十六日的社論則指出「『一國兩府』與「一國兩制」之間，並無基本矛盾」，關鍵在於「台峽兩岸是否能建立必要的連繫架構」。這些雖是有條件的肯定，前者在於政府正式聲明「堅持了中國統一，否定台獨」，後者是「建立必要的連繫架構」。但在後來的社論中，它基本上已經否決了「一國兩府」的提法，認為政府應轉向尋求「在『雙方關係』和平與穩定發展的基礎有突破性的規劃」。對「彈性外交」的評估也有所改變，

從出席亞銀年會「表現出彈性外交強有力的作法」，而今則反對「彈性外交」的用詞。雖然該社論指它是對李總統的「政策準則」的「詮釋」，它的闡述事實上挪用了這些準則，賦予它特定的觀點和自身所認可的內涵。這些觀點或許是從政府宣布出席亞銀年會以來，經過一連串事件和公共論述的討論，逐漸走向這篇社論中的這些結論。

五、小結

從新聞媒體對「亞銀年會」事件的報導可以看到，這個事件在當時的時空情境，是一富有高度政治性義涵的事件。新聞媒體在這個事件中的論述，讓我們了解到國家和民族定位的問題在當時的公共領域中，已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議題。官方在彈性外交和國家定位的新嘗試，可以說是解嚴之後，涉及國家地位的論述與作為上初步的轉變。而媒體的公共論述，尤其是《聯合報》對官方立場的高度質疑，顯示出媒介公共領域在民族主義立場上的捍衛者姿態。媒介公共領域中關於國家、民族的敘述，在第二部份有較詳細的討論，這裡先就前面分析的結果提出一個概要的說明。

(一) 「亞銀年會」事件報導的分析結果

整個亞銀年會事件的分析包含著四個小事件的報導和相關的論述，媒體在這些時間上接續而來的小事件中的論述，和觀點的改變，可以看出媒介公共論述對亞銀年會事件的詮釋和表徵，處於內部和外部多重過程交互作用中。

1. 出席亞銀年會的宣佈－突破：媒體都以「突破」漢賊不兩立和三不政策，來詮釋政府這個決定。但此一「彈性外交」的詮釋在媒體的公共論述中，可以區分這些詮釋為：凸顯政治實體、更彈性的大陸政策、及更彈性的兩岸(政治)關係這三種詮釋類型，這些差異顯示出公共論述對政策改變的期望上有所不同，而這些期望也和國家未來的走向有所關連。
2. 「一國兩府」論述的變動：媒體對「一國兩府」構想，從一開始傾向於肯定和積極論述的態度，指這構想「承認對等政府、各擁主權，符合現實」。但經過中共抗議，以及行政院長俞國華在回應民進黨立委以一國兩府構想挑戰「一個中國」說法之時，重申「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為一個中國」，《中時》和《聯合》的論述轉趨保守，同時也在論述中降低亞銀年會的政治意義。媒體在「一國兩府」論述上的改變，可以看到中共因素和台獨因素在媒體公共論述中的影響。
3. 「起立」事件的台獨疑慮：媒體對「起立」事件的再現中，最顯著的特點在於《聯合》對「起立」動作和決策大張旗鼓的批判，懷疑此一決策具有走向「兩國兩府」意圖為該媒體批判的核心問題，顯示其民族主義立場的捍衛者角色。《中時》的再現以「起立」動作為彈性作為的「觀念

的一大突破」，政策朝向「一國兩府」的方向邁進。《自晚》詮釋此一動作具有國家定位的象徵意義，暗含「互相承認主權」的義涵。三報詮釋不同，但國家定位上並沒有或尚未浮現分歧，《中時》和《聯合》的報導互別苗頭，但同樣強調「一個中國」。

4. 讀賣專訪：李總統接在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時，否認彈性外交(而是務實外交)和「三不政策」有所改變，也指「一國兩府」不是政策而是立委的提議。媒體對此的反應分為兩類，一是認為這是「安內」和緩和中共反彈的權宜說法；另一種則是《聯合》藉此官方說法，要求政府不宜再提「一國兩府」，應以務實的態度和具體的行動「表彰一個中國」。後者的反應明顯看出在經過「起立」事件之後，台獨或獨台的疑慮影響著該媒體對政府在國家定位和外交政策上的評估。

(二) 結果與討論

1989年「亞銀年會」事件發生的時期，台灣解嚴未久，動員戡亂體制仍然存在，但是開放大陸探親，致使兩岸之間的關係出現新形勢。事實上，在宣布出席亞銀年會後沒幾天，政府就宣布將開放公教人員和傳播媒體前往大陸，而亞銀年會甫結束，台灣就因為漁民「護送媽祖回娘家」的「直航」而喧騰不已。台灣首屈一指的大企業台塑集團，在亞銀事件之後即表示「政府今天點頭，台塑明天就去(大陸)」⁵²。而1989年底，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赴大陸考察，更引起國內一陣震盪。在亞銀事件的公共論述中，許多意見表述了對大陸政策的關心與期待，也可看到這股「大陸熱」的影響。

在另一方面，兩岸軍事與政治上的敵對的狀態持續了四十年，台灣在七〇年代之後在與中國大陸互爭正統的戰爭中落敗，中華民國代表中國這種法統的觀念仍然存在，但僅止於二十多個邦交國的承認，以及用以維護戡亂體制和長年不須改選的國會。解嚴之後，民間對於國際孤立的外交現狀日益不滿，要求政府走彈性外交的聲音愈來愈多。1988年初旅美學者丘宏達對於政府堅持「國家尊嚴」，遲遲不願接受美國建議我以「中國台北」之名繼續待在亞銀，深感憂慮，建議政府參加國際組織，「名稱應變通處理」，畢竟「能生存或有立足之地才能談到尊嚴」⁵³。當時，由於亞銀的名稱問題未能解決，國際刑警組織的會籍遭停止，而國內猶為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這個組織的名稱爭論不已。從89年「亞銀年會」事件相關新聞報導中可以看到，代表團也對名稱問題提出抗議，但是在評論中，這個問題已經很少被提及(只有《聯合》5/11社論)，而且大部分的意見也都肯定彈性外交。然而，就如過去名稱的問題和外交上的困境，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的問題，也同樣出現於彈性外交。1989年「亞銀年會」事件所引發的爭議，基本上仍然以這些問題為核心，但由於這些不僅涉及對外關係，也牽連著台

⁵² 《聯合報》，1989, 5/13, 1版。

⁵³ 丘宏達，〈當前我國的國際地位與外交關係問題〉，《聯合報》，1988, 2/22, 2版。

灣內部戡亂體制和法統的維繫，因而引發相當複雜的反應。

「1989年亞銀年會事件」這一連串事件中的公共論述，就如上述分析所顯示的，相當的複雜而分歧。由於這個事件的時空環境，這些各式各樣的言說呈現出在這日益變動的環境中，對既有體制、環境的現狀及未來，逐漸出現分歧的態勢。不過，以本研究所關切的國家、政治共同體、民族這幾方面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討論：

I、國家定位的嘗試

「亞銀年會」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意義在於國家地位的凸顯，從彈性外交、一國兩府、到「起立」動作，這一連串的政策轉變，都有著凸顯國家地位的義涵。媒介公共論述的反應，顯示出在涉及外交和兩岸關係上，媒體不只是扮演著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有些媒體在捍衛既有的國家定位和民族疆界上的民族主義立場，也相當的鮮明。

從出席亞銀年會的決策一經宣布，公共論述中就已經出現政府想要藉由出席亞銀來試探中共對「一國兩府」(此說法在3/18日就已出現於立法院)這個構想的反應。到了四月八日外交部長再次提到行政院長指示外交部研議此一構想，試探一事大致被視為是合乎邏輯的猜測。但事實上政府單位從未對「一國兩府」有實質內涵的論述，只有外交部長連戰指出「『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府』構想實際」(中時，4/9, 1版)這類的陳述，對此論述較多的反而是新聞媒體，包括記者、社論、和學者專家的相關討論。

媒體中對「一國兩府」的論述大致上包含兩個重要的論點，一個是「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府」是符合「現實」的提法；另一點則是「一國兩制」對台灣來說是不可行的。這也就是說，「一國兩府」是符合言說者所認知的「現實」，這樣的認知，既不符合法律體制中合法性的規範，例如中共是「叛亂團體」、大陸是「淪陷區」；也和官方宣傳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有相當大的落差。儘管如此，「一國兩府」還是被認知為「現實」，而且，這些論述把此一構想置於兩岸關係的脈絡，視之為「一國兩制」的相對提法。從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促使媒體論述轉變的因素，一個來自中共的負面反應，指這提法是「一中一台」和「兩個中國」；另一個因素則是來自民進黨對「一國兩府」構想的反應。

彈性外交和「一國兩府」這些新的提法，已經脫離原有的規範性論述，對當時的動員戡亂體制，甚至資深民代所代表的法統，已產生動搖的效果，同時也觸及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述。民進黨抓住「一國兩府」和既有體制中的矛盾，衍生出要求政府承認中共政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和重新制憲等訴求；而行政院長俞國華再面對這些挑戰論述時，轉而重申「一個中國」和彈性外交並不代表政府承認中共政權。這些都顯示出在「亞銀年會」事件時，外交和兩岸政策上的轉變，帶來新、舊論述上的衝突，官方論述擺盪於舊有論述和新的陳述之間，而這個游移不前，和解嚴後政治公共領域中出現對國家、民族論述的挑戰論述有

關。民進黨立委藉由在立法院質詢的機會，提出對「一國兩府」的台獨版本的詮釋，使得官方論述和有些媒體對「一國兩府」評估產生相當大的轉變，李總統在讀賣專訪中否認「一國兩府」為政府政策的陳述，可以看出統治階層和主流媒體在面對台獨挑戰之時，轉趨保守的民族主義立場，國家定位的嘗試在台獨疑慮的影響下原本客觀、務實的評估，也會轉向僵化而不可討論的民族主義的價值判斷。

此外，由媒體對政府較彈性作為的評估中，也可以看到這種矛盾的情結。一方面肯定政府改變漢賊不兩立的僵硬政策，希望更有彈性的大陸政策，以擴大兩岸的民間交流。在另一方面，彈性外交的作為凸顯國家自主權，也帶來「一中一台」或台獨的憂懼。這個矛盾在「起立」事件中爆發，《聯合報》對決策的強力批判，不斷強調外交和大陸政策的「內政」的一體性。不過，矛盾的是，要開放兩岸的民間交流，必然涉及動員戡亂體制的調整，而這也連帶地影響到代表全中國的舊法統的問題，但堅持統一理想者、想要推動憲政者、或是想要赴大陸投資者，都想要推動法律和政策的改變。公共論述也朝這個方向推動，只是在這些論述中，其動機和觀點並非一致，想要推動憲政正常化或是想要更開放的大陸政策者，都可以在這樣的論述中找到位置。

II、「國家」的曖昧和一個中國

不管是官方的論述或是媒體中的公共論述，對於「國家」的說法大都是含糊其詞的。「一國兩府」的提法中，兩個政府大概都很清楚所指的參照物，但是對於「一國」大都語焉不詳。語焉不詳的情形大概有兩種，一個是大家都很清楚知道，這種默會的共識可以免去言說中的反覆提及；另一種就是無法或不被允許用清楚明白的方式說出來。俞國華說：「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獲得立委兩度熱烈的鼓掌，這些鼓掌顯示說者與聽者之間享有的共識，即使這話對局外人可能還是無法理解「一個中國」指的是什麼。李總統在接受讀賣新聞專訪的時候，對「一個中國」的闡述則是：

我們一貫主張中國應該統一，並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堅信，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成就是全中國希望之所繫，而一個自由、民主、繁榮、均富的台灣，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必能產生積極的示範作用，使未來所有的中國人，均能生活在此一合理的制度之下。

這個說法大致上只是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換另一種方式的說法，中國和中華民國並不是等同的關係，因為它並不是說「中華民國應該統一」，而是說「中國應該統一」；但「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成就」，也指出兩者也不是分離的關係。在這點上，中國或是中華民國作為「國家」的參照物都具有曖昧不明之處。這種曖昧不明在許多論述中，包括官方的論述和公共論述，都以現實和理想、現在與未來的劃分，來做一切割。因此，基本上「國家」的意義擺盪於現有的中華民國和未來的中國之間。

從 89 年亞銀事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公共論述中對於「國家」的

預設或表述，並沒有超越上述這樣論述的範圍。即使台獨的疑慮顯現於不少評論中，這使它被表徵為一個「問題」而存在於公共論述中。而且，在媒體的公共領域，台獨或民進黨的言說出現的並不多，即使出現，也是以較低的顯著性或負面的表徵為多。例如，在行政院長俞國華回答民進黨立委對「一個中國」涵義的質詢這個報導中，標題和內文都以俞院長的言說為主，民進黨的問題大都只有寥寥幾語；而且，民進黨對出席亞銀或起立事件的回應，也被用來意指政策負面的「效應」(聯合, 5/9, 2 版; 自晚, 5/3, 2 版)。這也就是說，這時期媒體公共領域的論述，在國家或民族這些概念上的並沒有明顯的分歧，或是出現較顯著的挑戰論述。即使在「起立」事件充滿爭議的評論中，以另一種國家論述出現的意見，大概只有出現在《自晚》對統、獨兩派就「起立」事件反應的報導中⁵⁴，大多數的報導和評論對國家的預設仍是「一個中國」的觀點。對「起立」這個動作呈現的兩極評價，不管是批評這作法「放棄」中華民國或是有「兩個中國」的問題，或者是認為這是「一國兩府」具體的實踐或試探，在國家定位上並沒有根本的分歧。以巴赫汀(Bakhtin/ Volosinov, 1927/ 1994: 165f.)的觀點來說，公共論述中的這些爭議是在共享的基本價值判斷上，所出現的言說的不同「聲調」，而這些公共論述和官方論述，基本上，都還是沿著「一個中國」這個主調所開展的論述。

雖然在一九八〇年代統、獨的爭議就已經浮現，民進黨在八三年提出「台灣的未來將由所有居住在此的人民共同決定」的「台灣住民自決」的黨綱，而且在文化公共領域和黨外雜誌，「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辯論相當激烈。明顯而直接的台獨主張，在媒體的政治版面中很少見，比較多的是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的發言和民進黨的政黨新聞。由於當時法律對於台獨言論仍有刑法的罰責(四月時就發生了鄭南榕的自焚事件)，公共論述中較少這類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從另一方面來說，公共領域的國家論述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也可說明當時規範性論述雖然出現一些改變，其核心的論述在公共領域中尚未受到強有力的挑戰，從現實主義觀點的敘述，例如由於中共和美國都持「一個中國」，或是從其他觀點而來的敘述，基本上都維持著核心論述的地位。

III、民族與民族情懷

在亞銀年會事件的相關報導與評論中，對於民族或人民的表述並不多。就如同新聞報導中常見的「我國」這樣的用語，「國人」也是最常用來代表在台澎金馬的居民、中華民國的國民，而「大陸同胞」或「大陸人民」用於意指中國大陸的居民。「中國人」或「中華民族」這類的用語，大多出現於論及兩岸關係和兩岸人民之時，而這些用法有時也明顯區別於「華人」的用語。《聯合》大多使用「中國人」一詞，例如，「此一提法，不管是對台灣、大陸、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甚至全球華人而言，都是饒富深意的」，或是「用中國大陸的一貫語氣來說：『既

⁵⁴ 在非關「起立」事件的評論中，大概就是學者李鴻禧的〈談「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府」的齟齬訟爭〉這篇文章中提到兩岸均為「實體國家」，見《自晚》，4/17, 5 版。

然承認大家都是中國人了，又有什麼不好商量的呢？」(4/10, 2 版, 社論)。《中時》則是「中國人」和「中華民族」都使用，例如「對全體中國人而言，這都是悲劇」(5/7, 3 版, 社論)、或是「大陸政策--- 也影響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4/30, 3 版, 社論)。《自晚》的論述中，大都出現「兩岸人民」這類較中性的用語。

雖然「中國人」或「中華民族」出現於上述的評論中，但整體而言，出現的次數並不多，而台灣人或台灣人民這類的用語幾乎是看不到，「國人」和「我們」是較普遍使用的詞語。此外，另一種方式的表達也可以看到：「今天我們有明顯的疆界(台灣海峽)，有不同的制度，但是也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共同的血統，共同的文化」(中時, 4/12, 3 版, 社論)。上述這些不同的用語，雖然看似混亂，在國家的人民、公民、民族、政治共同體的成員之間游移。但是卻有它的邏輯，那就是中共與大陸人民區隔開；中國人、中華民族用來指兩岸包括官方和民間的所有人，既有政治的義涵(和中國的概念相連)也有文化、血緣的意義；而國人和上述的用語不同，這個詞語和「我們」大多用於意指和讀者共享此一意義的政治共同體。公共論述中對這些詞語並不會多加解釋，這些敘述大都預設它的讀者理解這些不同用法的意義。不過，在不同情境或語意脈絡使用某一詞語，其意義自然也不相同，李總統在讀賣新聞訪問中的用法是：「未來所有的中國人」，中國人前面加上「未來」，和「兩峽兩岸的中國人」，兩者所意指的中國人就產生一種微妙的差異。

有些時候，新聞的敘述中並不需要直接訴求民族或中國人，也會對民族情懷做了一些的表徵。《自晚》報導代表團到故宮遊覽時，標題就用了「江山如畫親睹故國山河」來描述此情此景(5/3, 1 版)。《聯合》在標題對此的描述則是：「故宮·故鄉·中國人的土地」(5/4, 3 版)。《中時》對此的報導並未做類似的描述，但在亞銀事件的報導中則會使用「故都」、「國土」這類的用語。另外一個相當有懷舊情懷的用語是「北平」，《聯合》和《中時》都用北平，而不是北京。

整個亞銀年會事件的公共論述，顯現出在當時的時空脈絡，新聞媒體對公共事務積極論述的角色，它們不只是民意的表達，也是民意的積極論述者。從社論、學者的論述、和新聞報導方向這些安排與處理，可以看到，新聞媒體對事件和議題在公共領域中的表徵，都有不同程度的掌控，因而顯現不同的傾向。官方雖然也對事件與議題進行操弄，但不一定能夠掌握公共意見的形成過程，在這事件上，新聞媒體和官方時而站在同一立場，有時則成為權力抗衡的情形。後面這種情形在涉及敏感的國家定位之時，新聞媒體的角色特別顯得積極，而且在論述上的自主性明顯升高。這點在《聯合》和《中時》在國家定位有關的議題和事件上的新聞處理及論述更為凸顯，兩報都強調國家定位上的「一個中國」和未來統一的立場，但《聯合》的論述則顯現對官方立場較多的質疑，和捍衛民族主義的強硬立場。相對地，《自晚》的社評和評論對國家定位較無明顯的主張，社評只強調兩岸分治的事實不容否認，但該報所刊載的學者的評論和專文，包括李鴻禧、

陳必照等人，大都強調台灣為獨立的「實體國家」或「政治實體」這類的觀點。

這樣的情形在一九九〇年代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嗎？下一節將分析一九九九年的「兩國論」事件，來了解其中的變化。這兩個事件的相同點是，它們同樣是政府對國家定位的論述出現改變，然而兩者之間在時空情境和論述上都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在分析「兩國論」事件的公共論述之後，第三節再比較這兩個事件公共論述上的異同或變動。

第二節、一九九九年「兩國論」事件

所謂的「兩國論」是指 1999 年 7 月 9 日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兩岸關係所做的新的宣示，後來新聞媒體均以「兩國論」稱之。這項宣示曾在媒體引發高度的爭議，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共二天後立刻對李總統的說法提出嚴厲的批評，使兩岸的關係陷入九六年飛彈危機以後的新低點，而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原本預定十月來台訪問一事，也成為兩岸關係是否緩和的指標。其緊張情勢以及之後美國的介入這個過程，新聞媒體做了大量的報導與評論。而「兩國論」事件的影響，包括當時中共可能動武的威脅，海基會和海協會這兩個半官方機構交往的中斷，2000 年中共提出「對台白皮書」增列對台動武條件，以及 2000 年的總統大選，都可以說是這個事件的效應。直到今天，兩岸官方的關係都還未能恢復到此事件之前的狀態。

新聞媒體對這個事件的報導，從七月九日(十日見報)一直到三十一日大陸海協會退回辜振甫的說明，為主要的報導期。在這段期間，隨著不同事件的發生，新聞媒體都有大幅的報導和評論。此後一直到「九二一地震」前，也持續有零星的報導，但這裡的分析以七月份的報導為主。在分析的三家主流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的報導與評論中，這個事件顯現相當不同的樣態，《自由》和其他兩報呈現極為明顯的差異，在各自選擇性的片斷中拼湊出這個事件各不相同的「真實」。這些差異顯現出公共領域中對政治共同體的認知和預設，在加入中國大陸和兩岸關係之時，即出現相當多的分歧點。這種分歧是否能夠歸因於國家／民族認同的差異？

下面先就三報在上述這三方面相關報導、分析與評論進行分析，而後再討論這些媒體的論述策略及觀點，以及它們的異同和所顯示的意義。「兩國論」事件的新聞報導，相較於「1989 年亞銀年會」事件，有一點很大的不同，新聞版面中的分析與評論已經很少看到國內學者專家的訪問與專文，這部分的公共論述大多出現於民意論壇這類的版面。因此，新聞版面中看到的評論大多是報社記者的分析與評論，僅有少數的學者專文。三報對「兩國論」事件的社論及分析評論在數量上都頗可觀，《自由》有 9 篇社論及 23 篇評論，《聯合》有 4 篇社論及 22 篇評論，《中時》有 5 篇社論及 26 篇評論。

一、媒介公共論述中的「兩國論」事件

(一)、《聯合報》

爲了敘述上的方便，同時也從新聞事件的發展，及《聯合》新聞報導的安排來看，我將「兩國論」事件這段期間的報導與相關評論，區分爲前期、中期、與後期三個階段。

前期

在對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的報導上，《聯合》以兩篇新聞分別報導訪問的內容。在頭版的新聞「李總統：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敘述了「李總統指出，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經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文中同時也指出：「李總統這段對兩岸關係的全新闡釋與定位，已超越了國統綱領將兩岸關係定位爲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說法，也有別於過去『一國兩府』的陳述」。另一篇報導則敘述了李總統對其他問題的回答，包括企業的大陸投資對我國經濟造成若干競爭壓力、重申「建構兩岸和平穩定機制」的理念，呼籲中共實施民主等。另一則新聞則報導了總統府官員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四點闡述：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成立以來即是主權獨立國家，非中共所謂「叛離的一省」；我國自一九九一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經多次修憲，憲法有效範圍僅及於台澎金馬；大陸政策不會改變；大陸不要以武力威脅台灣。

對於李總統和其他官員發表此一新定位的論述，同一天也刊登了一則中共反應的報導「『語言動作』中共指已預料到」(7/10, 4版)，指出「中共涉台高層官員表示，大陸方面已預料到，在大陸海協會長汪道涵訪台之前，台灣會有一些『語言動作』刺激大陸--- 爭取兩岸交手籌碼，相當程度也爲了國民黨的總統角逐」。此外，當天還有一篇記者的分析「借兩德經驗 向國際宣示」，文中指出總統昨天提出的說法，「有借用兩德經驗向國際宣示及試探的用意」。並且分析李總統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用意：一、是對國統會定下的「對等政治實體」未見成效，「新的定位--- 有助於台灣法律地位的說明，而且具有提高談判籌碼的功效」；二、是這個「接近『一中兩國』的定義--- 加上總統直選、修憲精省--- 讓中華民國台灣『事實獨立』更加明確」；三、時機上選擇於江澤民的「國慶談話」對台可能新的陳述、汪道涵訪台、及澳門回歸之前提出，「應有先發制人的作用」，同時，在總統大選前提出此一主張可以有吸收偏獨選民並將宋楚瑜區隔爲「統派」的效果；四、這作法「相當程度回應了美國對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的壓力」。

次日的新聞則有較多政府部門對總統論述進一步的解釋，及總統參選人簡短的評論報導。也同時報導了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的看法，辜認爲「政治實體就是國家」，新說法不會影響辜汪的會晤；唐則表示希望兩岸共同爲汪道涵的訪台營造有利的條件，同則新聞也敘述了大陸學者認爲對台政策不會再輕易受李總統的影響。

當天有兩篇評論，都是對「特殊國與國關係」提出的背景和此一動作的涵義所做的分析報導。「從『一個中國』到不提『一個中國』」(7/11, 2版)指出新說法的提出，意味「兩岸都已確定放棄」九三年辜汪會達成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中共於九三年亞太經合會中兩度公開表示，「中國只有一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方由代表與會的經濟部長宣讀「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之後此一提法未被繼續使用，此次突破與外交困境的思變有很大的關係，因「一個中國」的國際解釋權不在我方手中，外交單位已多次建議要取消「一個中國」框架。目前所宣示的兩岸定位為「準國際關係」，不一定會發展至「兩個中國」，但如果「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定了調，「未來發展至少很難回到『一個中國』了」。另一篇分析「從政治實體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7/11, 13版)則指出，李總統此舉「企圖將兩岸定位為『一個分治中國下的兩個國家』--- 確保在台灣中華民國不被消滅，強迫統一」，一九九〇年起我國以「對等政治實體」這類「策略性的模糊」，迴避兩岸主權的衝突，但「反招致中共得寸進尺，在國際間將台灣視作中共的『叛亂省』，我方必須用明確而強勢的訴求，不讓北京及國際有錯覺」。文中也述及去年辜振甫訪大陸就是要讓對方高層明白，「相互承認彼此為主權獨立國家，若無此認知，則所有堆進兩岸政治關係的談判都不可能落實」，而「李登輝這一步走了十年，也招致無數毀譽--- 可預見的是--- 無論台灣政局的新舵手是誰，這個底線不可能有所退讓，除非北京重新檢討兩岸的政治定位---」。

十二日的新聞(1, 4版)報導了中共對「特殊國與國關係」說法的批評，中共官方直接點名批判李總統，指他與台獨勢力「沆瀣一氣」。十三日大幅報導陸委會主委蘇起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進一步的闡述，指「我方今後不再使用『政治對等實體』、『一個中國』的說法」；同於頭版並置的新聞則是「汪道涵：兩會對話基礎不復存在」，報導中共持續的批評，以及汪道涵指辜振甫先前說兩會是「國與國會談」已使兩會對話的基礎不復存在，並促辜提出澄清。這兩天的新聞開始大量增加，除了政府部門的闡述和推動此一新定位的構想、中共的批評、總統參選人、政黨、及正在集會中的國民大會代表的反應；也增加了美方智庫學者專家的評論，包括包道格、唐耐心、及葉望輝這些中國問題專家，其評論則分別是「這講法並不新鮮，因為他(李登輝)長期以來所追求的就是有獨立之實，而不是獨立之名」、「原因可能是台北以感受到美國與中共有關兩岸關係進展的壓力」、「李登輝顯然是企圖為他的繼任者設下今後與北京談判的底線」(7/13, 3版)。

此外，這兩天主要的評論，有一篇社論和兩篇記者的析論。其中一篇分析指出兩岸新定位論述提出的時機值得玩味，一是在美國的「中程協議」策略及中共「政治性談判」迫我上桌攤牌之時，「李登輝是寧以『叫牌』-- 和中共對賭，絕不輕易『跟牌』」；二是在各界以「連宋配」進逼，「下了著『兩岸關係』為總統大選定調的棋」，要候選人清楚表態(7/13, 3版)。

另一篇評論「李總統一席話，引爆三方疑慮」(7/12, 13版)，和十三日的社論「『德國之聲』：這扇門的後面，是否真有出路或活路？」，則是對新定位猛烈

抨擊的兩篇長文。前一篇的評論，開宗明義指出李總統的一席話，「終於引爆了一個台灣、大陸與美國三方都沉埋已久的疑慮，其中又以美國對台灣政治動向的疑慮為甚」，接著該文點明「如果李總統的意圖--- 是要為下一階段的兩岸關係定位，那情況只會更嚴重，因為這代表李總統不是獨裁，就是不負責任。在下一階段總統大選事實上已經鳴槍起跑之際---」。文中有很長的一段是歷史敘述，在此之前，該文指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自一九九七年起--- 美國與中共關係美對台北不利的走勢，必定是在台北出現被認定為具有挑釁和『無助於台海穩定』的動作之後」。首先是九七年六月台北出現了大幅度的修憲動作，美方認為這些作為「無助於台海的穩定」，結果，不久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宣佈把台灣列為美中「戰略對話」的主題之一，而這美國未曾明示過。該年九月李總統在中南美「太平之旅」中公開表示，如果要與北京談判協商，出席這類會議，「是要等淡水河乾比較快」。另外，李總統在回應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關於兩岸早日就結束敵對狀態進行協商之說時，「至少有兩次公開表示，要北京『先承認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才可能進行下一步的動作」。而這也促使十月柯林頓與江澤民高峰會後，公開表示解決兩岸問題的時機「愈快愈好」，同時也促使美國國務院向北京的政策傾斜，九八年柯林頓在上海提出「三不」的說法，只是這次的「翻版」而已。之後，李總統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訪問時，「還是表示，如果到北京會告訴江澤民，『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美方--- 遂有所謂更進一步對台灣構築『防火牆』的概念與說法出籠」。之後台北不但沒和北京重開談判，更在修憲中潛入了「公投入憲」和「廢國大」兩大議題，「這更增美方疑慮；再加上北京半公開的提及了『統一時間表』的壓力，--- 促成了美國『中程協議』概念的再提出」。最後，該文總結上述的敘述，指出：

其實，美國自一九九六年以來--- 就是要防範兩岸的衝突，尤其不希望看到台灣的挑釁行爲。但事實上，其中本就充滿著對台灣的不信任。一位美國務院官員--- 說『我們不相信你們所說的每一個字』。--- 在美國行政部門的概念中，臺海兩岸的現狀已不易維持，『中程協議』--- 是一種對平穩過渡的構思。但李總統日前這個講話，只會使兩岸更添困擾，連帶所及，未必有利於台灣和美國之間的互動和信賴。

這篇評論敘述的觀點迥異於前面幾篇的評論，不同之處有：第一點不同在於，此文同樣將官方的宣示置於美、中、台關係的互動脈絡中來評估，但是將不利於我方的美、中策略的改變，歸因於台灣「挑釁的行爲」，也就是台灣是咎由自取；第二，對於兩岸互動的問題，歸因於李總統三番兩次提出「先承認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第三，該文直接批評李總統「獨裁」或「不負責任」。而第三點的看法，和社論的觀點相互呼應。

「德國之聲版」(7/13, 2版)這個第一篇社論的主軸，在於對李總統的批評。首先，它將「德國之聲版」的論述當作「為其個人政治圖騰進行最後的保衛戰，且亦兼具為總統大選作戰術不局的作用」，因此「這套論述似乎很難在李總統退位後繼續被視為兩岸互動的主流戰術價值--- 因為，兩岸互動的價值在和平，而

不是衝突。但是『德國之聲版』的效果卻是製造衝突」。之後，該文則是較針對性的批評李總統，主要的論點有兩個。一是「德國之聲版」暴露了李總統在退位前夕對自己的權力及政策即將失落的嚴重焦慮感，它恐怕只是「見門就闖的嚴重焦慮表現而已」。從之前的『七塊論』、「一個分治的中國」----，十一年來大陸政策出現此類天翻地覆的變化，已不下十餘次，「這種反覆無常的決策作風或人格特質--- 就知道這只是無頭蒼蠅的飛行行徑」。第二，過去台灣當局為說破兩岸之間國與國的關係，「保留了『創造性模糊』、『各自表述』的戰略空間」，而這空間是「台灣在兩岸關係中極為珍貴的戰略資產--- 如今---竟而突然打算將自己所搭建的國家安全理論體系全盤摧毀。李總統似須向全民交代：是否這十一年來一切都做錯了？是否這十一年來一切都在欺騙全民？」最後，該文論道：「一位即將退位的總統，發動爭議性如此強烈的政治議題，是極不負責任、且極不符合政治道德的行為。--- 眼前的景象是：一位民粹強人為了化解自己的權力僵局，竟然不惜以整個國家的安全為籌碼--- 政治人物愛自己的權力，遠逾於愛這個國家」。

中期

十四日以後的報導中已經完全以「兩國論」取代之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用語。此後新聞的重點大多在於中共將軍事演習的傳聞、台股大跌、美國媒體和專家的批評，以及美國官方相繼發表要求兩岸「自制，持續對話」、「避免做出有礙對話行動」的談話。《聯合》對中共反應各方面的報導相當多，這幾天則大量增加，除了中共持續的批評之外，軍事方面新聞的顯著性大增，例如「中共暫不對台軍事演習」(7/14, 1 版)，「駐北京外交官：潛藏武力威脅」、「兩國論若修憲，恐面臨中共武嚇」(7/14, 13 版)，「北京權威人士：李登輝玩火，必要時武力制止」(7/15, 13 版)，「英國五大質報：中共放出中子彈消息，意在恫嚇台灣」(7/17, 13 版)，「日本防衛廳：中共南北夾擊，武嚇台灣」(7/18, 13 版)。同時，

對於美國政界、媒體、及學者專家評論的報導，也開始明顯增多，包括「紐約時報：台灣放棄免於一戰的模式」(7/14, 2 版)，「美親台議員批評：『台灣挑釁令人失望』」(7/16, 3 版)，「美參院外委會主席赫姆斯支持『兩國論』」(7/17, 2 版)。美國官方反應的新聞，「華府質疑，李總統：大陸政策無根本改變」(7/15, 1 版)除報導李總統會見甫卸任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主任張戴佑時表示大陸政策沒有「根本的」改變，也敘述了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官員認為「背離『一個中國』政策無濟於大局」；「美要查詢，台北是否可做澄清」(7/15, 2 版)；「美不容許台海問題非和平手段解決」(7/17, 2 版)。十九日頭版刊登了「江澤民柯林頓通電話，批評『兩國論』」這則新華社的報導；次日報導了白宮發言人表示，「柯林頓主動打--- 促兩岸數週內對話」(1 版)，及「白宮否認論及武力攻台的問題」(3 版)。

這段期間，政府部門澄清式說明的新聞仍然持續，國內反應的新聞也較多，除較常出現的政黨、總統參選人的支持與批評的新聞，也出現「百餘學者籲停止推動兩國論」(7/19, 4 版)的報導，學者批評李總統「違反民主憲政體制」、「引起

兩岸關係的高度緊張」。還有就是民意調查結果的報導：「兩國論影響，李總統聲望降為五成三」（7/16, 2 版），同時也報導了兩次民調同意兩國論者有 49% 和 46%，不同意者有 30% 與 26%，無意見者無意見者 20% 和 26%；總統參選人的支持度則是宋楚瑜領先其餘候選人。

評論方面，這時期的評論以策略和後果的分析為主，社論「不要作繭自縛，不要自毀長城」則延續前一社論的批評。「有人表態有人迴避，新形勢誰得利？」（7/16, 3 版）析論兩國論的提出對總統參選人產生微妙的影響；「政府，不能光要民眾有信心」（7/17, 2 版）批評政府「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挑戰北京，測試華府」（7/14, 2 版）及「台北走光戲，想善後難處裡」（7/18, 4 版），則是從美國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指出未來兩國論可能難以繼續。「兩國論與『三不』論」（7/16, 13 版）則指出「兩國論」澄清的手法，和美國拋出「三不」時「如出一轍」，當時台灣在中共以「大國外交」迫台灣淪為其香港，柯林頓在「一個中國」定義上走近中共立場說出「三不」，事後美國向台灣保證美國政策「並沒有改變」。此次台灣的手法亦是如此。「三不」和李總統的兩岸關係定為主要影響在外交戰場，「『一個中國』加上尋求統一的目標，使台灣在國際上處於挨打---『兩個中國』加上『尋求統一』的目標，以德國為例---還有抗拒中共外交封殺的機會」。最後，該文指出「如果中共和美國認為『兩國關係』論不合他們的利益，那責任在中共的封殺台灣---及柯林頓順從中共---」，而「台灣的處境，使它不承認兩個國家，便否定自己的國家地位，經過五十年努力建設，在台灣的人民似乎沒有否定自己主權國家地位的意願」。

「美台缺乏互信，兩國論雪上加霜」（7/18, 13 版）則大致重述十一日「引爆三方疑慮」的主要論點，美台之間的「不信任，早已是三尺冰」，「從『中程協議』的促談來看，現在可謂是「一葉知秋」；台北逕行弄出了『兩國論』，還要在向美方解釋，恐怕很難辦吧」。二十日的社論「不要作繭自縛---」中，先是指出李總統的作法只是「說出（亞銀年會時）郭婉容當時沒有說出的『一個民族，兩個國家』」，而「『兩國論』的現實效應是：作繭自縛、自毀長城」。其批評的論點有三點：一是兩國論引發美國政界及媒體「極為露骨」的批評，中共激烈反應使情勢僵持不下，國內股市暴跌，這豈不是「自毀長城」？二、國與國關係的說法與憲法明載「國家統一前」的內涵和價值有矛盾抵觸，面對未來歷史評價，這豈不是「作繭自縛」？三、如喪失「原有的戰略空間，那就是誤國誤民」，憲法架構的「保護傘」，足以將兩岸現狀維持至中國大陸出現結構性改善或全盤崩潰，屆時台灣自可再定行止。最後，該文指出台灣「應當組成一個可以獲得內外信任的主政團隊來主導（兩岸關係）此類工程」而不是一個被視為「不可預測」之人；現在「強人正在做最後的權力掙扎，但整個國家不能成為他的賭注」，「兩國論」應嚴格限範於「宣示」，不要輕易進行修憲或修法的動作。

除了這些評論之外，十八日學者丘宏達的專文「一個不通而有害的結論」（2 版），是僅有的一篇學者的文章。該文指出「兩國論」的「一個民族，兩個國家」，這種說法，「頭腦實在不清」，因為「即使在法律上還講得通，也無可能為中共接

受，因為實力懸殊，中共沒有理由會接受此種模式」。南北韓及德國模式，雙方人口、土地差距不大，而且「即使在法律上是二國，但沒有德國人主張他們不是德國人或否定德國歷史文化傳統；在南北韓情況也是一樣」。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台獨活動已有多年歷史，去年還在國大選取得近四分之一的支持，中共更不放心德國模式。另一種有些人提出的「一國兩府」模式，理論上較分裂國家模式合理，「主要困難還是雙方力量的懸殊，而不為中共所接受。且---等於放棄『一國兩制』目標，在現階段根本不可能。現在仍是如此，但對等一點可以力爭，並且可獲國際(特別是美國)同情」。最後，該文建議不要以此說法做國際訴求，這種赴美「溝通」，反而弄壞了中美關係。

由這些不同的新聞報導和評論，可以看到，對兩國論相關評論大致上是以美、中、台之間關係的發展和影響，來評估兩國論。兩篇社論的批評則是加上對兩國論與憲法精神牴觸的問題，同時對李總統個人，包括其決策風格、人格的批判，指他是「民粹強人」、「反覆無常」，其行為「病態」、出於「權力失落的焦慮感」。評論則有不同觀點的評估，「兩國論與三不」和「美台缺乏互信」這兩篇評論的差異，在於責任歸屬和譴責對象的不同，一個歸諸中共與美國對台灣國際空間的壓縮，另一個則是歸諸台灣挑釁的行動；各自引用過去不同的事例，來佐證各自的因果推論。丘宏達的文章討論台灣所構想的不同定位模式，他從現實主義觀點的判準——「實力懸殊」及「國際上大體已定案的『一個中國』」——指出這些構想，中共不接受就不可能，並且也暗示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但「對等一點可以力爭」。

在他於十三日「民意論壇」的一篇文章「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與國家統一問題」中，丘宏達曾解釋「中共對台主權只是一種主張，並且不為大多數國家承認。而我們對台澎金馬之主權不但基於事實，同時也有堅強的法律依據。由於中共反對兩岸為『對等的政治實體』，所以李總統只有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來對抗」。這兩個不同時間點對兩國論的評估並不相同，先是贊同「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提法，對於後來走向「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闡釋則是認為「頭腦實在不清」。雖然他沒有解釋其中的差異，不過，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強調「特殊的關係」並不改變「中華民國的國策」：主權仍及於大陸；堅持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統一中國。因此李總統的統一政策和民進黨的台獨「完全相反」。而「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兩個中國」，中共不放心，認為「一旦時機成熟，台灣有人想換一個招牌，不就是『台灣獨立國』了嗎」。

後期

上述評論的不同觀點在後期已經很少見。這段期間最重要的新聞在於二十一日李總統對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再闡述，美國總統柯林頓的記者會，美國政府派遣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來台溝通，我政府對兩國論的說明，以及辜振甫給予海協會的澄清。二十日報導了國防部指共軍無大規模戰備徵候，股市由黑翻

紅，柯江通話，以及美國將派卜睿哲來台等新聞。對於柯江通話，不同的分析報導則指出柯江通話，「『中』美修補關係，台灣勢必增壓」，「美國表明立場，防範北京誤解」，以及「出奇招後找台階下，難上加難」(7/20, 3版)三篇對美國行政部門反應的解讀。

二十一日頭版「李總統：將來民主統一才有一個中國」，報導了李總統再度闡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他表示，「一個中國」不是現在，而是將來民主統一之後才會有「一個中國」可能；重申兩岸是國與國的關係，將來兩岸談判或接洽時，應以平等、對等的立場來處理，「政府不是搞台獨」。同版還有「美警告中共勿升高台海情勢」，美國總統柯林頓表示他曾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談話，談話中重申美國堅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和海峽兩岸對話，並明白表示美國政策沒有改變，包括台灣關係法，「任何對和平對話的妨礙都會被我們視為非常嚴重的事」。同時也報導了美國務卿表示，亞太助卿陸士達和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將分赴北京與台北。當天也有不少針對李總統再闡述的相關報導，包括陸委會主委蘇起說，「未來的一個中國不是中華民國被併入，而是兩岸合在一起的新產物。我已準備就兩岸政治定位談判」(7/21, 2版)；「辜振甫周內澄清『兩岸非國對國談判』」；「外交部官員：應把『特殊』部分說清楚」；以及「官員建議，兩岸與外交策略分開」這些不同的報導。

在分析與評論方面，「兩國論若入憲，台灣永遠回不了頭」(7/21, 2版)這篇報導指出中共透過新華社警告台灣不要將兩國論入憲，因此只要不修憲，兩岸的僵局或許還有破解的希望；「李登輝再詮釋，美方仍認為沒有幫助」一文則指出，「美方人士」認為李總統的再詮釋「對整體形勢沒有幫助」，因為美方的立場就是希望兩岸及早恢復對話，李總統的說法，「若是中共的反應並非正面，那就是對整個事態的發展『沒有幫助』」。

次日，新聞中出現「傳展延軍援，美官員：『台灣正在受處罰』」(7/22, 3版)的報導；同時也有外交部與國防部否認的報導。官方對兩國論的說法，則有「程建人：『一個民族兩個國家』不講了」；「蘇起：詮釋未過火，也無降溫作法」這兩篇報導。而「憲改諮詢會議，三黨激辯兩國論，各自表述」，以及「兩國論入憲？民進黨內不同調」(7/22, 4版)，這兩篇報導指出政黨對兩國論是否入憲的問題有相當多歧見。「美若祭出四不，情勢令人擔憂」這篇分析則指出，美國爲了要求台北重開兩岸對話，除了派卜睿哲來表達美方立場之外，也傳出可能對台北展開一些「懲罰」，過去美國也曾有多次展延軍援的紀錄，九六年李總統訪美引起兩岸關係緊張之後，國務院等行政部門對台的「四不」政策— 去信不回、電話不接、請客不到、邀約不見，這次如果「再度被援引，也並不奇怪」。「兩國論幫了『中』美修復關係」(7/22, 13版)這篇分析指「兩國論」被中共利用，透過媒體大幅報導和批判台灣政府，把原先對美國誤炸事件的輿論焦點轉移到「批李」，中共也順勢把「兩國論」作為推動恢復對美關係的籌碼。

接下來幾天的新聞都圍繞著卜睿哲來訪，和李總統及其他部會首長會晤的報導，包括「李總統今接見卜睿哲說明立場」(7/23, 1版)；「李總統：我大陸政策

沒變--- 只是以國家元首身分表達大多數人民心聲」，及「卜睿哲：做有非常有用的意見交換」(7/24, 1 版)；以及副總統連戰、行政院長蕭萬長等部會首長與卜睿哲會面的報導。在「對等 vs. 一中，兩岸前提異曲同工」(7/24, 3 版)的分析文中，卜睿哲與政府高層官員的會談，顯示出我方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已有清楚的方向：民意、對等、長期政治談判三點是主軸，其中「對等才是整個事件的核心」(連戰語)，這種前提說法，與中共的「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一重要的新聞，則是柯林頓於記者會中所表發的談話，有「柯林頓籲兩岸冷卻緊張，重申兩岸事務『三個支柱』，誰都不應存有動武念頭」(7/23, 1 版)，及「中國有意對待台灣一如香港」(記者會問答)(3 版)。〈焦點評論〉「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提香港」(7/23, 3 版)，認為柯林頓的談話中透露三項重要訊息：以「三大支柱」(即「一個中國」政策、兩岸對話、歧見應和平解決)「概括其中國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柯林頓並未如過去強調『美國的』中國政策」；對李總統近來的談話，表示「不清楚李究竟要傳達什麼」；提到中共處理香港的方式，「柯林頓此舉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才應該是昨天整個談話的焦點」。在「施壓台北，美使出高明的外交技巧」這篇分析中，美國傳出將「懲罰台北」的訊息雖然混亂不一致，「背後卻隱藏了相當的『外交手腕』，其用意在於「告知台北『如果不修改』兩國論時所可能遭遇到的後果」。

這兩篇評論都和柯林頓的談話有關，前者是對其談話的解讀，它凸顯「香港模式」，對柯的話語也有選擇性的引述和局部的更動，「我讀到的東西似乎有截然不同的意義，我還不能完全確定李先生的聲明想傳達的到底是什麼」變成柯林頓「明確表示『不清楚李究竟要傳達什麼』」。後一篇分析，則是柯林頓的談話否定了《聯合》22 日所報導的「傳展延軍援，美官員：『台灣正在受處罰』」的新聞。

接下來幾天的報導也是環繞著幾個「重要人物」的談話為主，卜睿哲離台聲明，美國務卿歐布萊特與中共外長唐家璇的會談、及辜振甫的說法。二十六日頭版出現「中共決取消汪道涵訪台」這個新聞，指出江澤民已決定決取消汪道涵訪台，並且決定我明年大選之前停止兩會交流，但民間往來不受影響。另外，「唐家璇籲美誤助長台獨氣焰」(7/26, 3 版)，報導了唐家璇在與歐布萊特會談後發表的說法，它引述唐家璇的話說：「李登輝是專門給中美關係製造麻煩的人，不能對他有不切實際的期待」，而且「如果我是記者，標題就會寫『麻煩製造者李登輝』」。次日報導了美方對此會談的說法，在「柏格：李登輝接受台海穩定三柱架構」(7/27, 1 版)這篇報導中，敘述了白宮安全顧問柏格表示，李登輝總統在接見卜睿哲時以接受柯林頓總統所提的三支柱架構，但他同時強調，台北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澄清；這篇報導同時也指出歐布萊特對華府與北京之間情勢緩和表示歡迎，但卻「很技巧地譴責了台北」，她表示：「--- 台灣與中國的問題必須和平解決，但截至目前，台灣並沒有充足的解釋」。

這幾天的評論有兩篇分別針對卜睿哲離台聲明和歐布萊特說法的分析。在前一篇「卜留伏筆，暗示我重回一個中國立場」(7/26, 3 版)指出卜睿哲說的「了解」

不代表「滿意」，「美方對台灣是否仍持『一個中國』的態度，還是有懷疑---卜睿哲的聲明或許透露出美方希望台灣至少退回到過去『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為『兩國論』做最後的收場」。「美國還在等『新的說法』」(7/27, 2版)這篇分析則指出，美國務院迄今對台北「澄清」兩國論的說法都保持沉默，對歐布萊特對台北有關解釋「並不充足」的說法也無進一步評論，美方對台北的說法，「顯然並不滿意」。

二十八日報導了中共外長唐家璇表示：「仍在等候辜先生澄清」(4版)，以及「白宮密切觀察辜振甫回應」；三十一日「辜振甫談話傳真稿，海協會退回」(1版)。相關的新聞還有「海協會抨擊辜振甫鼓吹兩國論」(7/31, 2版)，該文報導國台辦指台灣為放棄兩國論的分裂主張，以及海協會批評辜振甫把九二年兩會達成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口頭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口頭各自表述」。此外，還有美方的回應，「國務院：兩岸對話基礎由兩岸決定」，文中報導國務院簡短的回應，同時也報導了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官員包道格說「美國行政部門認為辜振甫聲明的內容『令人失望』」；國內反應的報導則有：「辜『相信汪一定會來』」。相關分析的文章「辜談話往『一個中國』挪移」指出，辜振甫的談話顯示，台北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詮釋，已從「揚棄『一個中國』的迷思」，轉向「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並結合「一個未來和平民主統一的新中國」。關鍵的意涵是：「一個中國是未來式，各自表述是現在式；從時序上看兩岸政治定位，如此中共所加諸的『一個中國』框架就暫時解套了」。最後，該文也指出：「兩岸關係的起伏自一九九五年起，就是太平洋東西兩岸大國交往棋盤上的棋子---台灣順著『三個支柱』提出解釋，卻被北京一腳踢回，顯然華府必須與北京在『一個中國』的最大公約數上再下工夫」。

從「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一說法被提出，《聯合》的社論相繼對此提出評論，而二十六日社論「『事實論述』正確，『戰略論述』錯誤」，可以被說是這事件發展最後總結式的評論。社論一開始就點出它對「兩國論」的評價：「『兩國論』說出了存在已久的『物理現實』卻同時也推翻了久已存在的『戰略現實』。依目前的情勢發展來看，『兩國論』並未創造出新的物理現實上的利益，卻耗損了極大的戰略現實的利益」。該文指出五點「標準」，可以用來評估兩國論的戰略得失：一、未使台灣在美國方面爭取到更大的戰略利益，美方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並且對未事先諮詢即發布兩國論「表達了極為強烈的不滿及不悅」；二、美國「顯然認為『兩國論』是一具有嚴重挑釁意味的政治宣示」，因此才有柯江熱線和分派陸士達和卜睿哲分赴兩岸，華府認為兩國論有觸發亞太危機的可能，而「台灣是『麻煩製造者』」；三、兩國論亦未使台灣在中共方面爭取到更大的戰略空間，台灣不僅「承負對話破局的責任」，「美國方面---『中程協議』召喚更形凸顯」；四、柯林頓重申「一個中國對台灣有利論」，台灣如果否定此架構，「當然會面對所謂『懲罰性措施』」；五、美國和中共已公開宣示反對台灣有進一步修憲動作，「縱使台灣民選政府選擇了台獨，或者台灣公民投票通過台獨，美國也不會支持，而中共也升高分貝指這是對和平統一極大的挑釁，由這些「皆可見『兩國論』」

迫使對方亮出對台灣極不利且有辱國家尊嚴的底線」。

由此，該文批評道：「『兩國論』在戰略觀點上是極為嚴重的挫敗」，它「即使在台灣內部政治上可以獲得若干民粹利益，但不能彌補整個國家在國際戰略利益上的嚴重損失」。最後，該文進一步批評道：「發動『兩國論』者的主要動機，顯然是爲了要處理自己在台灣內部所面臨的嚴重權力危機，甚至不惜破壞美國輿論所稱『協助台灣免於一戰的政治模式』，這才是最可議之處」。

這篇社論的基本觀點和前面的兩篇社論都相當一致，也就是一方面從動機論來看「兩國論」的提出，此動機和國家政策無關，而是李登輝個人權力的慾望；另一方面則是對兩國論實際效果的評估，大致上延續前面所提的「戰略空間」的說法。稍稍不同的是，這篇社論除了對「戰略現實」這方面失大於得的評估之外，它也提出「物理事實」和「戰略事實」的區分。所謂的「物理現實」就是：「『兩國論』說：中華民國是一主權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主權國家，兩者之間的關係當然是國與國的關係；這樣的說法有什麼錯？當然，就『物理現實』而言，這句話完全沒有錯」。接著它進一步解釋「物理現實」和「戰略現實」的差別：「這句話出自被指爲『不可預測』的李登輝之口，且時值總統大選及修憲會議正在進行的敏感實際，當然會被美國、中共及台灣內部認爲，此論不僅是在陳述單純的『物理現實』，而主要是在意圖調整存在已久的『戰略現實』」。從這句話大概可知，「戰略現實」亦即「存在已久的」一個中國架構，而「物理現實」是物理現實，「戰略現實」是戰略現實，兩者並不相同；但是「物理現實」出自李登輝之口，且於敏感時機之際，就不能只從「是否符合『物理正確』」來評估，也應從「是否符合戰略的正確」來評估。

(二)、《中國時報》

在對「兩國論」相關報導的處理上，《中時》的反應相當迅速。第一天報導了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的談話，以及總統府官員的解釋，其分析搞「兩岸定位新解，恐有衝突」(7/10, 2版)就預測兩岸可能產生新的衝突。第二天，「李總統兩岸重新定位說，引發議論」(7/11, 1版)這篇報導，就出現大陸和美國方面的初步反應。對李總統的重新定位的分析(7/11, 3版)指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說法留下國內「統」、「獨」兩邊都可以解讀的「想像或拉鋸的空間」，同時也爲總統大選「張開他的影響網」：選前定調確保選後「李路線」的不變和要候選人回應。但是李總統的宣示勢必在國內外造成反應，會掀起多大的波瀾？

十二日「李總統兩岸定位說，北京反應強烈」(1版)報導中共台辦的批評，要「台獨勢力放棄玩火行動」，同時也報導陸委會對此的回應，及推動兩岸交流與統一政策不變。二版報導了國、民兩黨對總統新定位說的反應，國民黨內仍在尋求共識；而民進黨的反應則是在標題「陳水扁感謝總統肯定」之中凸顯。同日也報導了北京涉台學者警告，中共當局勢將「做出反應」(2版)；以及上海社科院亞太所所長周建明的訪談「兩岸將走向對抗」(2版)，他於訪談中指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並不只是對兩岸關係現狀的描述，「它在背後包含有對國家和民

族認同的意涵。它是以台灣認同為核心，塑造一個中國以外的『民族』，在政治上以台澎金馬為國界--- 確立台灣作為一個中國之外的獨立國家的地位」。它更進一步地表示，「過去彼此都不捅破模糊的定位，雙方都有迴旋的餘地，如果要徹底拿掉，就要做好與大陸直接對抗的心理準備--- 甚至還有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

「兩岸定位說的兩個著眼點」(7/12, 2 版)分析總統提出新定位的時機，指其考量在於「籌謀因應北京來勢洶洶的政治談判」以及「明年的總統大選」。文中指出，如同大陸涉台學者周建明、辛旗等人所言，「這是台灣『兩個中國』政策的明確化」，去年辜汪上海會晤，辜振甫依據政府授權引述《波茨坦宣言》，強調中華民國主權繼續存在於台灣的政策立場，國與國的對稱表述就已出現。李總統此時公開倡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主要思維包括：「李登輝路線」的階段性總結；汪道涵訪台之前，強化台灣對兩岸政治談判的能量，或者想讓汪「知難而退」；吸納民進黨「一邊一國」主張，主導未來發展並為其支持的候選人保駕護航。

十二日的社論「不宜錯估形勢，動搖兩岸基本定位」(3 版)，對李總統的新定位說予以批評。該文首先指出，李總統的宣示與「國統綱領」首項原則「大陸與台灣均為中國的領土，促進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有相當的出入；而且，現在如把兩岸定位為國與國的關係，「不在一國之內追求平等尊嚴的和平統一」，無異於否定國統綱領和之前「一個分治的中國」的說明，改變了大陸政策原有的依據。該文並直陳，此時遽然做此宣布也不宜，其論點有三：一是兩岸關係自三年前海峽危機以來開始出現好轉，汪道涵去年允諾回訪，正是可以打開兩岸僵局之時，若因新的定位產生變卦，未來兩岸協商將難以為繼；二是不宜認為可以利用大陸與美國關係危機之際，以改變兩岸定位來拓展外交利益，美日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會輕易改變；三、援引德國模式，恐難獲得國際的認同。

該文接著以「兩岸只能和不能戰」指出，如果兩岸持續堅持立場，持續錯估情勢，則軍事衝突的後果恐難避免。它呼籲政府不要遽然改變「一個中國」政策，避免增添誤會。而當務之急是打開僵局的癥結，大陸必須保證台灣安全，承認台灣擁有國際生存空間，停止外交打壓；而台灣方面重回「國統綱領」一個中國的基本立場，考慮開放三通。待雙方建立互信機制，則可簽訂和平條約，加強經濟合作，形成互補互利的中華經濟圈，而後兩岸可能逐步實現「中華邦聯」的目標。最後，該文強調「兩岸問題千絲萬縷，然根本之所繫『一個中國』之大方向不可轉移」，呼籲兩岸領導人對形勢作正確的判斷。

接下來幾天，《中時》也以相當顯著的篇幅報導中共升高對「國與國關係」論的批評，包括汪道涵指「兩會對話關係不復存在」(7/13, 1 版)，「唐樹備批李：粗暴破壞一個中國原則」(7/13, 2 版)，報導中共外交部批評的「中共強調維護領土完整決心」(2 版)，「中共全面批判兩國論」(7/14, 2 版)報導中共外交部和媒體以「高規格」批評李總統。以及十五日的報導「北京準備取消汪道涵訪台計畫」(1 版)。而政府相關的反應也相當多，「兩國論僅止於宣示，高層無意修改國統綱

領」(7/13, 1版)，部會首長強調兩國論「係要建立更有效處理機制」、「並未放棄兩岸和平統一」(2版)，李總統表示「中華民國絕非地方政府」(7/14, 2版)，「李總統會張戴佑：大陸政策沒變」(7/15, 2版)，以及「蘇起：破解中共不平等、欺騙性一個中國原則」(7/15, 2版)。

美國方面的評論也開始增多，且多屬批評性的言論。「美學者籲我勿成麻煩製造者」(7/15, 3版)，報導了包道格(Douglas Paal)及何漢理(Harry Harding)兩位中國問題專家的評論，他們認為兩國論經由蘇起的闡釋，顯示台北確已做出政策上的重大轉變，並指出此舉可能被美國及中共視為「挑釁」的行動。「美媒體紛揣測李宣布的動機」則報導，紐約時報指李的聲明可能鼓動美國會山莊的盟友趁勢通過「加強台灣安全法」，該報並引述立委馮滬祥和台大教授張麟徵的說法，指李蓄意製造危機以利自己的延任，以及逼迫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在大陸政策上表態；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則說，台灣的政治分析家們相信李此舉是想為其政策留下「遺產」，約束他的繼任者，並逼宋楚瑜表態，但僅管李的聲明使中共暴跳如雷，台灣有許多人支持李，英文台北時報發行人江春男及民進黨立委張旭成都認為李的說法符合事實，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就是一個國家」。另一則美方的新聞就是「美國務院改口，逕批兩岸『多說無益』」，這篇報導指出美國務院發言人魯賓表示，美國將和台北討論李總統最新的聲明，並尋求更多的資訊和澄清；報導中也敘述了華盛頓郵報當天以「中國的威脅」為題發表社論，聲稱李總統指兩岸關係為兩國關係，「是不容爭辯的看法」，但美國和中共都裝著只有一個中國。

在分析與評論這方面，「走出一個中國迷思，陷入兩個中國漩渦？」這篇分析文章，認為政府官員對兩國定位論的詮釋，顯示決策當局「極力掙脫北京的『一個中國』架構」，但中共接續的言詞反制使得兩國定位論成為危及兩岸關係的新變數。文中指出，過去執政當局採取「戰略模糊，戰術清晰」的務實作為來規範兩岸關係，如今李總統「刻意」在選前和汪道涵來訪前，大張旗鼓祭出「兩國定位論」，顯然「民粹主義超過務實主義，選票考量大於穩定考量」。

十七日的社論「正視美國對『兩國論』的負面反應」升高語調批評「兩國論」，文中指出美國朝野和輿論對『兩國論』出現一致性的負面反應與嚴厲批評，紐約時報駐北京特派員在報導中稱李總統是個「不可預測的政客」，該報社論批李的兩國論，指李「實際上已宣布台灣獨立」指台灣「不但沒必要地激怒北京，而且也使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更加複雜」。社論進一步指出，「半世紀以來，台灣一直依恃美國的撐腰而生存---美國對兩岸政策的基調就是『維持現狀、保持安定』，此次美國朝野和主流媒體以罕見的快速反應向台灣表達對『兩國論』的強烈異議，「證明美國雅不願看到台灣政策轉向與自毀長城」。「兩國論」已展示了兩種「反面教材」，一是國府不要以為任何聲明或行動，皆能獲得美國的同情與支持；二是國府最高當局的刺激性言論，引發親台人士和媒體的極度不滿，進而可能失去這些友人的情誼。最後，該文指出「兩國論」已在國際上為台灣帶來強力的副作用：「窄化了台灣的國際通道」，也對台灣自身安全、兩岸關係、美台關係前景都有極負面的衝擊，「政府決策階層的固執和錯估美國的反應，可說是今年台灣的

『仲夏夜噩夢』。

這兩篇評論對提出「兩國論」的批評，已經是提高了聲調的嚴詞批評。另外國內其他對「兩國論」批判的新聞報導也很顯著，十九日「逾百學者籲停止推動兩國論」(2版)報導百餘位的學者發表聲明，批評李總統提出兩國論已違反其就職誓言和憲法，並要求總統及行政部門停止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做擴張性解釋，並且不對憲法、國統綱領等進行修法的行動。新黨也批評「兩國論」為台灣「帶來立即而明顯的災難」，同時要求政府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兩岸關係定位。以及總統參選人宋楚瑜批評「兩國論」為「盲動和粗糙的決策」(7/20, 2版)。二十日報導柯林頓與江澤民通話，美國專家們認為這可以「減緩台海緊張」(2版)。「對我宣示兩國論，華府反應兩極」這篇報導則指出，美國行政部門(包括白宮)對台北高層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突然宣示吃驚之餘也十分震怒，甚至傳出要「懲罰」台北之說。但美國政界支持台灣的也不乏其人，曾擔任過兩岸美國最高代表的李潔明(James Lilley)認同台北的立場，認為「一中各表」在九三年就已被中共破壞，他最近曾在華爾街日報為文主張「一中兩國」，與台北的「一族兩國」仍有出入；華盛頓郵報著名的專欄作家何格蘭(Jim Hoagland)今天亦為文支持李登輝。

另一篇評論「美展開預防外交，防止兩國論病毒擴散」(7/20, 2版)則指出，美國行政部門對李總統提出兩國論的不滿「溢於言表」，有些美國官員私下戲稱李登輝是「駭客」，他的「兩國論」是「病毒」，必得想盡辦法消毒。「不管怎麼說，李已是上了美國政府黑名單的人物--- 如今成了駭客，聯邦調查局(FBI)都要發出通緝令了」。類似這類美方負面評價的報導及評論，仍持續數日。

二十一日的頭版除了李總統發表「民主統一後『一個中國』才有可能」這個新聞述的報導之外，還有「白宮擬對台實施一系列懲罰」，以及「柯林頓：任何破壞和平對話之舉，非常嚴重」這兩篇報導。前一篇報導指出，極為可靠的人士說，柯林頓政府對兩國論極為憤怒，已在國務院建議下採取一系列對台的懲罰，包括停止交運已賣給台灣的武器項目。後一篇則報導柯林頓回答記者時表示他日前和江澤民通話，重申了他「強烈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以及強烈支持兩岸的對話」，並明確表示「我們的政策沒有改變，包括台灣關係法在內，如有任何破壞和平對話之舉，我們都視為非常嚴重」。在同一標題下的另一則報導，則是國務卿阿布萊特宣布將派卜睿哲前往台北，文中引述權威人士的話指出，卜氏此行以澄清為主要目的，「他不是要去教訓台北的」。

對李總統說明的評論，分別有華府學界反應和中共官方反應兩篇報導。「美國對台北的善意受到腐蝕」(7/21, 2版)報導了美國學者專家的看法，包道格認為台北似乎在美國受到進一步的孤立了；學者卜道維(David Brown)則認為美國對台北的善意受到腐蝕，則屬不幸。「不改兩國論，影響台海穩定」則報導中共外交部的反應，指出雖然措詞具體改變，但內容還是國與國的關係，中共對此態度並未改變。

二十一的社論「充分授權辜振甫，澄清兩岸關係本質」，認為李總統的說明有助於澄清一些疑慮和修補兩岸關係，但海內外和中共「更關切」辜振甫即將發出的「實質訊息」。對此，該文建議：一、參與決策人士「必須正確認識當前的國際形勢及兩岸關係，應該讓台灣人民了解事實真相，更有責任幫助決策者做周延縝密的思考與判斷」，當前國際形勢都希望一的穩定發展的局面，台灣惟有對兩岸協商表現更積極的態度，被國際視為東亞穩定的力量而不是「麻煩製造者」，才有利於台灣。二、辜振甫多年來在兩岸互動扮演積極的角色，他應獲得充分的信任，使其得以說明，「中華民國絕不改變「一個中國」基本立場，堅持追求中國統一，並且採取實際作為加強兩岸交流，進行高層次的政治對話」。此一態度固然建基於「兩岸中國人的民族與歷史情感，共同利益」，也是有助於亞洲乃至全球和平，台灣最重要的國際義務。三、辜的說明以化解風暴、促成汪道涵到訪為目的，應清楚說明「中華民國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使兩岸保持各自表述的務實對等狀態，既堅持了國家尊嚴，亦確保台灣的實質利益。

在新聞方面，美方相關的表述與作法持續為新聞的焦點。「美國防部一官員：卜睿哲之行關係重要」(7/22, 2版)引述美國防部官員說法，指出卜睿哲來台尋求「國與國關係」論進一步的澄清，其結果會相當程度地影響美台軍事關係。另一位官員表示，美媒體報導「美考慮切斷對台軍事協助」此一內容有所誇大。前白宮國安會官員包道格則表示，美國政府確實對台北極為生氣，但如果以對台軍售議題來「安撫」中共則是一項錯誤。「台灣問題，阿布萊特促中共和平解決」這篇報導引述外電報導美國務卿阿布萊特說「直接對話」對解決當前情勢非常重要，以及美國防部長柯恩認為中共應不會在軍事上打壓或對台灣發動攻勢，有機會以和平方式解決此事。此外，還有卜睿哲訪台及陸士達北京行的報導，以及「TMD恐是美施壓著力點」這篇分析報導。「兩國論回歸政治現實基本面」(7/22, 2版)的分析，則指出「兩國論」把美中台三方關係翻攪一陣之後，果然沒有改變台灣所面對的政治現狀，「甚至更凸顯了台灣在兩岸與國際政治現實中的艱難」。台灣終究要回歸到政治現實的基本面：一是「中共仍是一個思維霸道、實力強大的對手」，不是兩岸戰略或談判技巧所能改變；二是長遠的基本面，中國大陸逐步走向多元開放，兩岸交流與日俱增，這個方向「會將兩岸帶向一個不飾演前相互憎恨纏鬥所能想像的局面」。現在在「特殊兩國論」造成的新形勢下，如何尋找重新啟動兩岸關係的第一步，「似乎雙方都還茫然無頭緒」。

二十三日刊登柯林頓記者會有關台海問題的問題全文，而「柯林頓：美對兩岸政策不偏離三個支柱」(2版)一文，報導了柯林頓記者會的實況。同日也有行政院對柯林頓說法的回應：「行政院：兩岸和平，柯林頓看法與我一致」。「美眾院通過對台安全承諾修正案」(7/23, 2版)除報導美國眾議員為表達對中華民國的支持，針對一項法案提出修正案並於21日通過；此外也報導了美國參議員對行政部門考慮延緩或減少對台軍售一事，發出警告或杯葛之聲。此外，「民主統一中國說，中共排斥」報導了中共外交部隊李總統說明的反應，其發言人表示，台灣打民主牌的目的是阻撓和拖延兩岸的統一。次日，卜睿哲與李總統和行政部會

首長的會面佔據大部分的政治新聞版面，頭版以「李總統：我是堅決反對台獨的」為標題，報導李總統對卜睿哲強調我大陸政策並未改變，而卜也重申柯林頓總統的「三個支柱」立場。二版除了報導行政部會首長對他們與卜睿哲會晤之後各自所發表的談話，也報導了中共外交部表示，中共仍希望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但如果台灣堅持搞分裂，中共絕對不會坐視。另一則報導香港星島日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說法，指出如果辜振甫在即將發表的說帖中再出現「兩國論」的說法，兩會交流的大門會就此關閉，如果「兩國論」入憲，中共將會視為宣布台灣獨立而據以武力攻台。

在二十六日頭版「阿布萊特：當務之急，和平解決兩岸爭端，進行對話」一文中，報導美國務卿阿布萊特與中共外長唐家璇會面後表示，兩岸爭端必須和平解決並進行對話，就這點來說，台灣至今所提出的解釋「稍嫌不足」。另一則要聞則是「卜睿哲：美對台政策沒有任何改變」，報導指出，卜睿哲在其離台聲明中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仍是美國政策的基石；美國依然承諾忠實地執行台灣關係法；而兩岸雙方任何可能製造緊張與衝突的舉措，都是不好的步驟。「卜睿哲離台：我非調停或施壓，是來了解」(7/26, 2版)持續報導卜睿哲的離台聲明，聲明中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美國政策的基石，過取二十多年來的六任政府都固守這個原則，這原則促成有利的環境，使和平得以維持，台灣得以繁榮民主，兩岸合作也大為推展。而如何確切的界定「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如何具體的實現它，最好是留給海峽兩岸，在雙方都能接受的基礎上去決定。

此外，還有兩篇美國學者專家相關評估的報導，「兩岸目前至多是『外交危機』」(7/26, 2版)這篇報導引述一美國專家的看法指出，現在兩岸目前還沒有軍事危機，充其量是外交危機，但是「兩國論」使美國對台北領導人的信任受到影響。「華府專家：逼美選邊站，是台灣最大損失」這篇報導則指出阿布萊特公開表釋台北的解釋仍不足夠，顯示美台和兩岸關係之陰影仍然沉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高力夫認為美台關係將因此事件受到傷害，「把美國逼到與北京站在同一邊，這正是台灣最大的損失，尤其美國一直是台灣唯一的堅定支持者」；另一位專家藍普頓則表示，李登輝總統在與美方特使溝通過後仍堅持「國與國關係」之說法，雖不令人驚奇，但美方應指出的是，此舉對台灣人民並無助益。「卜睿哲台北行，不辱使命抑鍛羽而歸？」這篇評論也指出，從阿布萊特及官方談話可以看出美方對台北的說法仍不滿意，卜睿哲聲明中指出「能促進降低緊張---就是好的步驟。會導致緊張升高---就是不好的步驟」，這句話可以視為他對台灣當局善意的提醒和勸告，「也可視為他此行沒有達成說服李登輝放棄『兩國論』的目的」。

二十六日的社論「因應國際新局的幾點務實建議」，從中共從外交和「文攻」而非武嚇的方式施壓台灣，建議政府應從以下幾點來因應新的局勢：一、國際宣傳必須清楚統一，「特殊的兩國論」到國際媒體，「特殊的」就不見了，「一個中國」是未來式還是現在式的「中華民國就是中國」，說法應統一。二、強化對美關係，爭取小國固然在數字上可以予我滿足，但「兩國論」事件在在顯示美國等

大國的重要。三、鞏固「心防」，在中共外交攻勢下台灣內部極易出現兩極化而自亂陣腳，如何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外交政策的共識，也很重要，但一方面要避免「社會分裂」，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陷入民粹式的狂熱，讓政府成為激進民意的俘虜」。四、改善兩岸關係，如何讓辜汪會談順利舉行，並讓會談有具體成果，是現在最該思考之事。文中最後強調「外交工作與大陸政策，常互為表裡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作法與偏重」。

「兩國論國際反應，凸顯台獨窘境」(7/27, 2版)這篇分析，形容最近兩國論所引起的國際反應，「形同一次對台獨的國際民調」。此次世界各國對李總統提出「兩國論」不表支持，它們只在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的前提下，認為台灣不要沒事找事，如果一個沒講清楚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都引起這麼不以為然的待遇，想想，台灣如果搞台獨，會得到怎樣的反應。而「台獨主義者」一向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灣被國際社會排斥的原因，事實證明，只要會激怒中共的作法，都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台灣必須認清國際政治現實，不應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台獨可以為台灣取得一個新的國際空間。更不能存僥倖之心，期盼美國或國際社會解救台灣的危難」。

在新聞報導方面，行政院長蕭萬長在「台灣海峽和平與安全國際論壇」的致詞，即「蕭揆：中華民國人民已無法再忍受國家定位模糊」(7/27, 3版)這篇報導。以及前美國防副部長沃夫維茲和前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及駐中共大使李潔明兩人於研討會談話的報導。「讓李自己向中國解釋兩國論」這篇報導中，沃夫維茲表示反對美國政府強力介入，「美國的介入會使問題擴大」；「李潔明：中共對兩國論反應過度」則報導李潔明表示不同意美國過度介入兩岸問題，兩國論其實只是換個名詞而已，中共此次有些過度反應。此外，李總統和官員持續對兩岸關係發表談話，「李總統：汪來訪前須確認兩岸對等關係」(7/28, 1版)，「李總統：兩岸定位模糊對我不利」(7/28, 2版)，「蘇起：特殊國與國論，是防衛非挑釁」(7/28, 2版)，以及「李總統：兩岸不是老闆與員工」(7/31, 2版)。而最後，辜振甫回應汪道涵所發表談話，遭海協會退回(7/31, 1版)的報導；辜振甫談話稿全文，及辜振甫的記者會摘要：「辜振甫：相信汪道涵會訪台」(7/31, 2版)；以及各方的反應，「我外交部肯定，大陸學者說兩會共識破局」，「美國務院再促兩岸降低緊張」，「民進黨指國與國為兩岸往來基調」。

在評論方面則有一篇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的專訪，在「郝柏村：兩岸最高境界就是模糊」(7/31, 2版)這篇報導中，郝柏村對近來民調顯示贊同「兩國論」的民眾居多數，支持台獨的比率也急遽上升，反問道：「台灣的民眾真的做好戰爭的準備了嗎」。對於「兩國論」後的兩岸關係，郝柏村表示，「兩岸關係最高境界就是要模糊，模糊其實代表了對等」，以前的一中各表就是一例，但現在李總統談「兩國論」，「等於是逼大家現底牌，未來當然很難談得下去」。「兩國論」有點像以前新黨「一些糊塗蛋」提的「一中兩國」，但「兩岸關係其實是『一國兩中』」，一中兩國類似的說法，中共很難接受。最後，他也指出，柯林頓開始談香港模式，等於美方有接受「一國兩制」的傾向，這對台灣而言是很嚴重的事。

《中時》在「兩國論」事件的新聞報導與評論各方面，和《聯合》的差異並不大。整體而言，兩報對李總統的「兩國論」宣示都比較是持批評的觀點，有些記者的分析與評論批判的炮火特別猛烈。兩報在新聞方面涵蓋的範圍都相當廣泛，美國政府、學界與媒體，中共官方和學界，以及日本等其他國家和媒體等相關的報導，數量上非常可觀。對國內的相關報導以李總統、陸委會等相關單位所發表的言說為主，而國民大會對兩國論的討論、及政黨與總統參選人的反應，也較常見報。至於國內學者或社會團體等的反應，除了十五日百餘位學者發表聯合聲明的報導以外，其餘的都很少見。但是兩報都有民意調查的報導，《中時》分別報導了四個不同單位所做民調的結果；《聯合》分別報導了四個民調的結果，其中三次為該報所做的民調。民調結果顯示同意「兩國論」說法的比率，都比不同意者高出甚多，例如《聯合》所做的民調中，最低的同同意度為 46%，不同意者 27%，無意見 26%（聯合，7/16，2 版）。兩報並未對民調做進一步的析論。

兩報在新聞重點的強調也有些許的不同，例如《聯合》對柯林頓記者會提及香港模式，在新聞報導和評論上都予以強調，而《中時》並未特別強調；《中時》對「台灣海峽和平與安全國際論壇」（7/27，3 版）做相當顯著的報導，但《聯合》只有一小則新聞。另一點不同，可能就是兩報社論在批評的角度和聲調上顯現的不同。《聯合》的三篇社論都顯現出強烈批李的態度，它們對「兩國論」的批判是從動機論出發，因此對李總統的針對性就相對地被凸顯。在七月十六日的社論「台北傳說：『兩國論』促成『延任案』」，從動機論進而到陰謀論，而這說法隨著學者張麟徵的發言，進入到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中時》的社論採取的論述策略傾向於解決問題的進言，對李總統的批評較迂迴婉轉，不信任和反感流露於抬高辜振甫的重要性和對參與決策人士的殷殷相勸之中。

兩報的論述在國家、民族這些方面採取何種的觀點，如何敘述自我之定位及其意義，這些問題留待下面《自由時報》的分析結束在一併討論。《自由》對「兩國論」的報導與評論，與前面兩報呈現相當不同的新聞處理方式與觀點，三報的比較可能提供我們更多公共論述對此事件的不同觀點。

（三）、《自由時報》

對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的報導，《自由》不僅全文刊登（另兩報沒有全文），也報導後來接見外賓時的談話，以及副總統連戰的說法。分析報導「總統的宣告，脫離『一個中國』泥沼」（7/10，2 版）敘述了李總統思考此一決策的過程。文中指出，李總統新的宣示醞釀已有一段時間，李總統認為「在他卸任前應將國家的事實經由更堅實的法律基礎加以確認，以使未來台灣在推動兩岸關係與務實外交時獲致更多的保障」，德國有於具有兩德經驗，於是成為李總統宣示的窗口。文中指出李總統認為，經過台灣人民直選後的中華民國，這個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已經與中國大陸人民無關，這個法律關係有必要說清楚，否則持續陷於「一個中國」的泥沼，不僅在國際說明時很難釐清頭緒，在兩岸互動上也

難脫框架，淪為被動接招的局面。在人民認知上，到底是不是國家的疑惑始終糾纏不去，將影響國民自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九四九年成立後，就未曾統治過台澎金馬，這是不容扭曲的歷史事實，加上李總統強調的法律陳述，「他有意強化兩個國家的分權、分治，--- 這項政策調整，預料對兩岸發展發生十分關鍵的作用」。

次日的新聞大多報導政府部門對「國與國」說法的闡述，也報導了唐樹備與大陸學者周建明的反應。社論「兩岸糾結不清的主權關係終告釐清」(7/11, 3版)對李總統的宣示，大表歡迎之意。該文指李總統的宣示即是明確表達「台灣的主張」，這個「台灣的主張」就是「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間的關係為國與國的關係，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如此的宣示，在未來兩岸互動、台灣在國際間追求獨立自主地位，以及台灣內部政治生態的演進，實具有積極與重要的意義」。該文認為從歷史與法理上看，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毫無疑義，只是「由於中國對台灣一直不願放棄併吞野心，一再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強大武力，而且也不承諾不對台使用武力，乃使得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受到扭曲抹殺。國際社會屈服於中國--- 封殺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 台灣內部少數擁有大中國情結者，盲目迎合中國的主張--- 在國內外如此不利的環境下，台灣欲維持起碼的國家尊嚴，亦充滿了艱難坎坷」。最後，該文以未來「中國的壓力只會日益增大，不會減少」，而以往所持的「政治實體」、「分治的中國」，不但自陷於不利地位，更無使國際社會體認台灣存在的事實。「清楚釐清兩岸間的問題癥結在於制度的差異，而非主權之爭，除了能有效改變中國將『一個中國』當成籌碼，一再糾纏不清外，更能使兩岸的接觸回到相互尊敬、平等對待的基礎上」。

社論中使用「中國」一詞，特別凸顯其立場。次日的社論「中國就是中國—勿再以中共或大陸稱之」，更進一步要求政府法律及相關文件上釐清國家的定位，主張過去所使用的名稱，如「一個分治的中國」、「對等政治實體」、「中共當局」、「大陸當局」等均應揚棄，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來稱呼對方，如此「才符合實際，並有助於『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穩定化與實質化」。該文並以「觀念革命」來形容此項工程。

在新聞報導方面，對李總統「國與國關係」說的闡述和反應的報導逐漸增多。「『國家定位』說法與李一致」(7/12, 2版)報導民進黨總統參選人陳水扁的回應，指李總統的說法與他曾提及的說法一致，同時也報導總統府官員反駁，指陳水扁所說的是「台灣共和國」而李總統的是「中華民國」。另一篇評論「批李捧李，阿扁論調走樣」則是對陳水扁前後不一的批評。「高立夫：對現狀沒重大改變」一文則是報導美國學者高立夫(Ralph Clough)對兩國論的評論，他認為只要李總統和國民黨主張最終統一的基調不變，和民進黨相比，國民黨依然是中國政府較能接受的談判對手。然而，「『國與國』說法，考驗美行政部門」(7/12, 2版)這篇

分析評論，指出李總統的宣示已經引起美方的注意，目前反應雖然審慎保守，但李總統的宣示可能讓美行政部門「頭疼」，美中關係低迷，美方原本期待汪道涵今秋訪台，雙方能達成具體進展，如此也有助於美中關係的改善。而今李總統的專訪一出手，又給美國行政部門出難題了。

對來自中共反應的報導，「中國發表聲明：停止分裂活動」(7/12, 2版)仍只是小篇幅的報導；「唐樹備批兩國論粗暴破壞兩岸關係」，及「汪道涵：兩國論使兩會失去交流基礎」(7/13, 2版)這兩篇報導的顯著性大增。其後相關報導則有：「中國擬軍演？我國防部：並無跡象」(7/14, 3版)；「中共戰機六度偏離航道」(7/15, 3版)。

在另一方面，美方反應的報導，則有「美促兩岸節制，勿影響對話」(7/14, 2版)這篇報導，文中敘述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魯賓重申華府「一個中國」及信守台灣關係法等政策，並呼籲兩岸繼續對話；他並表示美國政府將透過正常外交管道請台北澄清兩岸關係的新定義。文中並敘述一位不願具名的美國官員指出，台灣政府多年來都聲稱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與國關係是可以理解的，至於美國所了解的國與國應是指「one nation, two states」。同一標題另一則中央社的報導則指出，華府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與包道格在一場美中關係簡報會中表示，台北新提出的「兩國論」將對中美及臺海兩岸關係有所影響。包道格認為目前發展尚難預料但後果可能會很嚴重，何漢理則認為李登輝總統的新詮釋不管有理無理，美國可能都會認為是挑釁舉動。「美要求今秋辜汪會如期舉行」(7/15, 2版)報導美國白宮首度回應兩國論和國務院的回應。

「李潔明：一中兩國解決兩岸對峙」(7/15, 4版)則報導前美駐中大使李潔明於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以及美國學者專家的評論。報導指出，李潔明對李總統新說法表示台灣只是在陳述事實，同樣重要的是兩岸必須透過一個共同接受的「框架」走向和平。他也指出美國和其他國家在七十年代制定中國政策時，都假定承認北京後台灣過一段時間會像越南一樣消失，這些預言落空，台灣沒有跨台反而民主化，「我們早應該開始為台灣的前途著想，但我們沒有這麼做--- 繼續死守尼克森--- 中國政策」。他也指出，美國公開支持中國或反對台灣的立場，只會鼓勵中國拒絕妥協，寄望美國停止軍售，把台灣拱手送給中國。他建議北京與華府不妨考慮「一中兩國」的安排。該文同時也報導其他美國學者專家對兩國論的不同評論，包括美國傳統基金會分析家葉望輝讚揚李總統為兩岸關係開啓新頁；前白宮國安會官員奧森伯格表示對台灣的新政策無法理解，此不符台灣的最高利益，同時也批評陸委會主委蘇起完全放棄「一個中國」的論點，會造成台海緊張，使台灣更孤立，他也表示已和許多專家交換意見，大家看法都一致。

在相關的分析報導與評論方面，分別出現針對中共、美國方面反應、及台灣的相關分析評論。「台海，將走向多事之秋」(7/13, 2版)指出李總統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表述，觸動中共最敏感的「一個中國」神經，台海情勢再度進入「盤整期」。中共普遍認為「國與國關係」的提法絕不僅是描述現狀，還有「刺探」的意味，如果大陸和國際悶不作聲，接下來就要把修憲提上日程，使兩岸分裂合

法化。尤其中美關係正處緊張期，爲了防堵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問題，中國更是繃緊神經。事態發展至今，看來不論台北怎麼闡述「國與國關係」，北京恐不會善罷甘休，危及汪道涵來訪之後，兩岸關係何以爲繼，台海情勢將不免走向多事之秋。「台灣尚須適當詮釋兩國論」(7/14, 2版)這篇分析則指出，美國行政部門對李總統最新定義的兩岸關係，「反應平穩得令人有些意外」，甚至可以說「順水推舟地接受了台北方面的『兩國關係』」，相較於九五年李總統訪問康乃爾時，美國務院「氣急敗壞」地指責台灣是「麻煩製造者」一事，現在美國的回應「值得玩味」。該文指出，從美國政府的反應平穩來看，美國政府「不可能事先未獲告知」；國務院雖重申「一個中國」政策，確有官員認爲從台灣以往的政策來看，設定兩岸爲「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很自然的；陸委會蘇起日前訪問美國，曾提及兩岸談判以來遭遇的障礙和不排除政治談話的態度，不排除美方認同這種先「大破」再「大立」的做法。台灣以德國模式的「one nation, two states」詮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獲得美國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美國已表明不支持台獨、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因此未來台灣如何在不放棄統一的前提下，使「兩國關係」的說法能站得住腳，「一個中國」還有各自表述的空間，適當的詮釋變非常重要。「國家主權定位，修憲允爲上策」(7/14, 2版)這篇評論，則是建議當天召開的國大憲改擴大諮詢會議，就李總統的「兩岸兩國」的國家定位，進行修憲方向的討論。如果能經此「匯聚」進一步修憲的能量，則國家未來前途將因此「指出方向」，同時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直接的回應」。

社論「中國何必對兩國論反應過度？」(7/15, 3版)則針對中共對「國與國關係」說法強烈批評的評論，該文的要點包括：一、李總統的「兩國論」是「把一切扭曲的歷史，還原其本來的面貌--- 只是對存在的事實的據實描述」，即使「現在有兩個中國，也未預設未來的統獨方向」，卻遭中共「粗暴與非理性的反應」，可見中共政權的「蠻橫無理」。二、「兩岸兩國論」接近兩德模式，這樣的定位不妨礙後來兩德的統一，兩岸即將進入政治談判的時代，我方希望兩岸在對等地位上無所不談，因此「兩國論」不代表台灣抗拒談判，甚至是對中國的一種「善意」，「它雖承認兩國目前並存的事實，但並未完全排除未來統一的可能性」。三、中國的激烈反應，反映出它的「心虛」，中國在下意識自知政經制度落後台灣，也無民主改革的決心，台灣人民不願與它統一，所以必須不斷施以武力恫嚇。如果中共能進行民主改革---，又何愁台灣人民不願與之統一？兩岸未來是否變成「一國」，「關鍵在於如何消弭雙方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而不是取決於「『一個中國』的虛幻口號」。

除了對「兩國論」引發諸多爭議的相關分析與評論之外，也出現炮火對內的一些評論。「高喊捍衛中華民國，不敢擁抱中華民國？」(7/13, 2版)這篇評論，批評「一些平常以『愛國者』自居的人士」，在面對中華民國的「正名」，「卻異常遲疑怯懦」：「這些人經常喜歡拿者中華民國國旗飛舞--- 當李總統幫大家說出中華民國--- 是個『國家』時，這些人不僅沒有鼓掌拍手，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唱和，稱此一陳述是在破壞兩岸關係。若干媒體的態度更是詭異--- 究其細

節，則是在『一個中國』緊箍咒下喪失心神--- 爲了乞上國歡顏，自甘當個國際法上的私生子」。除了這篇措詞強烈的批評之外，〈自由談〉專欄以「哪一個中國」爲題，也提出類似的批評，該文指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點不論統獨都逐漸得到共識，由李登輝口中說出時，「統派的驚慌失措」，令人覺得所謂的『捍衛中華民國』好像一場政治騙局」。它反駁兩國論會影響兩岸和諧的批評，「如果，中共打壓時，台灣默默承受，這就會被描述爲兩岸是處在『和諧』關係之中」，反之，台灣就會被罵是「麻煩製造者」。所以即使因爲李登輝訪美，中國也要放飛彈，「統派還是不會譴責中國--- 一切罪過永遠歸諸台灣」，現在李登輝說出兩岸是國與國關係，「統派必然暴跳如雷，與中國內呼外應，加入撻伐的行列」。最後，「如果統派不同意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國家，---該清楚表明，他們心中的中國到底是哪一個中國？」。次日同一專欄以「偃與虎」做進一步的批評，而言詞更加激烈，「老虎可怕--- 偃則化身無形，或政或學或商或媒體或黑道走私槍與毒。台灣要抗虎，必先除偃」。

接下幾天的新聞大都針對中共反應、行政部門的闡述與澄清、及美國方面的相關談話與反應這幾方面的報導。「蕭揆：辜汪會可深談政治議題」(7/16, 1版)報導行政院澄清「特殊國與國關係」說法，不影響大陸政策；「李總統：兩岸要談判，地位須平等」(7/16, 2版)報導李總統接見外賓時的表述，同版還有相關政府部會首長相關闡述的報導；「因應台海局勢，軍方備妥 13 套方案」(7/18, 4版)，報導軍方否認共軍有集結的現象。「江澤民重申一國兩制、和平統一」(7/16, 1版)，報導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蒙古訪問中回答記者的說法，同時也報導唐樹備指出目前的情況下，汪道涵訪台相當困難；以及「陳雲林：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下去」(7/16, 2版)，「中共軍報宣稱，不放棄武力犯台」(7/16, 2版)這兩篇報導。

美國方面的報導，則有「國務院：反對中國動武」(7/16, 2版)報導國務院發言人魯賓表示美國對中國武力犯台的立場不變，對兩國論是否政策的改變，他表示應當由台灣當局去澄清，重點是對話能否進行，而不是在宣言和口頭上做文章。同日，有兩篇報導紐約時報的報導與評論，「中國勿再武嚇，台灣別談兩國」報導紐約時報社論批評李總統貿然提出的新政策，不必要地激怒北京，使美中關係更爲複雜化，呼籲李總統停止兩國論的說法，並重申追求兩岸和平統一的立場；另一篇報導「李提兩國論，中國懷疑美曾介入」，美中關係因核子機密竊案和科索沃問題陷入低潮，此時李登輝提出國與國關係，中共將密切觀察美國會怎麼做。「美將再透過正常管道與兩岸溝通」(7/20, 2版)報導國務院發言人魯賓表示，美國近期內將透過「正常管道」再與台北、北京溝通，魯賓同時透露柯林頓總統曾致電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除重申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也敦促兩岸繼續對話，魯賓也重申美國的基本政策未變；報導也指出，華府傳出將派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訪台，魯賓正式否認台北將派「專人」赴美溝通，意味台北原先的規劃可能產生變數。

「柯江通話，總統府：有助台海穩定」(7/20, 2版)報導總統府官員引述李總統說法表示，美國主動關切，是阻止中共在未來做出錯誤決策的重要關鍵力量；同時也報導朝野「咸認有利台灣」的各方反應。「柯林頓，給中國面子，為損台灣裡子」的分析則指出，中共近日的反應具有瓦解台灣民心的用意，以及要求美國表態以改善中美關係的暗示，然而在先前中國因使館遭炸所顯現的民族主義反應，引起美國人反感，同時美國大選在即須顧忌輿論及政敵反應，美國行政部門不致向中國過度傾斜。因此，柯江熱線雖「給足面子」，但雙方仍只是「各自表述」，沒有一方讓步。社論「台海問題已是國際新秩序下的區域安全環節」(7/20, 3版)是對柯江熱線及其影響的評論。該文除了讚揚李總統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說，並批評「若干人士」以北京「馬首是瞻之心態」以外，其論述的主旨在於「呼籲國人應清楚認知台灣的機會與限制」。它指出，在亞太安全體之下，「台灣的機會」在於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台灣的限制」則是在於中美兩國「交往政策」之下，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尊嚴」無法充分維護。而「正因為機會與限制的存在，才迫使我政府---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來凸顯台灣存在的價值」。它最後引用孫子兵法：「靜以幽，正以治」，表示在面對中共的文攻武嚇，我們應以此「冷靜、務實、積極的態度」因應台海危機。

二十一日李總統再闡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李總統：兩國論爭對等，非搞台獨」(1版)報導了，李總統強調「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兩岸應以對等地位協商，盼國人面對中共與國際反應要有信心(小標題)。同時，「柯林頓：柯江通話，緩和了兩岸緊張」報導了美國總統柯林頓表示，他相信美國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並鼓勵台灣也支持「一個中國」和兩岸對話得以進行的機制，將有助於緩和兩岸的情勢；報導中也指出，美國務卿歐布萊特宣布將派陸士達與卜睿哲分赴北京與台北，她也表示，「直接對話與以及和平手段」解決目前情況非常重要，美國已為解決問題鋪下一條「良好道路」，台灣的聲明沒有助益。此外，也有「兩國論風波，美中藉機修好」(7/22, 2版)的報導，該文引述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指華府如此迅速採取外交行動，可一方面迫使台灣收回兩國論，一方面向北京保證一個中國立場不變，來改善與中國大陸日趨惡化的雙邊關係。另一篇報導則是「華盛頓郵報社論，支持李總統主張」(7/22, 3版)，郵報社論批評柯林頓政府總是施壓台北，問題來源其實是中共不願遵循台灣的民主化道路，認為歐布萊特應該做的，是向唐(應指中共外長唐家璇)說明沒有任何國家希望加入獨裁統治。中國大陸方面的報導，則有「中國重申反對兩國論，仍在等辜振甫澄清」(7/21, 2版)，「中國軍方，否認調動軍隊」(7/21, 3版)。

二十二日的新聞出現較多的學者對「兩國論」及美台關係的專訪(4版)。「兩國論」方面報導了學者瞿海源及李永熾的看法，前者認為兩岸基於歷史淵源，作為分裂的兩個政治實體，其實就是兩個「國家」，此點「在事實上評無疑義」，倒是國內島內支持與反對兩國論聲音，不應太過情緒化，否則徒然增加內部的衝突；李永熾則表示，無論就歷史角度或政治觀點，兩國論其實是長久既存事實的

闡釋，這對一向持高姿態的中國而言，當然是不可接受，但國內卻有人為此「大感緊張失措」，其實這才是比「兩國論」更值得擔心，也「更可笑」。另外則是訪問學者田弘茂與裘兆琳的兩篇報導。前一報導指出，國策顧問、國統會委員田弘茂認為美方過去一再表明不會對台灣施壓，而且除非美國提出具體想法，其主張和台灣有明顯的不同，還非要我們做不可，才會變成所謂的壓力，他認為目前尚無這樣的前提；但兩國論是否影響美台關係，還要看卜睿哲來台後的發展而定，他相信卜來台與我方溝通一定有「具體、實質」的意義。後一篇報導則指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裘兆琳認為，「特殊的兩國論」之所以讓華府緊張，是因為它破壞了原來存在於「一個中國」架構下的舊的模糊，目前台北應該強調儘管賦予它新的定義，但並未放棄所謂「一個中國」架構，讓三方可以在其中找到新的模糊。

在分析與評論方面，「卜睿哲台灣行，或可解僵局」(7/22, 2版)這篇分析報導指出，美國行政部門從避免公開批評李總統的宣示，到指出台北的聲明「沒有助益」，對於是否台北曾先告知，從不予置評到明確表示台北沒有事先告知，種種跡象顯示，台北未來恐怕要面對華府的壓力和一段艱苦的溝通過程。該文也指出，宣示「兩國論」是一回事，西方社會對兩德模式普遍有所認知，但台北宣布放棄「一個中國」又是另一回事，此項宣示幾乎是向中國宣戰，以及對美國既定政策的公開挑戰。卜睿哲的台北之行意義重大，文中引述華府中國問題專家唐耐沁的話指出，在李總統的原始談話及台灣官員的闡述之間，應該還有彈性，可以找出讓兩岸都能接受的下台階。

接下來幾天重要的新聞則是美國總統柯林頓記者會的談話，美將延緩對台軍售的傳聞，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來台，與卜睿哲會晤後李總統與行政部門首長所發表的談話。除了這些要聞的報導之外，有兩篇相當大篇幅的新聞報導了美國國會的相關言論與動作。一篇是「美眾院促請白宮要中國放棄對台動武」(7/23, 3版)，該文報導美眾議院通過一修正案，促請總統要求中國放棄對台動武，文中也報導，美行政部門藉軍售議題向台灣施壓，令不少議員反彈，未來還會有議員採取具體行動支持台灣，至於參議院外委會主席赫姆斯和民主黨議員托里西里提出的「台灣安全加強法」，雖因托里西里批評台灣引起一場風波，但他已表示將繼續推動這項法案。同一標題之下，還有兩個外電報導。一篇報導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李潔明的看法，他於參院聽證會中警告美行政部門不應對台灣「拴緊螺絲」，藉「中程協議」施壓以及擱置軍售和軍事互訪為手段，不僅違反台灣關係法，也會提高而非降低戰爭的危險。另一外電則是報導美參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湯瑪斯表示，臺海兩岸不應企圖把美國捲入目前的風波之中，他奉勸北京低調會應台北的「特殊兩國論」，台北則不應指望在挑釁之外能獲美國的聲援。「延緩對台軍售，美國議員強烈反對」(7/23, 3版)這篇報導指出，美國政府在台灣宣示兩國論後，確實有延緩對台交流與軍售的系列計畫，不過在媒體揭露之後，來自國會強大的壓力，讓柯林頓政府一夕間改變決定，改口表示只是暫緩，對台沒有「懲罰措施」。

此外，對「兩國論」支持的聲音也有不少的報導，例如「跨黨派立委今聲明肯定兩國論」(7/24, 4版)報導國、民兩黨立委及無黨籍聯盟共同發表支持兩國論的聲明；「兩國論重申台灣主權獨立事實」報導日本學者對兩國論的看法；「歐洲綠黨聯盟支持兩國論」報導歐洲聯盟透過電子郵件向台灣綠黨表示對兩國論的支持，也呼籲中國停止對台的軍事威脅；以及「支持兩國論，醫藥界組聯盟」。另一種支持的聲音則是「建國黨批新黨：誤導美視聽」這篇報導，該文指出，建國黨批評新黨在卜睿哲來訪時舉行「反兩國論」的遊行，將嚴重誤導美方視聽。

這段期間的分析與評論主要為兩方面，一是對卜睿哲訪台之行與台美關係的分析；另一個則是對「反兩國論」者的批評。「主權保衛戰，台灣已累積戰果」(7/26, 2版)一文指出，台灣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正在國際間「發酵」，對台灣而言，這場「主權保衛戰」已有戰果落袋，但後續的挑戰也勢必無法逃避。該文分析卜睿哲訪台期間，政府官員適度澄清台獨聯想，但未於主權原則上做出任何讓步。卜的離台聲明，「點到為止」說出降低兩岸緊張關係的就是好步驟，造成緊張的就是不好的步驟，卜此行帶來的美國訊息，至目前為止可屬滿意。但歐布萊特指「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解釋仍然不夠的觀點，顯示台灣在這場三邊角力戰中，好戲還在後頭，勢必要有進行「持久戰」的準備。

社論「反對『兩國論』者在邏輯上如何自圓其說？」(7/23, 3版)，這篇評論延續前一篇社論的基調，痛批反「兩國論」者。該文首先批評某些報紙「自甘為中國傳聲筒」，在中國以不實的軍事消息對台進行心理戰之時，不斷報導一些軍事演習與政治動作的消息，影響民心。「但這種心理戰的技倆，早被是人看穿，中國除非喪失理智--- 否則台海戰爭的代價是它所負擔不起的。更何況，美國對此次『兩國論』危機的處理--- 顯見美國並未有犧牲台灣以討好中國的政策轉向」。接著，它批評「國內少數統派媒體」，一則基於根深蒂固的「反李登輝的情結」，一則基於「大中國情結」，原先就對任何有助提升台灣獨立自主地位，維護台灣人民尊嚴，與中國進行平等交流的主張，都一概加以拒斥，更何況此次中國又怒批「兩國論」，「這些統派媒體當然不會放過搖旗吶喊，向中國表態的機會」。最後，它強調「兩國論」是對兩岸歷史與法律現狀的事實描述，而非改變什麼，並反問，如果「一個中國」不是未來式，那麼還談什麼「統一」？

另一篇社論「國內媒體為何要為中國的統戰攻勢幫腔？」(7/28, 3版)一文，同樣也是對其所謂的「統派媒體」進行批判。該文一方面譴責北京當局運用「大國外交」在國際社會推銷「一個中國原則」，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的「蠻橫」、「非理性」。在另一方面則批評，當中國政府在宣傳與外交戰線對台灣進行壓迫之際，「國內若干媒體卻無法在『台灣與中國之間』做一正確的抉擇，不但隨著中國的宣傳步調起舞，甚至甘為中國統戰的馬前卒」。最後，該文呼籲國人了解兩國論乃是捍衛台灣主權獨立，提升我國對等談判地位，唯有知道自己的「立場與底線」，才不會隨著中國的宣傳攻勢起舞；它同時也呼籲國內媒體「選擇站在台灣人民的一邊」。

在大陸海協會退回辜振甫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說明此一事件前後的新聞報導，除了李總統及政府官員對「兩國論」的發言之外，對參加「台灣海峽和平與安全論壇」的學者專家相關的評論，給予相當顯著的報導。除了「蕭揆：國人無法再忍受國家定位曖昧」(7/27, 3版)這篇報導行政院長蕭萬長出席研討會的致辭內容，還有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沃夫維茲、前美駐中國大使李潔明、中國問題專家波頓的三篇報導，以及韓國與日本學者相關評論的報導。這些評論大都較同情台灣。此外，「岡崎久彥：『兩國』符合現實，『一中』悖離現實」(7/28, 2版)這篇報導，則是專訪日本政治評論家及岡崎研究所所長岡崎久彥的報導。三十一日的新聞，以辜振甫的說明遭大陸海協會退回，辜振甫發表說明的記者會及其談話稿的全文，以及陸委會主委蘇起的回應這些報導為主。同日也報導了美方的回應，「兩岸對話基礎，美不介入」(7/31, 3版)。

相關的分析與評論，「美方做球給台灣接？」(7/28, 2版)分析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柏格與國務卿歐布萊特陸續表示台灣再做清楚解釋，指出不少熟悉台美關係互動的人士都認為，「美方在作球給台灣接，比美國對台施壓更為貼近事實」，美國的目的在為辜振甫的進一步回覆海協會「醞釀氣氛」，但是中國所期待的解釋說明，「已不可能回復到中國定義的『一個中國』」，就算將來有「一個中國」，台灣也有「自己的主張」。「面對美中壓力，要挺下去」(7/28, 2版)這篇分析則指出，台北方面雖然說卜睿哲之行是「一此成功的溝通」，不過，柏格與歐布萊特卻接二連三表示要台北進一步說明，美方態度已顯示美國最關心的還是兩岸會談要如何進行下去，在辜振甫提出說明之前，美國會採靜觀其變的態度。未來台灣面對美國和中國的壓力自然是免不了，不過，台灣也不應對自己的前途太「悲觀」。中國固然是政、軍大國，但本身錯誤不斷，美國媒體最近批評台的聲勢趨弱，主要是因為中國全面掃蕩法輪功的事件，這種荒謬的發展讓批評台灣、硬逼台灣成為中國一部分的人，也很難說得理直氣壯。

「北京做好取消汪道涵訪台打算」(7/31, 2版)這篇分析認為，海協會很快地退回辜振甫的談話稿，顯示北京應該是已經做好取消或推遲的決定，之所以「留中不發」，是想把中斷兩岸對話的「罪名」，伺機「轉嫁」到台灣身上。文中並分析辜振甫的談話，認為辜的談話想在台美中三方的「一個中國」尋找最大公約數，我方評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美方可接受的底線，因此辜振甫對一九九二年的這項共識多所著墨。但是北京顯然想「得寸進尺」，不但明確指出一個中國已經沒有各自表述的彈性，把「特殊國與國關係」等同分裂國土的態度也沒有任何鬆動。任何澄清的說法只是成為其「攻擊謾罵」的箭靶，這種「表演」是要讓國際期待台灣做更多澄清，重新把一個中國的「帽子」牢牢地戴回台灣頭上。結果很可能是台灣俞說俞糊塗，「北京指使眼色、不掀底牌」，似乎已迫使台灣走向守勢。

社論「我們切不可從『兩國論』的底線上退卻」(7/31, 3版)對於大陸海協會以「拒絕接受」的方式回絕辜振甫的說明，以「其霸權主義心態溢於言表」評之。該文主張，「李登輝總統所宣示的兩國論，完全是基於民意所做的政策性宣示，

這是我們絕不可撤守的底線」。它指出，過去兩岸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原則的互動，北京當局卻故意省略「各自表述」，強加「一個中國」片面解釋成「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使兩岸成爲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合法政府對叛亂省份這種關係。我政府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宣示，想要建立台灣的對等談判地位，爲兩岸關係營造一個新的互動機制。儘管辜振甫在「談話稿」中對「特殊的關係」加以釐清，並再度提及「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從北京的反映可知，北京正是以「一個中國原則」作爲「壓迫台灣的藉口」，如果繼續以「一個中國原則」與北京周旋，「台灣最後必然成爲『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第二』」。因此，我政府當局必須堅持「兩國論之主張」，既然兩國論是具有民意基礎的主張，而且已經由總統像世人做出宣示，「絕對沒有再退回『一個中國原則』的道理」，尤其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一個中國」，「是將台灣驅趕入『一國兩制』的策略」，再接受此原則，台灣的「主權獨立」及「國家尊嚴」將被否定，此絕非國人所能接受。

在「兩國論」事件上，《自由》的新聞處理最明顯的特徵是官方說法的報導較爲顯著，這並非顯現於對官方說法的新聞報導，另外兩報對此的報導也很顯著，最主要的差別在它的社論中，引述和重述官方說法的地方相當多。此外，「兩國論」相關的負面新聞的報導雖然也有，主要是中共批評和美方評論的報導，但相對地比較少；而且當美方批評的聲音逐漸升高之時，它以相當的篇幅報導國內外支持「兩國論」的聲音，包括學者、政黨、醫藥界、歐洲綠黨等。此外，它對所謂的「統派媒體」強力批判，也使它「反統派」的旗幟鮮明。

《自由》在「兩國論」事件上的言論傾向於贊同兩國論，這個立場在其社論及兩國論事件相關的分析與評論上，已清楚地顯現出來。在其九篇社論之中，有六篇是針對兩國論所進行的闡述與評價，其餘三篇則是對其所謂「統派媒體」的批判。相較於前面分析的兩家報紙，《自由》可以說是採取相當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兩國論」的提出。當然，報紙的社論各自有其立場與觀點，這些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在新聞報導上是否顯示一致性的差異，這點在下面的比較中再做討論。

社論各自表達報社的言論與主張，這些立場與觀點的分歧或對立，並不是這個研究所關切的問題，這裡所關心的是這些公共論述，在對「兩國論」的提法和李總統的宣示所做的評論中，如何看待國家定位的問題，以及它們如何在論述中對國家和自我進行定位。這問題並不在於該論述支持或反對「兩國論」此一提法，而是在其評估的過程中，對國家與民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敘述，對政策的利弊得失的評估，有何不同？而這些差異，是否可以說這三家媒體在國家或／及民族認同的論述上採取不同的位置？這些問題才是後面討論所關注的主要問題。

二、三家報紙對「兩國論」事件報導的比較

由於「兩國論」事件是以環繞著此一論述所引發的爭議爲主，新聞報導也大多是官方的闡述與解釋、各方對「兩國論」的評論、以及新聞媒體的分析與評論。

因此，前面對三報的分析主要是以評論為主，特別是反應意見的報導、記者所做的分析與評論、和社論。這裡先就三報對「兩國論」相關事件的報導與分析評論，進行比較，進一步的論述分析則留待下一個小節，再進行討論。

(一) 初始的評估：贊同 VS. 動機分析

三報在一開始對李總統提出「兩國論」的評估上，顯現的異同在於：《自由》強烈的贊同，而另外兩報除了李總統提出的動機的分析以外，並沒有批評的言論。

從李總統在訪問中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個新提法開始，三報就出現極不相同的評估，《自由》的分析：「總統的宣告 脫離『一個中國』泥沼」(7/10, 2 頁)；而《中時》和《聯合》首先出現的，是以分析總統提出此一論述的背景和動機為主的特稿。三報的分析報導都是對新定位的提出「有何用意？」進行分析，但進路並不相同。《自由》引述李總統對國家主權獨立和兩岸「分治」的闡述，並肯定此一「政策調整」。《聯合》的分析(7/10, 4 版)，則指出總統的宣示具有「提高談判籌碼」、使「事實獨立」更明確、對大陸「先發制人」、把宋楚瑜歸為「統派」、以及「回應美方兩岸談判壓力」這些用意。而《中時》的分析(7/12, 2 版)則指出「因應北京來勢洶洶的政治談判」和「明年總統大選」，是新定位的兩個「著眼點」。

雖然《自由》顯現支持兩國論的態度，但仔細觀察三報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一宣示所做的政策背景的分析，三報在敘述以往兩岸互動，「政治實體」模糊的定位對我方不利，新的定位與我方「外交困境的思變」，以及確立中華民國的主權這幾個面向之上的評估(例如《聯合》7/11, 2, 13 版及《中時》7/10, 2 版)，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這也就是說，三報的分析報導對提出「兩國論」的分析，大多把它置於台灣的外交處境和兩岸關係發展的這個脈絡。三報的差異，在於對兩國論評估時對其它目標或動機的分析，《自由》並未從談判壓力、總統大選、或歸類總統參選人這些動機或目的，來評估「兩國論」的提出，另外兩報對此有較多的著墨，但是它們在語調上也可以看出一些差別，《聯合》的分析較明顯傾向於「先發制人」這類負面意涵的描述。

在「兩國論」剛被提出之時，三報在相關分析評論上顯現的差異，基本上只顯現一些態度上的差異，《自由》表示肯定與支持的立場是十分明顯，但另外兩報的分析或評論並未有明顯的反對或贊同「兩國論」的評估。而且就如前面提到的，對於政策變化依稀可尋的脈絡，以及這些背景的敘述，三報在這方面有相當的一致性。從這些比較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事件一開始，《聯合》與《中時》的分析與評論並沒有明顯的知持或反對的態度，其新聞報導涵蓋的面向相當廣泛，其分析的進路與觀點也比較多元。但這只是一開始的時候，隨著中共批評的反應傳來，這兩家報紙的分析與評論開始有較多批評的聲音。

(二) 中共與美方反應：極不利 VS. 樂觀情勢的再現

十二日《中時》及《聯合》均於頭版刊登中共對「兩國論」的批評，兩報對「兩國論」的評論開始較明顯的批評，類似「外交生路？兩岸險路？」(中, 714, 2)這樣的批評相繼出現。兩報的社論對「兩國論」的批評則相當直接。《自由》也報導了中共的反應，並且對此進行分析，社論則是認為中共何必「反應過度」。此後，中共的批評、大陸學者的評論、汪道涵是否成行的問題、以及中共是否軍事演習這類的報導也增多。同時，對於美國主要媒體、學者專家的評論，以及稍晚美國國務院等官方的反應，也都有相當多的報導，以及針對這些評論的分析。

就新聞的走向及報導所涵蓋的台美中三方來看，三報的差異並不很明顯，相關的反應和正、反面意見，都出現於新聞版面中。然而，《中時》與《聯合》對中國大陸官方相關的報導在數量上比起《自由》高出許多，前兩個報紙都闢有兩岸港澳版(或稱兩岸三地版)，新聞報導的數量自然高出甚多。或許從有沒有這樣的版面，也可看出三報立場上的差異。在這版面中出現的新聞報導，其實並不限於兩岸和港澳的新聞，台灣與美國或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或是政策相關的報導，也都出現於這個版面。此外，十八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通電話，《聯合》十九日以新華社的報導作為頭版新聞，其他報紙稍晚(二十一日)報導了柯林頓的說法。

三報的另一點差異是在對各方反應的報導上，報紙往往藉由「做大」與「做小」的方式，凸顯較批評的或是較肯定的反應。一種方式是在正、反意見皆有的報導，把焦點放在其中一面，或者在大標題上用全然負面或全然正面的陳述來描述，造成一種印象。另一種方式就是把較批評性的或是較肯定的反應，以較顯著的方式，例如單獨的報導或是較大的篇幅，予以強調。以美國媒體與專家學者相關評論的報導為例，《中時》與《聯合》較強調《紐約時報》的批評，以及包道格、何漢理等人的評論；而《自由》則會偏重《華盛頓郵報》支持兩國論的評論，以及李潔明、高力夫等人的評論。而這些不同消息來源的評論，往往也是報紙分析與評論中成為各自引述的對象。

當中共與美國方面各種言說及動作的報導不斷增加的同時，報紙對於這些言說和動作的詮釋和發展趨勢的分析預測，也逐漸成為分析報導與評論的重點。《聯合》與《中時》的分析與評論所出現的一個特徵，就是除了聚焦於美方不良的反應及對台可能有不利的後果(例如，「懲罰台北」之說的報導與引述)這兩方面之外，在一些評論中出現帶有負面評價的敘述。《聯合》分析評論不斷指出美對台原本就「不信任」；「懲罰台北」之說是美國「高明的外交手腕」，用來告知台北可能的「後果」；卜睿哲說的「了解」不代表「滿意」，美對台仍然「懷疑」；美方的「四不」如果「再被援引，也不奇怪」。《中時》的分析與評論，也是在批評的語調上逐漸升高，指美國採取預防外交，以防止兩國論「病毒」擴散；李登輝是「駭客」，美國聯邦調查局要「通緝」他。此外，其他分析與評論對提出「兩國論」所引發的兩岸和美台關係的緊張，大多也是傾向於負面的評估和悲觀的預期，台北「出奇招」後找台階下，「難上加難」；「存在事實」不敵「國際現實」(聯，

7/27, 2)；或者，美國「立場明確」，我方「空間有限」，「認清『強權政治』的現實」(中, 7/26, 2)。相對地，《自由》的分析與評估則顯得相當樂觀，對美反應的分析認為是給中共「面子」但未損害台灣的「裡子」(7/20, 2)；儘管仍有美中壓力，我們也不需悲觀，要「挺下去」(7/28,2)。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媒體公共論述在這方面最大的差異在於，儘管透過一連串的事件，美國行政部門的回應、李總統的再詮釋、美國總統柯林頓的談話、「懲罰台北」之說傳聞、以及美國務卿的談話和派遣卜睿哲赴台北的決定，美方對台北的不滿大致上已是三報分析評論的重點，但是如何看待美方的不滿卻顯示出南轅北轍的態度。這種態度上的不同，並不僅止於對美台關係的理解和對這關係的未來所做的評估，而是與其對「兩國論」此一提法的評價是相互關聯的，而這與如何看待兩岸關係和國家定位自然無法分開。即使在相當務實的陳述中，例如「台灣必須認清國際政治現實」這樣的陳述，本身就已經包含著對此一「現實」、台灣的地位、及未來的想像等多個價值判斷在裡面；而「主權保衛戰」這樣的用語，可以說賦予「兩國論」一種神聖性與需要奮起戰鬥的義涵。這些價值判斷貫穿於對「兩國論」的相關分析與評論中，在不同報紙的社論當中，不同觀點與價值判斷的差異尤其明顯。而這些媒體的公共論述在國家定位上採取何種觀點，這些不同的觀點如何影響它對「兩國論」此一提法的評價，它的意義，以及提出「兩國論」的利弊得失的評估。這也是下一小節想要討論的問題。

三、公共論述的衝突：務實主義 vs. 愛國主義？

雖然在整體來看，三報對「兩國論」的提出大致呈現支持與反對這兩種不同的立場，然而，這些公共論述如何評估「兩國論」的內涵及李總統的宣示，對我們了解它們如何看待國家定位，才是主要的問題。在這問題上，三報的社論對「兩國論」的評論是較完整的論述，因此這裡以社論對「兩國論」所做的評估，進行分析與討論。媒體公共論述的主要差異，顯現於對兩國論、一個中國、國家、和國家尊嚴這些方面的不同觀點。

(一) 對兩國論的評價

三報的社論對「兩國論」的評論，如果以贊同與反對兩種不同立場來看，《自由》自始至終都極力贊同「兩國論」，即使辜振甫的說明稿指出政府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它仍為文要求政府要堅持「特殊國與國關係」這個「底線」(7/31)；《聯合》的社論則是自始至終反對「兩國論」，並且持續它對李總統的批判；《中時》的社論，前面三篇社論對「兩國論」持批評的觀點，在二十一日李總統再闡述「『一個中國』為未來式」之後，兩篇社論的批評明顯趨於緩和。

贊同「兩國論」的論述所持的理由之中，最核心的陳述就是「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不僅是「事實」，也是必須捍衛的價值。基於這個事實，中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一九九一年修憲以後，法律上也是這個國家與國家的關係。問題是，「中國對台灣一直不放棄併吞的野心，一再地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堅持不放棄武力統一，「使得台灣的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受到扭曲抹殺」(自, 7/13, 3)。而「兩國論」的宣示，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使國際社會體認台灣存在的事實」，也能「改變中國將『一個中國』當成籌碼，一再糾纏」。

而對「兩國論」持批評觀點的論述，基本上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而來的批評。其中一個就是「兩國論」和現有法律抵觸的問題，例如憲法「因應統一前需要」的法理前提(聯, 7/20, 2)，「兩國論」的宣示否定了這項前提；以及國統綱領原則「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中國的統一，是所有中國人的責任」，國與國關係的說法亦即表示「不在一國之內追求平等尊嚴與和平統一」(中, 7/12, 3)。第二、兩岸的和平，「兩國論」破壞原有「創造性模糊」的戰略空間，危及國家安全(聯, 7/13, 2)；兩岸「只能和，不能戰」，戰爭的代價對兩岸而言都是難以估計，而且國際與美國也都希望兩岸「以和為貴」，「兩國論」不但危及兩岸關係，也「窄化了台灣的國際通道」(中, 7/12, 7/17, 3)。第三、「兩國論」是李總統為其政治權力及「個人政治圖騰」，所進行的保衛戰(聯, 7/13, 7/16, 7/20, 7/26)。

持贊同或反對立場的論述各自引用不同的法律基礎，來支持其立場。一邊是引用憲法增修條文和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及總統選舉賦予國家的正當性，來支持國與國關係的說法。另一邊則引用憲法「在國家統一前」的法理前提和國統綱領的原則，來反對國與國關係的提法。這兩類論述未必沒有交集，和平應是共通的價值，但在和平與衝突，甚至戰爭，這中間的評估則是大相逕庭。這個差異和另一點交集(同時也是分歧點)息息相關，也就是對國家定位和兩岸關係的看法。

(二) 國家意象的不同

基本上，「中華民國是一主權國家」是兩邊都贊同的陳述，但是這個陳述如果在兩岸關係的提法中，則可能出現歧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就會引發「不在一國之內」的質疑；而反過來說，如果這不是兩個「國家」，那麼又會有「那中華民國是什麼？」的質問。事實上，在官方論述「兩國論」的過程中，state 與 nation 的意義也曾經是新聞討論的話題。陸委會主委蘇起曾以「一個民族，兩個國家」來描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是仿自以前兩德的模式，之後由於批評者眾，這說法就被放棄了。雖然 state 可指主權國家，也可指主權國家之內的邦國，但在國內的討論中，「國家」這個概念代表著什麼意義，在各種不同的論述中所浮現的意象各不相同：

辜振甫應--- 具體說明，中華民國絕不改變「一個中國」基本立場，堅持追求中國統一，--- 此一態度與作法固然建基於兩岸中國人的民族與歷史情感，共同利益---。(中, 7/21, 3)

「兩國論」說：中華民國是一主權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主權國家，二者之間的關係當然是國與國的關係；這樣的說法有什麼錯？當然，就「物理現實」而言，這句話完全沒有錯。但是，這句話出自「不可預測」的李登輝之口，且時值總統大選及修憲會議正在進行的敏感時際--- 此論述不僅是在陳述單純的「物理現實」，而主要是意圖調整存在已久的「戰略現實」。(聯, 7/26,2)

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成立之後，即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 從未被滅亡過，現在還有效行使治權於台澎金馬--- 既然兩岸都是主權國家，爲了雙方的和平共存，互惠互利，都應該站在國與國的平等基礎上。(自, 7/15, 3)

這裡，「國家」的涵義有著未來統一的中國，中華民國是一主權國家的「物理事實」，以及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三種不同的涵義。一種只肯定現在的存在；另一種則較模擬兩可，現在與未來、「物理事實」與非「物理事實」，國家的意義是既在此又非在此，既在此也在彼。

(三) 對「一個中國」的評估

上面這些敘述雖然都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但是在國家的定位上卻是分裂的狀態，這種分裂也顯現於對未來不同的期望：

我們認爲「中華邦聯」的架構，在現階段是一個兼顧兩岸政治現實，尊重雙方立場的道路，它符合大陸方面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也確認台灣擁有主權、尊嚴、對等與安全的需求，亦可使兩岸中國人在理性合作與良性競爭的情況下，實現有利中華民族發展的共同目標。(中, 7/12, 3)

兩岸之間或許有更大的空間可待試探或開拓。即使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而論，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即曾說過：「一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共同締造統一的新中國」--- 這類見解皆顯示，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法架構之下，兩岸之間應可出現更開闊的空間。(聯, 7/20, 2)

「兩國論」是一個歷史事實，未來是否演變成「一國」，關鍵在於如何消弭雙方的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亦在於人民的意願，而不是取決於「一個中國」虛幻的口號。(自, 7/15, 3)

由這些陳述來看，這些媒介論述對國家未來的想像，顯然大不相同。「中華邦聯」的提法試圖以一個更大的國家架構，來涵納「一個中國」和台灣方面對主權的堅持，而這個對國家的構想，是建立在中華民族此一民族的想像之上。「締造統一的新中國」這樣的遠景，雖是引述汪道涵的說法，但顯然作者同意此一說法，亦即把國家的未來視為一個「新」的中國的創建。這兩個提法基本上分享著相同的願景，亦即對中國的想像。但這「中國」也非純粹屬於未來式，在力主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陳述中，它同樣存在於現在對國家的想像之中。而另一種對未來的期望則顯得全然不同。它對未來的看法是，是否變成一國還要看制度、意識形態、及人民的意願，而這「一國」是什麼國，則隱去不提。在對中國的態度上，或許可以從它是如何看待「一個中國」說法窺之：

過去在兩蔣時代，「一個中國」的幻想，讓台灣花費大額的國家資源，在所謂「反攻大陸」的神聖使命之上；而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一個中國」的腳鐐手铐，也讓台灣在國際間走不出自己的路。「一個中國」的假象，半世紀以來，讓台灣人民活在戰爭與奴役的陰影之中。(自, 7/15,3)

在這敘述中，「一個中國」是「虛幻」、是「假象」，也是台灣人民壓迫的來源，從而肯定「兩國論」和擺脫「一個中國」的正當性。而且，當它把「中國」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7/12, 3)，這樣的界定清楚地分隔出「兩岸兩國」的意象，同時也意味著「中國」與國家想像之間的鴻溝。

相對地，另一種論述對國家的定位，在「一個中國」和尋求未來中國的統一這樣的提法中，「中國」和國家想像之間仍是連結在一起的，即使在這樣的提法中，中國是一個國家、或者是地理疆域或家園(homeland)，它的意義仍是曖昧的。事實上，只有避而不提政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中國所代表的「國家」這種義涵才不矛盾。同樣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交互使用，以及「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說法受到批評(例如，聯, 7/20, 2)，也是在中國所代表的「國家」義涵之下才能理解，民族基本上是在此一「國家」概念之下所做的定義，就如「『一個中國』基本立場--- 建基於兩岸中國人的民族與歷史情感」，而非僅是同文同種這類文化民族的定義。

由這些公共論述中關於國家定位的敘述，大致可以了解「國家」這個概念在不同論述中喚起的意象，顯然大不相同。如果把辜振甫說明稿中相關的敘述做一比較，也許可以了解官方論述如何在「國家」此一概念上的著墨。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明確說明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現實--- 這也強調兩岸分治對等的立場。--- (我們)追求中國未來民主、自由、均富下統一的既定政策，並沒有任何的改變。---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有幾方面意義：一、

是兩岸之間文化同根、民族同源--- 二、雙方人民在社會、經貿各層面往來之密切--- 三、最重要的是，雙方均有意願共同努力、平等協商，追求中國未來的統一。

從這談話稿中的敘述可以了解，官方在國家定位上的論述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此一陳述，也並未放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樣的說法，但是藉由「追求中國未來民主---」，仍然維持「中國」作為國家未來想像的客體。這也出現在談話稿的其他地方，「『一個中國』是未來的，兩岸現在是對等分治」，「民主統一之後才有『一個中國』」，這些即使是以條件式的、未來式的敘述，對「中國」的反覆敘述，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中國與國家想像之間的連結。但在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兩個陳述同時也肯定了在台灣中華民國現有的國家地位。這個現在式，和文中所使用的現在完成式：「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五十年來--- 一個分治的中國及兩岸特殊的關係乃逐漸形成」，在意義上使得現有的國家定位朝向一種「事實」，比起未來式更加明確的現存地位。

公共論述中對國家與民族的敘述，和官方論述之間形成不同各不相同的差距。較傾向於凸顯「中華民國」和台灣與台灣人民的論述，比起官方論述更不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和中國的提法。當海協會拒絕接受辜振甫的說明，「一個中國」原則於是被用於強調這是北京用以「壓迫台灣的藉口」，其目的要使台灣成為「香港第二」（自，7/31,3）。較傾向於接受或強調「一個中國」原則的論述，其「兩岸中國人的民族與歷史情感」的民族認同敘述，與官方論述也有一定程度的落差，辜的談話稿並無兩岸同一民族的陳述，而是說兩岸「文化同根，民族同源」，意指文化與民族分享同一根源。這些不同的落差顯示出公共領域與官方論述之間，以及公共領域內部，在國家與民族的定義上出現出現不同程度的分歧。

(四) 對國家尊嚴的詮釋

公共論述在國家和民族想像上的分歧，使得不同民族主義立場的公共論述，在面對「兩國論」所引發的問題，自然也在對問題的根源、利弊得失上，出現截然不同的評估方式：

「兩國論」並未使台灣在美國方面爭取到更大的戰略利益--- 亦未使台灣在中共方面爭取到更大的戰略空間--- 台灣當局多年來所採取的冒進動作，已經成為催迫三邊關係發生嚴重傾斜的主要原因。--- 美國及中共已公開宣示，反對台灣方面有進一步修憲、修法的動作--- 可見「兩國論」迫對方亮出對台灣極不利且有辱國家尊嚴的底線。（聯，7/26,2）

國人應清楚認知台灣的機會與限制--- 在亞太安全體系之下，台灣的機會在於戰略地位之重要性之重要性--- 台灣的限制是在中美兩國的「交往政策」之下，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尊嚴無法充分的維護。正因為機會與限制的存在，才迫我政府當局--- 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來凸出台灣存在的價值。(自, 7/20,3)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戰略大結構中，美、日--- 期待維持一個穩定發展的局面，台灣的前途安全繫於此，兩岸的和平互動繫於此，因而「兩國論」之說可能挑戰了這個以穩定為主的架構。--- 辜振甫應清楚說明中華民國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使兩岸保持各自表述的務實對等狀態，既堅持了國家尊嚴，亦確保台灣的實質利益。(中, 7/21, 3)

在不同的媒體論述中，國家安全與「國家尊嚴」同時是這些論述所標舉的價值，然而，在對「兩國論」所引發的衝突中，不同觀點對如何才能獲得國家安全和維護國家尊嚴，顯然有著不同的評估。如果把「兩國論」視為台灣「當局」多年來「冒進」的延續動作，這個「當局」成了三邊關係傾斜的罪魁禍首，而今更因為「兩國論」使得美國與中共發表「有辱國家尊嚴」的底線。從這個觀點來看，「國家尊嚴」的意思就是不要自取其辱。在當天社論旁的〈黑白集〉專欄，以「『對等』的真相」為題論道，「兩國論」主張兩岸的對等關係，然而卜睿哲來台，我國從最高元首到陸委會主委一次列對上陣，而美國務院亞太助卿到北京，北京不過就是派了副外交部長，「兩相對照，什麼是對等，什麼不對等，立刻分曉」。這種帶有譏諷語調的敘述，暗示著：認清楚自己的份量，不要自取其辱的義涵。

另一種可以說是以全然不同的觀點來看「兩國論」，則大大提高兩國論在突顯台灣「存在的價值」和「國家尊嚴」的重要性。在這觀點中，國家尊嚴就繫於「台灣的存在」是否被彰顯，此一目標的追求可能遭遇困難，中共勢必會對台灣「文攻武嚇」，但是國人要有「信心」；在亞太安全體系之下，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這是台灣的「機會」。這種「愛拼才會贏」的精神，也帶有浪漫民族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味道，把「台灣的存在」視為最優先的價值，是台灣人民必須要去奮鬥的目標。「兩國論」所引發的衝突，因而被視為追求自我生存的奮鬥，或者在該報一篇評論中所說的「保衛戰」，而它的主要敵人就是中共和它所謂的「中國的傳聲筒」、「中國的同路人」。它對中共所作所為的描述，包括「蠻橫無理」、「非理性」、「霸權主義」、「併吞台灣的野心」、「壓迫台灣」等用語，取代了「反共抗俄」時代愛國媒體的角色。

第三個論述凸顯「兩國論」會破壞國際政治、經濟的戰略架構，對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兩岸和平都相當不利，這個論點和第一個論述相同。雖然它並沒有明顯的咎責的陳述，既未批李，也未批評中共，但它主張政府重申「一個中國」，亦即放棄「兩國論」，以解決爭端，也表明了它反對「兩國論」的立場。同時，它也主張我方堅持「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即可維護「國家尊嚴」，也確保

台灣的利益。這裡的「國家尊嚴」意指在「一中」原則之下，以「各自表述」的方式表達台灣這邊的自主性，「一中」則代表了台灣的利益。

四、小結

由這些不同的觀點來看，願不願意接受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伴隨著這原則而來的國家定位，形成兩個相互對抗的立場。即使這些論述都強調國家利益和國家尊嚴的重要，但眼中看到的利益與尊嚴並不相同，而且是相互衝突的觀點：一個視「一中」有辱國家尊嚴，另一個則視之與維護國家尊嚴或利益有關；一個視中共是壓迫的敵人，另一種觀點則無此敵對意識，甚至期望與其共同努力達成統一。這兩種觀點可以說是在國家定位和民族認同上站在全然對立的位置，如果有一點共識的話，那就是至少都未放棄中華民國的存在及其擁有的主權這樣的認知和立場，但這交集是否意味在現階段大家至少在國家認同之上仍存有共識？還是說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是象徵大於實質的共識？

從不同論述對國家與民族的敘述，可以看到，不同論述位置所投射出來的國家與民族的「視野」大不相同，而這些不同的「視野」都可以從現有的體制中取得支持該論述的部分基礎。就像所有民族主義的爭議，這些不同「視野」對於國家與民族的未來，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這個分歧亦即在國家定位和民族認同的論述中採取不同的位置，採取不同民族主義的立場。這些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和眼下這個政治國家的認知或者認同與否，較無直接關係，而是對於自己歸屬的地方和歸屬的群體有著不同的認知和期望，但是這樣的認知與期望，也反過來影響著他們對現存政治國家的看法，包括是否以國家來看待現有的政治共同體、國家應有的定位，其疆域及人民應包含什麼地方、什麼人，應採取什麼樣的作為才符合這個認知與期望。

在台灣，這種國家與民族「視野」的差異，可能延著台灣—中國這兩個座標而產生不同位置、不同明暗度的歧異認同。也因為如此，這個民族認同上的分歧，在涉及國家地位與民族歸屬的外交和兩岸關係這方面，對於該採取強化獨立自主或是該增進兩岸關係，應該突破中共的打壓或是避免衝突，應該積極擴展外交或是在不傷及兩岸關係之下發展外交，以及對和平與國家安全、和諧與衝突之間的空間，都各自採取相當不同的價值判斷。這個「視野」的差異，也顯現於不同立場媒體在新聞報導和分析上，以相當不同的方式再現「兩國論」事件，使其呈現出兩國論導致外交和國家安全一種極為不利的情勢，而另一種再現則是顯現出一種審慎樂觀的情勢。

這樣的分歧或許可以說，目前在「政治共同體」上的認知和承認，公共領域中並非沒有共識，例如國家安全和國家尊嚴這些用語所指涉的政治共同體。然而，對此「政治共同體」的國家定位和民族的想像上，包括是否以國家、民族來看待此一共同體，以及對未來的國家的想像上，公共論述則是分歧的。「兩國論」事件所顯示的是，媒體的公共論述以不同的民族主義立場與認同位置，形成對抗

的民族主義公共領域。

第三節、從「1989年亞銀年會」到「兩國論」

這兩個新聞事件之間相隔十年，這段期間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處於劇烈變動的時期。在政治體制方面，從解嚴和終止動員戡亂體制，逐漸走向民主化的轉型。在民主化過程中，歷經多次修憲、民意代表改選和總統直選，一個以台灣為核心的民主政體，大致已經形成。在社會與經濟方面，一九八九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才一年多，此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民間交往與關係日益密切。如今，台灣民間前往大陸經商、投資、就業、居住、探親、旅遊的人，可謂絡繹不絕。儘管如此，兩岸在政治上的緊張關係未必見緩。在八九年時中共在法律上仍是「叛亂團體」，雖然在兩岸關係定位上中共仍然持「一國兩制」政策，台灣仍於九一年制定「國統綱領」，並於修憲之後，宣告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承認兩岸均為「政治實體」，並且開放兩岸民間的交流。

此後兩岸關係時好時壞，九二年海協會與海基會舉行首次辜汪會談，開啓兩岸半官方的交往，然而兩岸關係並無實質的進展。一九九四年「千島湖」事件，引起國內對中共強烈的反感，李總統的「土匪」說和之後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時說出「台灣人的悲哀」，引發中共媒體點名批判李登輝「台獨的言行」。這種緊張關係在九五年李登輝前往康乃爾大學訪問後，出現更激烈的衝突，中共於九五和九六年舉行軍事演習和飛彈試射的武嚇行動。九八年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關係略見緩和。九九年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宣告，使雙方多年來斷斷續續的半官方交往完全斷裂，政治上的緊張關係升到新高點。

由「亞銀年會」事件和「兩國論」事件的公共論述分析，可以看到，這兩個事件雖然相隔十年，兩個事件的性質和它們所引發的爭議與衝突，具有一些相似性，也有一些差異。相似性在於：(1) 二者都是政府在國家定位和兩岸關係的界定上，以論述和動作試圖給予新的定位，從「一國兩府」和年會上對中共國旗、國歌致意的動作，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提法，都是此一積極作為的產物；(2) 是中共及其反應，都是這兩個事件中主要的影響來源，它對「一國兩府」的批評，以及在「兩國論」事件上強烈的反應，對官方論述與公共論述都有顯著的影響。就這兩點來說，關於國家及兩岸關係定位上的問題，基本上仍然位於結構性的框架之上，這框架就是中國大陸仍然堅持「一國兩制」；而且在國際社會兩岸大小差距過於懸殊。

不同的是：(1) 官方論述在國家定位上出現轉變，「一國兩府」基本上並未脫離既有的國家定位，而「兩國論」和原有的一中立場已經分道揚鑣；(2) 無論是官方或是一些公共論述，在面對國內爭議和中共反彈之時，比起在「一國兩府」或亞銀年會事件之時，更傾向於堅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立場；

(3) 八九年之時，媒體的公共論述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基本上是樂觀的，希望政府更開放民間經貿與文化交流的聲音，在媒體之中是相當一致的；新聞媒體對於中共和中國大陸的態度，並無明顯的敵意，這和「兩國論」期間媒體之間態度的分歧是不一樣的；(4) 在八九年「一國兩府」的論述時，有些主流媒體傾向於強調兩岸在制度上的差異，要求中共應要面對此一現實；到「兩國論」之時，兩岸的制度差異不再被強調(變成其他媒體的訴求)，而是轉而凸顯加強兩岸經貿、三通、及政治談判這些對政府的訴求。

這些同與異或許可以說在兩岸僵硬的架構之下，國家定位的問題隨著兩岸各自不同的發展，台灣內部對此問題看法的分歧逐漸擴大。但官方論述與公共論述在這兩個事件上，呈現怎樣的變化？

一、官方論述的轉變

在一九八九年政府決定出席當年亞銀年會，此一決定在當時被視為國民黨政府走出「漢賊不兩立」的僵硬政策模式，走向「彈性外交」的一項務實的作為。之後，隨著行政部門首長於立法院中提及「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府」這項構想的研議，出席亞銀年會此事也被詮釋為「一國兩府」新定位的試探。當時的外交部長連戰認為「一國兩府」是一項「很實際」的觀點，「對等政府不同於中共所提的『一國兩制』，所謂兩制只有共產主義制度及香港殖民制度，這都已過時，不合中國人所需--- 這也就是我們要堅持自由、民主、均富社會制度的原因」(中時, 4/9, 1 版)。

然而，「一國兩府」的說法，不僅抵觸當時定義中共為「叛亂團體」的法律，也不符合數十年來國民黨政府所宣傳的反共愛國的意識形態，同時也被反對黨用於要求終止動員戡亂體制。行政院長俞國華於是宣示「彈性外交不代表政府已事實承認中共政權代表大陸主權和大陸人民」，「統一的中國是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絕非共產主義的中國」，以及「大陸政策是內政問題，不是外交問題」。俞國華的宣示顯示當時國內的主政階層和統治菁英對「一國兩府」的說法，存在著相當多的歧見和疑慮，因此行政部門未再重提此一說法。在亞銀年會之後，李登輝總統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時，解釋「一國兩府」乃是立法委員提出的構想，並非是政府的政策，而彈性外交其實是「務實外交」，政府的「三不」政策沒有改變。

相對於八九年時的低調，在李總統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說之後，行政部門對此一說法出現相當多的闡述，包括陸委會主委蘇起的「一個民族，兩個國家」，辜振甫指「政治實體就是國家」，副總統連戰則說特殊兩國論「有助於釐清兩岸定位，推動政治對話」，行政院長蕭萬長更說道：「中華民國人民已經無法再忍受國家定位的模糊」。在立法院和進行會議中國民大會代表，除了新黨立委砲轟李登輝和「兩國論」之外，執政黨和民進黨的民意代表都表支持。此外，媒體中報導不同單位所做的民調都顯示，同意「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或「兩國論」說

法的民眾，都遠高於不同意者。例如，《聯合報》於七月二十五日公佈該報所
的民調結果是，同意兩國論者為 56%，不同意者為 20%，19% 無意見。之前歐亞學
會和新黨分別所做的民調，同意度更高達六成多與七成；而《商業週刊》對國內
企業經理人所做的調查，也有七成八的支持度。這些民調結果往往成為官方論述
引為民意支持「兩國論」的依據。李總統在會見卜睿哲之時就表示，他「以國家
元首的身分表達並反映我國大多數人民的心聲」；類似的話也在辜振甫給海協會
的說明中重述，「李總統的談話，--- 充分反映了中華民國在台灣民主社會二千二
百萬人民的心聲」。

「兩國論」的官方論述以齊聲唱和的方式出現，遠非當年「一國兩府」之時
所能比擬，而此一論述跳脫「一國」框架的範圍，其意義和效果也和「一國兩府」
提法相去甚多。「一國兩府」在當時雖然引起中共的反對，在公共領域也沒有完
全被接納，但這個定為基本上仍是延續著既有國家論述中的「一個中國」架構，
尋求對等政府的地位，但是並未被接受。「兩國論」直接訴求國家的地位，但以
「國與國的特殊關係」的說法提出，其論述所依據的基礎來自於修憲之後國家治
權所及的疆域、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和總統直接選舉賦予國家的正當性。由此來
看，這兩種國家定位提法的基礎並不相同，也非連續性的關係。即使「兩國論」
在社會心理上可能早被認定為一種「事實」，但官方論述將它的正當性和客觀性
奠定於民主化之後的制度之上。

「兩國論」這個新定位的論述，直接以「國家」作為自我的政治定位，而非
一國兩府、政治實體等用語，因此把長久以來擺盪於名義上的中國、現存政體的
中華民國、和地理的台灣之間的「國家」概念，進行了重新排序與定位。這樣的
國家定位，是對既有的國家論述進行一種新形構，因此也對國家的邊界和民族認
同的邊界，產生再界定的作用。這個區隔、劃界作用的論述，就如前一章所提及
的地區主義或族群／民族主義，都是一種「施為性的」論述，其目的在於使論述
的客體成為真實的存在的一種論述形式。它藉由挑戰既有的疆界劃分與定義，宣
稱其主張的區域或疆域的劃分和定義是正當的，並且透過論述和公開宣示，要求
它所訴求的人民、族群或民族的認知與承認。「兩國論」作為兩岸關係新定位的
論述，其目的當然是希望獲得正式的承認，但作為一種施為性的論述，國家定位
的論述，也訴求人民對此一國家定位和民族邊界的劃分予以認同，並以此一獨立
國家之國民來看待自身。

過去對國家定位的官方論述大抵上是以「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
以及「中華民國在台灣」這類的陳述為主，這類陳述凸顯中華民國台灣的國家地
位，例如李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致詞中表示，「中華民國已經八十四年，至
今仍在」。這些不同的陳述，並未將它放置在兩岸關係或自我-他者關係上，來作
為「國家」的界定，「兩國論」則是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兩個互不相隸屬的「國
家」。此一劃界的論述，其效果還需從後續的發展來評估，不過，它的區分、劃
界與排除，不僅作用於對外的關係的區隔，同樣也作用於台灣內部，對內部不同
民族認同和不同國家定位主張的政黨、團體或個人，形成一種新的區隔作用。《自

由》對其所謂「統派媒體」的嚴厲批判，或許可以說明此一可能的發展。

由前一節媒體公共論述的分析已經看到，公共領域對此論述的反應是分歧的，而官方論述在中共與美國的壓力之下，也做了部分的修改，承認未來式的「一個中國」，但仍堅持現在是對等分治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但就如族群認同等施為性的論述，國與國關係或兩國的論述只要維持著，仍會在論述場域持續它的作用。然而，官方論述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模糊空間，在這空間裡，「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樣的陳述，以及未來的「一個中國」或「中華民國即是中國」這樣的陳述，都可以找到位置，這也意謂著不同民族主義立場的公共領域仍然有其發展的空間。

二、公共論述的變動

媒體公共論述在「亞銀年會」事件和「兩國論」事件所引發的爭議中，都扮演著積極論述者的角色。雖然這兩個事件所分析的報紙並非全部都相同，「兩國論」事件時，《自晚》已經兩度易主，而亞銀年會事件時《自由》才剛成立一個月，從媒體公共領域來看，不同事件所分析的三家報紙都是當時的主要報紙，因此並不影響這裡就公共論述的比較。

在「亞銀年會」事件中，公共論述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一個是大陸政策更加開放的期望與要求；其次，「一國兩府」兩岸定位的試探；以及「起立致意」動作所引發的爭議。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時空環境，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意義，公共論述都關注於兩岸關係是否從「漢賊不兩立」走向更務實的交往，例如《自晚》的社評敦促政府「對現階段兩岸關係之和平發展有利者而可變者，應以最大決心、最快速度加以變革」(4/19, 5)；其他兩報也都力促政府進一步開放兩岸民間的經貿、文化交流。

但在政治性的議題上，則大都持保留的態度。這種態度大概可以區分出三類，一種是對代表團以「中國台北」的名稱與會，是否會被以「香港模式」定型感到憂慮，例如學者田弘茂的看法(中, 5/5, 2)。第二種則是對政策及官方作為可能傾向於分裂主張有所顧慮，《聯合》為代表團送行的社論強調不宜對出席亞銀年會賦予太多的意義，此一顧慮與其說是對中共仍存有反共的敵對意識，不如說是對台獨的疑慮。此一疑慮在「起立」事件時，引起《聯合》強烈的批評，質疑此一決策的真正意圖是要走向「兩國兩府」。第三種態度則是肯定彈性作法，認為出席亞銀年會以降地兩岸敵意為要，《自晚》和《中時》較傾向於此一態度，但後者點明政府應避免造成急統和急獨的滋長和兩岸關係上「躁進」的政策。

這三種態度在對「一國兩府」之說的討論中也可看到。其一是對中共「一國兩制」的批評，認為兩岸都是「實體國家」，例如李鴻禧專文的見解(自晚, 4/17, 5)。其二則是認為「一國兩府」對「兩岸中國人--- 饒富深意」，但是政府應正式聲明「此一政策堅持了中國統一，否定台灣獨立」(聯, 社論, 4/10, 2)。其三則是認為「一國兩府」符合「現實」，或是中華民國具體存在乃是「事實」，《中時》的社

論(4/12,3)較具體的指出「統一仍是雙方的長期目標--- 暫時仍維持現狀，但可消除敵意」；《自晚》的社評(4/13, 5)則指出「中華民國的具體存在，是誰也不能否定的事實。--- 任何建議，假使不能面對台灣具體存在的事實--- 是沒有意義的政治口號」。

這些不同的觀點，在「兩國論」事件成爲不同媒體相當清楚的論述立場。《聯合》與《中時》的立場仍有相當程度的延續性，八九年之時，兩報對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的論述，反映了它們採取了國家機構長久以來的反對台獨的立場。《聯合》在「亞銀年會」事件時，大張旗鼓地批判代表團在中共國旗、國歌前起立的動作和決策，指這作法意欲表達「一國兩府」或「兩國兩府」，而反對黨一面倒地支持此舉，亦是一個「訊號」(5/6,3)。而這種對台獨的疑慮，在「兩國論」之時，已變成公開點名批判李總統，指他是個「不可預測者」，兩國論是「強人正在做最後的權力掙扎」(7/20, 2)。《中時》在「亞銀年會」事件的報導與評論，著重於支持彈性作法的政策，並力促此彈性作法應用於大陸政策的開放，而兩岸之間「除非在一個國家的大原則下，有分治之實，絕不可能有其他的解決方案」。其基本的觀點和立場，在「兩國論」事件的論述中仍有其連貫性，主張我方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增進兩岸經貿等交往及開放三通，甚至提出「中華邦聯」的構想。在八九年之時，它促請政府應防範「統、獨」從言辭走向行動層面，到九九年它則提出要「鞏固心防」，亦即在中共外交攻勢下，台灣極易產生兩極的意見而「自亂陣腳」，需要公開討論以尋求共識，但這一方面要「避免社會分裂」，同時也要「避免陷入民粹的狂熱」，讓政府成爲「民意的俘虜」(社論, 7/26, 3)。

兩個事件之間最大的不同是，在八九年只有學者的專文較清楚標誌以台灣爲「實體國家」立場，在九九年則有媒體堅持此一立場，並且透過聲援官方論述，表現出反中的態度。事實上，八九年新聞媒體對於兩岸關係可以說是相當樂觀的，在政治上仍有較多是試探和保留，但是對兩岸民間交往都極力主張開放，對中共批評「一國兩府」也沒有敵對的情緒反應。在「兩國論」事件中，《自由》對中共的批評則有較激烈的反應，在言語中，中共的「打壓」或「壓迫」，其「攻擊謾罵」，以及中共的「蠻橫無理」或「霸權主義」，顯示它極力凸顯兩岸關係中台灣的受害人地位，以及兩岸的敵對關係。

這樣的反應或許是「台灣立場」上升的效應。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八九年台灣媒體的公共論述對兩岸的評估，基本上對政治立場和制度差異，較了然於胸，甚至有「經援大陸」(聯, 社論, 4/10, 2)之語。即使標舉統一的論述，也可看到它對兩岸之間「有明顯的疆界(台灣海峽)，有不同的制度」(中, 社論, 4/12, 3)這樣的陳述；或者「中共至今仍堅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政治上仍堅持一黨專政、不放棄武力統一的可能性--- 兩岸之間政治性的接觸仍不可能」(楊力宇, 中, 4/12, 2)。這樣的陳述在「兩國論」事件中，轉移到《自由》的論述。其他兩報在討論「兩國論」引發兩岸衝突的相關論述，不再提及兩岸制度的差異或民主與否之類的問題。《中時》的社論在呼籲兩岸面對新形勢應冷靜自持，建議「大陸方面必須保證台灣安全，承認台灣擁有國際生存空間，停止外交打壓；而台灣方

面應重回『國統綱領』一個中國基本立場，考慮開放三通」(7/12, 3)。

對兩岸政治制度差異的視而不見，和這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崛起有關，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它在國際社會的大國地位，也已經擺脫「天安門」事件的負面形象。在另一方面，兩岸的民間交往密切，台灣對大陸經濟的依存度高過所有其他國家。這個新的形勢，也顯現於台灣的公共論述對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的評估，就像一篇分析所說的：「中國大陸將逐漸走向開放多元，社會文化及政治體制也會面臨蛻變--- 而兩岸交流與日俱增，密度與廣度都是台灣歷史上的空前」(中, 7/22, 2)，雖然這個「政治現實基本面」的另一面是，中共仍是一個「思想霸道、實力強大的對手」。

新形勢影響公共論述對兩岸關係的評估，也可見於丘宏達「一個不通而有害的結論」一文的想法。文中指出，無論是兩德的分裂國家模式或是「一國兩府」都行不通，「主要困難還是雙方力量的懸殊，而不為中共接受。且--- 等於放棄『一國兩制』目標。--- 現在仍是如此，但對等一點可以力爭---」。作者曾經在一篇論文中分析中共的「一國兩制」，該文指出：「中共統一的條件和在統一後高度自治的承諾，是以中華民國必須放棄主權和同意成為中共統治下的『特別行政區』為先決條件，其並無任何值得信賴的保證足以防止中共統一後毀棄承諾」⁵⁵。作者並以香港基本法草擬過程指出，中共 1982 年憲法第 31 條與《基本法》所提供的保證，只是「一齣鬧劇」，而且「事實上，任何一部中共憲法能夠持續多久本身都是令人質疑的問題」。然而，在九九年《聯合》這篇專文中，作者一反批評「一國兩制」的立場，暗示台灣接受「一國兩制」。

相對於此一「實力」原則的觀點，一種全然以台灣為中心、對中共施壓採取對抗的觀點，在「兩國論」事件也很清楚的呈現出來。此一觀點強調民主的台灣，兩岸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的差異，批評中共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及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這種所謂「本土」的觀點在九〇年代逐漸成為媒體公共領域一種聲音。九三年海協會與海基會舉行第四次會談無功收場，《自晚》的社評論道：「此次兩岸兩會會談，雙方一如往昔各有立場，而您來我往之中，我方代表堅守立場，不因大小懸殊而生怯，不以人在北京而畏縮，足以令國人欣慰，也等於給恐共者當頭棒喝」(1994, 4/1, 3 版)。文中強調兩岸分立已久，台灣要「自立自強」，以及批評其所謂「惟中共馬首是瞻」的「恐共者」，這些陳述和「兩國論」事件中，《自由》在社論與評論中的論述相互呼應。《自晚》的這篇社評也可看出，它遠較八九年「亞銀年會」事件，在政治立場上更加凸顯其「本土」觀點。在「兩國論」事件中，《自由》的一篇分析評論，也清楚顯示類似的觀點。該文的標題是「面對美中壓力，要挺下去」(7/28, 2)，文中指出，未來美國與中國的壓力免不了，不過，台灣也「不應該對自己的前途太悲觀」，中國固然是政、軍大國，但其過錯不斷，美國媒體最近批評台灣的聲勢減弱，因為中國全免掃蕩法輪功，一個教人練氣功的團體居然會令中共如臨大敵，讓批評台灣的人此時要硬逼著台灣成為

⁵⁵ 丘宏達，〈中共對台政策與統一前景〉，出於趙全勝(編著)，《統一與分裂》，台北：桂冠，1994，7-28 頁。

中國的一部分，也很難說得理直氣壯。最後，它說道：「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台灣面對中國這個大巨人已經不是一朝一夕，能發展到今天原本就是一個奇蹟。--- 要說以小事大就處於絕對的弱勢，那就是對共產黨太有信心了」。

在「兩國論」事件中，《自由》無論是對「兩國論」的說法，或是在對中共與美國反應、事態的發展，都採取和另外兩報截然不同的觀點。就如前一節的分析所述及的，三報在國家定位與民族認同的想像上，基本上是朝向兩個不同方向的未來，一種傾向於接受「一個中國」，同時也就包含了它內含的國家定位與民族想像；另一種則是對此表示否定的態度。這個基本立場的差異，使得媒體在評估「兩國論」的論述及它所引發的衝突，以及對未來的發展，都出現截然不同的觀點。由於媒體在國家定位與民族認同論述上採取的不同位置，我們可以看到，在涉及國家地位與民族歸屬的外交和兩岸關係這方面，對於該採取強化獨立自主或是該增進兩岸關係，應該突破中共的打壓或是避免衝突，應該積極擴展外交或是在不傷及兩岸關係之下發展外交，以及對和平與國家安全、和諧與衝突之間的空間，都各自採取不同的觀點來論述其中的因果關係與利弊得失，而且產生相當不同的價值判斷。

在「亞銀年會」事件時，所分析的三個報紙並未出現這種民族主義立場的差異，這固然與法律對台獨言論的限制有關，但也可以說，解嚴未久，在媒體公共領域，台灣民族主義的力量尚屬薄弱。到了九九年，不同民族主義立場的論述，在媒體公共領域，已經形成分庭抗禮的態勢。從媒體對官方論述採取的不同位置，以及媒體間的鬥爭，我們或許也可以說，民族主義的對抗從國家機器的政黨競爭，擴展到媒體公共領域，這是九〇年代迥異於八九年的態勢。

三、小結

從「亞銀年會」事件到「兩國論」事件，媒體公共領域這種兩極化的發展，可以說是台灣島內民族主義發展和民族認同衝突的歷史側寫。在不同爭議事件中，可以看到，官方論述試圖從國家定位的論述策略，給予政治共同體更明確的邊界。在八九年官方論述新定位的嘗試，還只是低調的試探，而媒體批評的聲調相對地高昂，到「兩國論」事件之時，這種情勢已經有了相當的不同。經過十年，李登輝總統所主導的「本土化」以及民主化，確立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樣的國家論述的主軸，而這個主軸在「兩國論」事件的公共論述中已經被肯認。在另一方面，「兩國論」的論述及其宣示，引發對國家定位和民族認同的問題，卻方興未艾。

總結前面的討論，在這兩個事件中，媒體公共領域中的國家論述和公共論述的變化，可以簡要的歸納為以下幾點：

1. 官方在國家定位論述上，由一中轉變為兩國特殊關係論：「兩國論」的官方論述開始在兩岸關係上以「國家」界訂自身；此一國家論述也是一種

施為性的論述，具有重新建構民族認同的作用。

2. 官方論述在公共領域的效應：「一國兩府」的說法受限於中共反應和台獨疑慮，獲得政治公共領域和媒介公共領域的迴響相當有限；「兩國論」在政治公共領域獲得高度的支持，在媒介公共領域則是兩極化的反應。
3. 媒介公共領域對事件的表徵分歧：在亞銀年會事件的分歧在於批評決策有兩國兩府意圖／肯定此為務實彈性的作為，在國家、民族界定上並沒有明顯的分歧；兩國論事件的表徵則是錯誤的決策／主權保衛戰兩種對立的觀點，顯現兩種民族主義立場。
4. 媒介公共論述的變動：在民族認同上，媒介公共論述在八九年顯現的防範台獨的立場，到兩國論事件時，媒介公共領域變成一中 vs. 兩國的民族主義對抗。
5. 媒介公共論述對兩岸評估的轉變：亞銀年會事件時，公共論述中並沒有對中國大陸或中共有明顯的敵意，都強烈地要求更開放的大陸政策；兩國論事件時，《自由》界定中國為敵對的他者，相對於另外兩報論述中較正面、實力的評估。

前面曾經提及，對國家定位的新論述是一種「施為性的論述」(Bourdieu, 1991)，它所形構的國家疆域和邊界的劃分，是一種想要藉由論述鬥爭產生實效性結果的劃分。它作用的方式和地區主義或族群主義形塑認同的方式並沒有什麼不同，它們都是「製造和解體群體」的論述／權力。媒體在「兩國論」事件中，對官方論述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或聲援或批判，顯示官方論述，還說不上是公共領域中的主調，各唱各的調的情形較為明顯。以巴赫汀(Bakhtin/ Volosinov, 1927/1994: 164)對言說社會性的觀點來看，言說中對共享之價值判斷所內含的預設，這種「社會的視野」(the social purview)是該群體各種表徵的「血與肉」，也是一個共同體存在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果以巴赫汀的觀點來觀察「兩國論」事件中公共論述的分歧，是否可以說我們的公共領域對國家與民族缺少共享的價值判斷？這是否也代表公共論述在政治共同體的預設是分裂的？

研究結果顯示，就前者而言，公共論述在涉及兩岸關係和國家、民族界定上的價值判斷上，有著明顯的分歧。雖然最明顯的分歧在於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的想像上，但是這個分歧的立場，也對現有的政治共同體的界定、政府的政策、及兩岸的評估，產生極不相同的價值判斷。就後者而言，公共論述在國家安全上的關切，以及在訴求上，論述所訴求的對象－政府、「有識之士」、或作為讀者的台灣民眾－仍有共同的範圍。這些異同顯示什麼樣的意義？這問題應當要從較大範圍的時空脈絡來說明，我想在下一章的結論中，把這研究分析的結果置於相關理論和台灣時空背景與發展的脈絡，來說明這個研究結果所顯示的意義，並且回答前面所提出的研究問題。